RUSSIAN STUDIES

俄羅斯研究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4 年 第 2 期

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俄羅斯研究

汪道涵 题

目　录

中俄关系研究

3 基里尔•巴巴耶夫 / 中俄关系的五大成就和五项前景

19 毕洪业，杨　波，叶甫盖尼•萨夫科维奇，谢尔盖•比留科夫，亚历山大•巴尔苏科夫，郑润宇 / 2024 年总统大选后的俄罗斯与中俄关系

中亚研究

47 杨　恕，王术森 / 新形势下的中国中亚外交与中亚研究——杨恕教授访谈

69 曾向红，安凯欣 / 试论哈萨克斯坦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的构成及其影响（2021—2023 年）

乌克兰危机的多重影响

96 阎德学，邱宇鹏 / 俄乌冲突以来日本对外战略调整态势

118 郭　锐，赵俊杰 / “全球南方”视野下的俄非“特殊关系模式”分析

146 宋国新 / 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169 蔺陆洲 /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起源、现状与未来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刘　军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 年 4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4 年第 2 期（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Кирилл Бабаев

Пять главных достижений и пя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3）

Би Хуне, Ян Бо, Евгений Савкович, Сергей Бирю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суков, Чжэн Жуньюй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2024 года ……（19）

Ян Шу, Ван Шусэнь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Китая и изуч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новых условиях: интервью с профессором Ян Шу……（47）

Цзэн Сянхун, Ань Кайсинь

О составе и влиянии основного руководящего сло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Токаева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2021-2023 гг.)……（69）

Янь Дэсюе, Цю Юйпэн

Изменения внешней стратегии Японии после начал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96）

Го Жуй, Чжао Цзюньцзе

Анализ «модели особ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Африко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118）

Сун Госинь

Дилемма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и пути её решения……（146）

Линь Лучжоу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х част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стоки, нынешняя ситуация и будущее……（169）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4 年第 2 期（双月刊）

Contents

Kirill Babaev
Five Achievements and Five Prospects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3）
Bi Hongye, Yang Bo, Evgeny Savkovich, Sergey Biryukov, Alexander Barsukov, Zheng Runyu
Russia and China-Russia Relations after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19）
Yang Shu, Wang Shusen
China's Central Asia Diplomacy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in the New Context: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ang Shu……（47）
Zeng Xianghong, An Kaixin
On the Composition and Influences of the Core Decision-making Body of the Tokayev Government in Kazakhstan (2021-2023) ……（69）
Yan Dexue, Qiu Yupeng
Adjustments in Japan's Foreign Strategy since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96）
Guo Rui, Zhao Junjie
Analysis of the Russia-Africa "Special Relationship Model"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118）
Song Guoxin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Dilemmas and their Solutions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146）
Lin Luzhou
The Impact of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rigin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169）

中俄关系研究

中俄关系的五大成就和五项前景

基里尔·巴巴耶夫*

【内容提要】在过去的 20 多年时间里，在伙伴关系的新框架内，中俄关系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新型双边合作关系的最佳范例之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在五大支柱之上：两国领导人紧密的个人联系，中俄两国对于人类未来享有共同愿景，通过彻底解决边界问题建立完美邻国关系，持续提升的双边经济合作，以及文化亲近性和历史记忆。为了进一步推动中俄关系的发展，中俄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仍需继续努力，争取实现五项任务。这五项前瞻性任务包括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在亚欧之间创建全方位的物流和交通运输路线，推动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的扩大，以及加强人文交流来更好地了解彼此。

【关键词】中俄关系　中俄战略协作　“一带一路”倡议　新型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2-0003(16)

当前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处于双边合作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是两国领导人在官方高层会谈中经常出现的说法。而且，中俄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增长速度之快，在现代世界中是无与伦比的。[①]欧亚大陆两个超级大国的信任和友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不仅表现在各种言论中，也在事实和数据上得以体现。

* 基里尔·巴巴耶夫（Kirill Babaev），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当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客座教授。

① “Vladimir Putin Harshly Criticizes West as Xi Jinping Strikes Softer Ton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9, 2023, https://www.wsj.com/articles/vladimir-putin-accuses-west-of-trying-to-contain-russia-china-ahead-of-xi-jinping-visit-f605b24a

同时，双方都表示，“联盟”并不是中俄关系的妥当称谓，中俄关系的官方定位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①]。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联盟”和“盟友”这两个术语非常常见，但是在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受欢迎，中俄更愿意将这两个术语称为已经过时的冷战遗存。[②]

事实上，在过去的 120 年里，中国和俄罗斯曾三次建立正式联盟（1896 年、1945 年、1950 年），这三次联盟都没有超过十年。如今，双方共享 2001 年签署并于 2021 年延长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下称“条约”）。“条约”概述了以和平关系、经济合作以及外交和地缘政治互信为基础的广泛内容。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联盟，而是一个紧密的伙伴关系协议。例如，“条约”第九条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③]其他条款（如第七条和第十六条）则指出要加强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分享“军事技术”（第十六条），也就是说，中国人可以获得俄罗斯的军事技术，[④]这对于当前两国国防部门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相当重要。

该条约还包括两国如何在环境技术法规、保护能源以及国际金融和贸易等领域开展合作的方式。对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该文件确认了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即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⑤]（第五条），并强调双方承诺保障“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⑥]（第四条）。最后，该条约还包括一项两国之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的

①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ign Joint State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for the New Era and Stress Settling the Ukraine Crisis Through Dialogu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ch 22, 2023, https://www.fmprc.gov.cn/eng/zxxx_662805/202303/t20230322_11046088.html

② “Russia and China not building ‘Cold War-style’ alliance, claims Putin”, Euronews, December 8, 2023, https://www.euronews.com/2023/11/08/russia-and-china-not-building-cold-war-style-alliance-claims-putin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九条，中国政府网，2001 年 7 月 16 日签署，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0963.htm?eqid=f3d334fe00005154000000046646244b2（译者注）。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十六条（译者注）。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五条（译者注）。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四条（译者注）。

条款。[①]（第二条）。

正如双方领导人所说，2001 年条约的签署使得中国和俄罗斯“不是盟友，胜似盟友”[②]。这意味着，“联盟”是冷战时代的概念，新时代国际关系需要新的双边合作方式，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向全世界表明，新型大国关系切实有效。

本文旨在表明，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保障双边关系长期稳定的五大支柱之上。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并向全世界展示战略伙伴关系是中俄所称的“新时代”国家关系的最佳典范，两国还需要努力实现五个重要的前景。

本文不仅分析了欧亚两大强国已经取得的合作成就，而且还试图展望中俄伙伴关系的近期发展重点和方向。对于中俄关系前景的前瞻是两国政界、商界的紧迫任务，需要回应，中俄关系在未来几年是继续快速发展，还是放缓节奏并触碰到“天花板”。支撑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大支柱如下：

第一，两国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之间密切的个人联系。在过去十年间，两国领导人在北京、莫斯科和其他地点先后会见了 42 次，这些会见要么是双边峰会，要么是在多边会谈中找到机会一对一交谈。[③]此外，中俄领导人多次通话交流，始终保持私人对话。世界大国领导人保持如此紧密的沟通，在当代历史中我们还找不到类似的例子。

私人接触是政治中的关键因素，国家领导人间的私谊尤为重要。私人接触不仅建立领导人之间的互信，而且还向两国政界、商界、学界以及所有公民发出重要信号。俄罗斯和中国可以称呼彼此为朋友，因为两国的最高领导人是朋友，而且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始终强调他们的友谊。[④]

信号在当今世界的政治沟通中非常重要，俄罗斯和中国的领导人释放了众多信号。例如，习近平主席在 2023 年初再次当选中国最高领导人后的首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二条（译者注）。
② “中国外交部：中俄两国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中国新闻网，2021 年 10 月 22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10-22/9593007.shtml
③ “Xi notes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deep friendship with Putin”, Xinhua news, October 18, 2023, https://english.news.cn/20231018/801bd7db179a4f37896743d895fb6ecd/c.html
④ “Xi Jinping welcomes ‘dear friend’ Vladimir Putin to Beijing”, the Guardian, October 17, 20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oct/17/xi-jinping-welcomes-dear-friend-vladimir-putin-to-beijing

次外访目的地正是莫斯科。在习近平主席正式访俄期间，他与普京总统都热情洋溢地相互表达对于彼此支持的感激，并相互保证将坚定地进一步巩固两国之间的友谊。[①]甚至，两位领导人的举止也显示出彼此尊重和亲密，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门口告别时最后说的话是“请保重，亲爱的朋友”[②]。

普京在 2023 年 10 月对北京的回访同样饱含着象征双方友谊的信号。所有见证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论坛的人都注意到，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肩并肩进入宴会大厅，其他 21 位国家领导人紧随其后。在全体会议上，普京总统第一个发言，并且在合影环节他就站在习近平的旁边。在中国文化中，这些细节极为重要，也被全世界所注意。

根据克里姆林宫官员的说法，两位领导人在北京的会谈甚至也比原计划延长了将近两倍的时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有很多需要讨论的议题，他们相互协商的范围在不断扩大。

两位领导人都非常清楚个人关系如何支撑构建国家间的互信。就在习近平于 2023 年 3 月 9 日当选为国家主席的当天，普京向他致以热烈的祝贺。[③]作为回应，习近平在访问莫斯科期间表达了他的信心，他表示相信“俄罗斯人将支持”普京在 2024 年连任。[④]

北京和莫斯科的政界和商界人士都很清楚，这种关系对于发展中俄合作至关重要。每次领导人的私人会见后，两国政府部门和企业都能感受到推进双方进一步加强各自领域联系的推动力。[⑤]如果没有最高层的密切沟通，中俄关系就不会取得如此快速的成长。

第二，中国和俄罗斯对人类未来有着共同的愿景。2023 年是习近平主

① “Presenting the Order of St Andrew the Apostle to President of China Xi Jinping”, the Kremlin, July 4, 2017, http://www.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4973/print
② “China’s Xi tells Putin of ‘changes not seen for 100 years’” Al Jazeera, March 22, 2023.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3/3/22/xi-tells-putin-of-changes-not-seen-for-100
③ “Putin congratulates Xi on re-election as president of China”, Tass, March 10, 2023, https://tass.com/politics/1586869
④ “China’s Xi to Putin: Russians will support you in 2024 election”, Reuters, March 20,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chinas-xi-putin-russians-will-support-you-2024-election-2023-03-20/#:~:text=March%2020%20(Reuters)%20%2D%20Chinese,he%20will%20seek%20another%20term
⑤ Кирилл Бабаев. Восточная дружба// Известия. 16 октября 2023 г, https://iz.ru/1588872/kirill-babaev/vostochnaia-druzhba

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十周年，这一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出的愿景具有象征意义。十年后的今天，可以确认俄罗斯和中国均认同这一愿景。两国都认为未来的世界应当摆脱霸权，不应该存在任何单极领导和压迫，不应有任何人将政治教条或原则强加于他人。俄罗斯将这样的世界前景称为“多极化”，中国则使用“多边主义”这个概念，但无论使用何种术语，二者的含义是相同的。

2022 年 2 月 4 日，这一共同愿景在《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中得到了体现。[①]这份文件可能强化中俄领导层共享的广泛政治观点，将民主理解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②]反对西方国家坚持的片面路径，也不认同它们对民主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2022 年的这份联合声明还指出，“捍卫民主、人权不应成为向别国施压的工具。”[③]没有应该强加于他人的单一意识形态，应该相互尊重所有文化、国家体制和政治传统。这是所有人类共同未来的基础，这也是中国、俄罗斯和全球大多数国家，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形成对立的原因。

中俄两国坚持全球安全应体现所有国家利益，不能以牺牲第三国为代价来建立国家安全。这一原则对于在未来的世界中建立信任也非常重要。这在“声明”中得到了体现。

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共同理解对于中俄友谊至关重要。作为一个思想平台，这种共同理解促使北京和莫斯科在面对各种国际问题时采取共同的应对方式。

今天，中俄两国对全球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认同有必要停止在乌克兰的冲突，俄罗斯支持中国于 2023 年 2 月提出的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倡议。[④]中俄在巴勒斯坦日益焦灼的冲突问题上持有共同观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5 日第 2 版。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 年 2 月 24 日发表，http://www.fmprc.gov.cn/web/zyxw/202302/t20230224_11030707.shtml

点，并在联合国安理会一起投票支持立即停火，而不是支持美国提出的“人道主义暂停”。[①]2023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上以同样的方式参加投票，呼吁在加沙地区立即并持续实行人道主义停火：该决议得以成功通过，仅有 14 票反对（包括美国）。[②]

俄罗斯和中国在国际政治的其他问题上持有非常相似的立场：伊朗、朝鲜半岛、非洲危机等。

在正在获得全球支持和广泛声誉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和金砖国家（BRICS）中，中俄两国形成了机构的核心，提出了最重要的倡议并紧密合作。所有这些倡议都是源于两国对于人类未来的共同愿景。

第三，俄罗斯和中国作为地理邻居建立了完美的关系。中俄两国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边界之一（约 4300 公里），而两国成功地完全划定了边界，并签署了所有必要的协议，确认中俄之间永远不会存在领土要求。这项始于 1991 年的艰巨工作，在 2008 年签署了最后的边界划分协议，双方之间没有留下任何未解决的争端。[③]此前，在 20 世纪 60 年代，边界问题曾一度破坏了中俄关系。但是，今天中俄两国能够保持共同边界的安全，并且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那样，“背靠背”地面对其他挑战并相互支持。[④]

历史表明，边界划定是确保国与国之间友谊的重要举措，任何未解决的边界问题都可能导致长期的误解甚至敌意。最近的和当下的例子都表明，亚洲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如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是邻国间关系不稳定的根源。边界问题不仅影响各国政府和精英之间的官方关系，还极大地影响了边界两侧人民的情绪。反过来，人民的态度又影响了选举结果并引导国家政策的形成。可以清楚地看到，边界争议和领土要求是双边关系中最危险的问题之一，影响着政治和经济联系，以及两国之间的文化合作和民间

① Edith M. Lederer, “UN Security Council fails to agree on Israel-Hamas war as Gaza death toll passes 10,000”, the AP, November 7,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israel-hamas-war-united-nations-11-6-2023-69c4cdd226816e754c9a08b503d17897

② UN General Assembly adopts Gaza resolution calling for immediate and sustained ‘humanitarian truce’, UN, October 26, 2023,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3/10/1142847

③ “中俄签署国界线议定书，4300 公里边界全线勘定”，中国新闻网，2008 年 7 月 21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08/07-21/1319483.shtml

④ “Xi stresses China-Russia back-to-back strategic coordination”, Xinhua news, February 4, 2022, https://english.news.cn/20220204/a87734bc28e049208e659a93718fc446/c.html

交流。

这就是为什么解决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所有的领土问题如此重要。我们只能称赞中国和俄罗斯领导层的智慧和宽容，他们有足够的善意达成妥协。

边界安全为发展两国偏远地区之间的跨境合作提供了很多机会，这些地区需要对方来提高各自的发展水平。其中一个明显标志是 2022 年在黑龙江上新开通的两座边境桥梁，这将极大地加强双方的贸易关系。[①]

第四，经济伙伴关系无疑是当今中俄关系的第四大支柱。中俄双边经济合作的增长是一个令人惊叹且独特的现象。俄罗斯政府的“转向东方”战略和中国与俄罗斯战略合作的方针，在二战后的世界历史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在 2002 年至 2021 年这 20 年间，中俄双边贸易额从 120 亿美元增长到了 2400 亿美元，即增长了 20 倍。[②]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而中国始终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两国之间的贸易持续增长，2023 年已经超出了预期的 2000 亿美元大关。根据初步计算，2023 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 2400 亿美元。[③]然而，潜力仍然相当巨大。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是互补的，为对方提供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商品。俄罗斯向东输送其能源资源和农产品，以确保中国能源和食品安全，而中国则是俄罗斯最大的机械、设备和其他工业产品来源国，因为欧洲和美国建立了新的“铁幕”，俄罗斯在这些领域受到影响。[④]

2023 年，俄罗斯已成为中国汽车的头号消费市场，[⑤]同时俄罗斯在中国的原油进口中也取得了同样的领先地位。两国政府和商业企业正在讨论贸易的增长，这将包括向中国出口化工产品和化肥，向俄罗斯出口高科技产品和

① “黑龙江大桥正式通车 黑河公路口岸正式开通”，澎湃新闻，2022 年 6 月 10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513025

② Azimzhan Khitakhunov,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June 1, 2022, http://www.eurasian-research.org/publication/economic-cooperation-between-russia-and-china

③ “China-Russia 2023 trade value hits record high of $240 bln – Chinese customs”, Reuters, January 12, 2024,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hina-russia-2023-trade-value-hits-record-high-240-bln-chinese-customs-2024-01-12/

④ Кирилл Бабаев. Юлия Мельнико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и кита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и дополня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как две половинки пазла. 23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interview/rossiyskaya-i-kitayskaya-ekonomiki-dopolnyayut-drug-druga-kak-dve-polovinki-pazla/

⑤ “Russia becomes No.1 export destination for Chinese-made automobiles”, the Global Times, July 11, 2023,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307/1294155.shtml

飞机零部件。2023 年 10 月，在北京签署了一项新的巨额交易，未来十二年将有 7000 万吨粮食从俄罗斯出口到中国，协议还有可能进一步延长。[①]所有这些都使经济成为进一步发展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驱动力。

2023 年，作为中俄之间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商业联系的反映，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成立国际商务合作国家协调中心（National Coordinati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operation, NCC）。[②]该中心由俄罗斯最大的四个商业联盟[③]、政府的俄罗斯出口中心以及其他主要的国有企业和私营公司共同组成。NCC 将负责协助大型俄罗斯公司及其中国同行在贸易、工业和投资方面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我们希望在 NCC 的帮助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商界人士将获得一个有用的工具，以便在邻居的市场上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最后，文化亲近性和历史背景构成了俄中友谊的第五根支柱。

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俄罗斯和中国各有超过 80%的人口对彼此的国家和人民持积极态度。[④]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有着丰富的共同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二战有关。中国的老一辈人仍然记得苏联人民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对中国共产党提供的帮助，苏联军队解放了东北，苏联工程师、建设者和军事专家在中国各地帮助建设了 150 多个重要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回应，俄罗斯人记得 20 世纪 20 年代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年轻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周恩来和邓小平。

现在，数百万俄罗斯人梦想着参观北京这座古都、陕西西安的兵马俑和杭州的古园林，同时数百万中国人也钦佩或渴望看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俄罗斯革命历史遗迹。就在最近，在访问了曾经有大量俄国侨民居住的哈尔滨时，我们看到许多的中国游客来到这个冰雪覆盖的“冬都”，欣赏东北地区

① Arvin Donley, “Russia signs grain export deal with China”, the World Grain, October 18, 2023, https://www.world-grain.com/articles/19167-russia-signs-grain-export-deal-with-china

② Louis Auge, “Western sanctions drive Russian and Asian businesses towards each other”, the Eureporter, January 22, 2024, https://www.eureporter.co/world/russia/2024/01/22/western-sanctions-drive-russian-and-asian-businesses-towards-each-other/

③ 这四个商业联盟指的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工商会、“俄罗斯商业”、全俄中小企业联合会“俄罗斯支柱”。

④ “In general, what is your attitude toward China right now?” the Statista, September 12, 2023,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08441/russia-attitude-toward-china/

的有俄罗斯风格的建筑。俄罗斯纪念品摆满了当地商店的货架，那些来到哈尔滨欣赏中俄文化奇妙融合的人们，纷纷大量购买俄罗斯巧克力、香肠和冰激凌。

有人说，中国年轻一代已经不再记得中国和苏联共同的英勇过往。但实际上，当代俄罗斯有很多可以向中国年轻人展示的东西。在中国，俄罗斯歌曲和流行明星相当受欢迎。最近，中国电影的热潮在俄罗斯年轻人中间重现，中国电影开始取代好莱坞大片在俄罗斯各地银幕上的地位。

文化联系还有待继续加强。并不令人奇怪的是，中俄友好协会（成立于 1957 年，是俄罗斯此类社团中最老的组织）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欢迎，其在俄罗斯的数十个城市开设了办事处。这种“人民外交”必然支撑政府间外交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已经回顾了中俄伙伴关系的五大成就。上述大部分内容指的是最近二十年的发展。事实表明，两国已经为他们的友谊精心规划了新的内容，因此未来可能会创造更多成就。

但是，就像任何非常亲密的关系一样，中俄伙伴关系在未来几年需要解决一些严肃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我们的任务是在当今多变世界的艰难条件下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友谊。

下面，将列出加深我们两国关系的五个前瞻性任务。

第一，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发起的两大经济倡议的对接。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BRI）。欧亚经济联盟（EEU）形成于 2015 年，脱胎于以往苏联内部的原有结构。

“一带一路”倡议可能是自 1945 年联合国组织成立以来最具雄心的全球经济结构创建项目。其实施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证明了其成功。今天，根据习近平主席 2023 年 10 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讲话，“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涵盖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然而，其核心区域仍然是中亚，“一带一路”可能在中亚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

① 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3 年 10 月 19 日第 2 版。

欧亚经济联盟现在覆盖了超过 1.83 亿人口的市场和超过 2.4 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欧亚经济联盟条约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由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并于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和 12 月 23 日签署条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亚美尼亚的加入条约于 2015 年 1 月 2 日生效。吉尔吉斯斯坦的加入条约于 2015 年 8 月 6 日生效，不过吉尔吉斯斯坦从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之日起就作为参与国参加相关活动。

欧亚经济联盟鼓励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并提供宏观经济领域、交通、工业和农业、能源、外贸和投资、海关、技术规范、竞争和反垄断监管的共同政策。未来设想有单一货币和更大程度的整合。联盟通过各种超国家的和政府间的机构运作。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最高机构，由成员国元首组成。次级的政府间机构是欧亚政府间理事会（由成员国政府的首脑组成）。欧亚经济联盟的日常工作通过欧亚经济委员会（联盟的执行机构）进行。此外，欧亚经济联盟还有一个司法机构——欧亚经济联盟法院。

欧亚大陆上两个最大的经济项目对接的工作始于 2015 年，当时中国和俄罗斯同意准备全面的路线图，对接这两个倡议。“一带一路”对接欧亚经济联盟，对两国、对中亚和东欧的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以及参与“一带一路”活动的亚洲国家都极为有利。

我们的任务是落实路线图，建立有效的机制，将两大倡议对接，以达到最终目标：使欧亚地区成为一个拥有明确规则和方便各国之间商品、人员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单一经济区域。只有中俄两国把力量汇聚起来，普京总统在 2015 年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想法才能实现。

第二个任务与前一个任务紧密相关：在欧洲和亚洲之间、波罗的海和南海之间、俄罗斯北部的摩尔曼斯克和中国南部的香港之间，创建一个全方位的物流和交通运输路线。

这条运输线将包括陆路和海路。在陆路方面，俄罗斯和中国将在邻国的帮助下进一步发展和加强铁路网络、边境设施和能源管道。就在最近，“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远东抵达上海，并在 2023 年全面投入使

用。[①]现在两国政府正在积极与对方和蒙古国就“西伯利亚力量-2”这一雄心勃勃的项目进行谈判，这是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将把西伯利亚西部储量丰富的天然气田与中国连接起来。[②]

俄罗斯一直在讨论建设“西伯利亚力量-2”管道，该管道每年将从俄罗斯北部的亚马尔地区经过蒙古国向中国输送 5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几乎与 2022 年闲置的波罗的海“北溪-1”管道输送量相当。随着莫斯科寻求将对能源需求旺盛的中国的天然气出口增加一倍，该计划在两国越来越受欢迎。到目前为止，管道的技术项目已经制定完成，合同定价的最终协议预计将在 2024 年达成。这无疑将重塑东亚的整体格局，因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水平将大幅提升。目前，中国大部分能源资源通过海路进口，这很容易受到美国侵略性行动的影响。但是，与俄罗斯可靠且长期的管道项目将使北京对能源——当今世界经济最重要的资源——感到安全。

另一条正在开发的路线是北方海航道（Northern sea route），这条航道是贯通中国与欧洲的重要航段，因为二者间的北极航运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俄罗斯的北部港口。预计到 2050 年，北极航道将会无冰。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都特别关注这条连接波罗的海和白令海、通过俄罗斯广袤北极地区的航道。在无冰期间，这条路线以提供更快的航行而闻名，吸引了各种各样全球参与者的兴趣。沿北方航道从中国大连到欧洲鹿特丹的旅程大约需要 33 天，而通过印度洋从中国到欧洲则需要 48 天。

节省时间与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使中国对北极地区的全球航运潜力越发关注。理解北极航道日益增加的效用，意味着承认俄罗斯和中国作为该地区政策制定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 2015 年俄罗斯批准了 2030 年前航道发展法令后，北方航道的海运量显著增长，从 2017 年到 2023 年几乎增长了四倍。

中国对北方航道日益增长的参与意愿体现在其 2018 年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和“十四五”规划中，文件强调了中国致力于极地区域合作。中国的利益被标记为“冰上丝绸之路”，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北极地

① Liu Yukun, Zheng Xin, “Shanghai set to get gas from Russia”, December 9, 2022,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212/09/WS6392b75da31057c47eba3977.html

② “Russia’s Putin upbeat on Power of Siberia 2 gas pipeline to China”, Reuters, October 17, 2023,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russias-putin-upbeat-power-siberia-2-gas-pipeline-china-2023-10-17/

区的组成部分。“冰上丝绸之路”旨在建立新的北极海洋航线，挖掘该地区对全球贸易连通性的潜力，并促进北极探索。俄罗斯对此表示欢迎，普京总统在 2017 年表示，“丝绸之路已经到达北方”。普京补充说，俄罗斯将把北方航道与中国的项目结合起来。2019 年，中国科学院和福州大学的中国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以了解哪些俄罗斯港口在让中国商船进入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方航道方面最具潜力。因此，在该领域的合作取得成果并不令人惊讶。从 2018 年中国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开始，北方航道的过境船次持续增长，从 2018 年的 27 次增加到 2019 年的 37 次，并在 2020 年进一步飙升至 62 次。在相关发展中，北方航道信息办公室 2023 年发布报告称，在过去六年中，交通运输量增长了八倍，从 2018 年通过船只运输的大约 1800 万吨增加到了 2021 年的超过 3000 万吨。①

为了充分利用航线的潜力，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2023 年 3 月，俄罗斯和中国同意建立工作组，对新航线进行详细规划，②预计其工作的具体成果也将在 2024 年得以展现。

中国和俄罗斯迫切需要的另一种基础设施是在金融领域，这是我们两国目前面临的第三个挑战。

2023 年，两国报告称，两国有超过 90%的贸易现在是以本国货币进行结算的。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回到 2020 年，那么情况恰恰相反：只有 10%的双边贸易是以人民币和卢布进行的，而 90%被美元占据。

尽管如此，两国在支付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最重要的是要避免西方对中国愿意与俄罗斯进行贸易的公司施加任何形式的打压。这只有在俄罗斯和中国都采用新的金融信息服务系统以替代 SWIFT 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如今，两国各自拥有自己的系统（中国的 CIPS 和俄罗斯的 СПФС），这些系

① “Arctic Ambitio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the Northern Sea Route”, Diplomat, November 24, 2023, https://thediplomat.com/2023/11/arctic-ambitions-chinas-engagement-with-the-northern-sea-route/

② Malte Humpert, “Putin and Xi Discuss Further Deepening of Arctic Partnership”, the High North News, March 24, 2023, https://www.highnorthnews.com/en/putin-and-xi-discuss-further-deepening-arctic-partnership

③ “Share of national currencies in Russian-Chinese trade reaches 90% – economy minister”, Tass, September 19, 2023, http://tass.com/economy/1676803?utm_source=google.com&utm_medium=organic&utm_campaign=google.com&utm_referrer=google.com

统需要整合或适应，以成为国际工具。这样的支付工具肯定会吸引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其他国家的注意，毕竟，这些国家也对来自美国控制的世界金融系统的打压感到担忧。另一种替代方案是使用国家数字货币进行银行交易，这样就不需要相应的银行服务。[①]中国在建立数字人民币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俄罗斯目前正在测试数字卢布。

同时，俄罗斯和中国的银行正在进一步走近。2023 年，包括阿尔法银行（Alfa Bank）和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Sberbank）在内的几家最大的俄罗斯银行宣布将进入中国市场。许多俄罗斯银行已经在俄罗斯境内的机构接待了许多中国客户。因此，中国客户自然乐见俄罗斯银行来到北京和上海，以支持双边贸易和投资。一些大型中国银行已在莫斯科相当活跃地开展业务。

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的第四个挑战是扩大前文提到的两个国际组织的规模。上海合作组织（SCO）和金砖国家（BRICS）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支持。在 2023 年决定将金砖国家成员国从 5 个扩大到 11 个之前，大约有 40 个国家表示愿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接纳伊朗为其成员国，白俄罗斯可能将在 2024 年跟进。

然而，扩大必须伴随着一体化的深化。上海合作组织有许多尚未实施的安全和经济倡议。至于金砖国家，它还没有获得一个完全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它仍然没有宪章、秘书处或其他管理机构、没有成员国规则。金砖国家需要深化而不是扩大，而这在拥有 11 个成员国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利益。[②]

金砖国家有巨大的潜力成为一个没有霸权、尊重所有成员的新型的全球联合体，中国和俄罗斯是两个可以引领这一进程的国家。2024 年 10 月，下一届金砖国家峰会将在俄罗斯举办，这给许多人带来了希望，认为这种团结将大幅向前发展。

俄罗斯和中国要完成的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任务是更好地了解彼此。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中俄两国老一辈人往往十分了解彼此的历史和文化，

① Ник Лухминский.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делают ставку на цифровые валюты. 8 апреля 2022 г. https://trends.rbc.ru/trends/industry/624ece339a7947bdeb3eef61

② Kirill Babaev, Sergei Lavrov, “In Scope and Depth: Ways to Strengthen BRICS’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3, No.4, https://eng.globalaffairs.ru/articles/in-scope-and-depth/

但许多年轻人并不熟悉当代俄罗斯或中国。

在过去的 30 年里，两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是指他们城市的外在面貌，还包括文化、生活方式和技术。我们需要相互学习，以便相互理解，并在商业、政治或科学等领域建立关系。我们的政府需要扩大教育和科学交流，促进体育和旅游业，以及我们两个社会之间其他形式的人道主义合作。这样的政策将建立起比我们在黑龙江上建设的桥梁更为坚固和持久的联系。

（**翻　译**　封　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

【**Abstract**】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within a new framework of partnership, China-Russia relations have rapidly developed and have become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new-type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s built on five pillars: close personal contacts between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a shared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humanity, the perfect neighboring relationship established by thoroughly resolving border issues, continuously enhanced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cultural affinity and historical memo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government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n both countries still need to continue their efforts, striving to achieve five forward-looking tasks. These five tasks include promoting the align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creating comprehensiv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outes between Asia and Europe,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expandi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BRICS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cultural exchanges to better understand each other.

【**Key Words**】China-Russia Relations, China-Russia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За последние 20 лет в новых рамках партнёр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быстро развивались и стали одним из лучших примеров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ового тип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строится на пяти столпах: тесные личные связи между лидерами двух стран, общее видение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будущего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деальных добрососед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тщательного разрешения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и продолжающееся укрепление двусторонне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а также культурной близости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С целью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ния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развитию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йскому и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м и всем слоям общества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продолжать усердно работать над достижением пяти задач. Эти пя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задач включают в себя продвижение связи инициативы «Пояс и путь» с Евразийски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союзом, создание полного спектра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транспортных маршрутов между Азией и Европой, содействи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у финансов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продвижение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БРИКС, расшир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и укрепление межличностного и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обмена для лучше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друг друг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координаци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дин пояс, один пу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вого типа

（责任编辑　崔　珩）

2024 年总统大选后的俄罗斯与中俄关系*

毕洪业　杨　波　叶甫盖尼·萨夫科维奇　谢尔盖·比留科夫
亚历山大·巴尔苏科夫　郑润宇

【内容提要】2024 年是中俄建交 75 周年。在 2024 年 3 月普京当选连任俄罗斯总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普京致电祝贺。俄罗斯将延续普京的执政理念与实践，应对百年变局之下的全球和地区挑战。俄罗斯国内社会和经济等方面体现出一定韧性，对外将长期面对俄乌冲突持续、后苏联空间国家离心、外交突围困难等带来的严峻国际形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陆续举办了涉及多领域的具有理念设计、平台构建意义的活动，并将主办金砖国家正式扩员后的首次峰会。作为俄罗斯外交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中俄关系在国际关系趋于紧张的背景下，显示出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双边贸易不断增长，民间交流规模继续扩大。在新的形势下，中俄两国仍然面临制度和结构性挑战、全球化扩散带来的挑战、文化文明挑战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挑战。这需要中俄两国继续优化对外政策协调策略；在务实领域合作的基础上应对多极化挑战、推动一体化进程，推进“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在理解国家发展特殊性、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基础上理解国家的文明特性，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动力，积极应对文化文明挑战；推动上合组织、集安条约组织等多边平台积极发挥作用，应对恐怖主义等地区问题，维护地区的安全稳定，包括各国的本土安全和海外利益；在应对地区、全球危机的具体行动中探索新型国际合作模式。

【关键词】中俄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　俄罗斯总统大选　乌克兰危机　国际反恐合作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2-0019(29)

* 2024 年 3 月 25 日，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期刊编辑部合作举办了“大选后的俄罗斯与中俄关系”学术研讨会。经会议主办方和相关学者授权，《俄罗斯研究》编辑部选取部分发言文稿，组成本期笔谈。

俄罗斯总统选举后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与中俄关系*

毕洪业**

随着俄罗斯总统大选的尘埃落定，普京毫无意外地第五次当选总统，而且是以超过 87%的高得票率当选。相应地，在俄乌冲突陷入僵局的背景下，俄罗斯现行的外交政策将得以延续，但中俄关系的巩固和深化仍将面临诸多挑战。

一、俄罗斯将长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

第一，普京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俄乌冲突在美西方的介入下陷入僵局，俄罗斯期待的与西方高级别政治对话进程将长期停滞。俄罗斯不但被踢出了全球新技术体系和主流金融经贸体系，而随着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入暂停状态，还面临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的压力。俄乌冲突固化了西方的反俄“政治正确”，“复活”了北约，加强了欧洲的团结、自我认同和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的战略依赖，切断了俄欧能源联系，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将走向长期对抗。2023 年 9 月 13 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了以“新时代美国外交的力量和目的”为主题的演讲，宣布“冷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已经终结”，数十年地缘政治的相对稳定已让位于大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①]欧洲安全秩序究竟走向何方还未可知，但可以看到的是，俄罗斯正面临难以承受的战略压力——特别是在个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构建‘后西方世界’及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07）的阶段性成果。

** 毕洪业，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双聘研究员。

① “Secretary Blinken Outlines the Power and Purpose of American Diplomacy in a New Era in Speech at Johns Hopkins SAIS”, September 13, 2023,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blinken-outlines-the-power-and-purpose-of-american-diplomacy-in-a-new-era-in-speech-at-johns-hopkins-sais/

别北约国家跃跃欲试要下场的背景下。相应地，俄罗斯再次成为国际恶人和西方的主要对手，在全球的信誉也急剧下降，将长期面临被孤立、封锁和边缘化的困境。

第二，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离心倾向仍将持续。俄乌冲突导致后苏联空间国家加快疏离俄罗斯，莫斯科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这突出表现在独联体集体安全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峰会都没有明确支持俄罗斯的立场，个别成员国甚至明确表示了反对或不满。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欧盟的斡旋下达成和平协议一事，将成为南高加索地区从由俄罗斯主导转向由西方主导的重要标志。亚美尼亚正加强与法国等北约国家的安全合作，未来不排除退出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而俄罗斯的军事基地也将被迫撤出，这对俄罗斯的整体安全防御体系的构想将造成巨大冲击。鉴于在俄乌冲突中的巨大挫败，俄罗斯目前的国家实力、政权统治及经济都非常脆弱，由它主导的欧亚秩序也在转向不确定的新欧亚秩序。俄罗斯显然对这种态势深感不安，然而其深陷对乌战争泥沼，有心无力，难以扭转其在南高加索失去影响力的局面。这表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地方霸权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三，俄罗斯在“非西方世界”的外交突围难以取得重大进展。俄乌冲突深刻地影响了国际格局的演变，美俄对抗加剧，俄罗斯希望得到中国的助力。美国还希望通过把俄乌冲突塑造成“民主与专制”的对抗来捆绑中俄，以强化自己的盟友及伙伴体系，对中国施压，展开阵营对抗。一方面，压力之下，俄罗斯一改模糊态度，愿意向中国单方面全面开放远东，以吸引中国资本进入开发。中俄合作对于俄罗斯抵抗西方制裁具有重要意义，但要面对美西方“长臂管辖”的压力。另一方面，在俄乌冲突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全球南方力量的兴起。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国既不公开和莫斯科断绝关系，但也不给俄罗斯提供政治支持。这一力量格局已经逐渐稳定，并成为俄、欧、美、中四方力量博弈中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有必要认真关注。围绕俄乌冲突，俄罗斯希望在非西方世界争取支持或至少使其保持中立立场。莫斯科与西方正在世界其他地区展开争夺，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特别是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更是极为被动。除了白俄罗斯、叙利亚等几个国家外，没有任何国家就战争问题在政治上支持俄罗斯，更别说经济和军事上。

二、中俄关系在国际关系紧张背景下仍上新台阶

第一，中俄关系不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近年来，尽管大国关系和地区局势急剧恶化，但中俄关系在元首外交引领下，政治和战略互信仍不断加深，包括《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得以顺利延期。在国际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俄元首仍实现了互访，对中俄关系发挥了关键性的战略引领作用。202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展开了国事访问，中俄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强调通过和谈解决乌克兰危机，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有助于为紧张的国际形势注入更多稳定性。2023 年 10 月，普京访问中国并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自俄乌冲突以来，普京首次访问全球主要大国，凸显了中俄关系的特殊地位。中俄关系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上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两国就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联合声明，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在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中俄继续在北太平洋进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中国、俄罗斯、伊朗海军还在阿曼湾举行联合演习，共同维护地区安全。此外，就巴以冲突等双方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中俄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一直保持着密切协调和配合。中俄还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扩员，促进了世界多极化进程。

第二，面对俄乌冲突引发的复杂国际环境，中俄贸易依旧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不断突破历史新高。中国与俄罗斯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这是中俄关系“内生动力”的基础。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全面制裁下的俄罗斯被迫加快战略“向东转”，以期实现外交突围和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在此背景下，对华贸易的重要性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中再次得到提升，贸易额不断创出历史新高。中俄双边贸易额从 2021 年的 1407 亿美元跃升到 2022 年的 1902 亿美元，再到 2023 年的 2401 亿美元，连上新台阶。相应地，为避免外部干扰，中俄积极推进双边贸易中的本币结算进程，目前中俄两国之间超过 90%的贸易实现了本币结算。普京总统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同俄罗斯倡导的欧亚联盟体系的建设高度吻合，俄罗斯愿意推进两者进行对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除了在能源开发和

管线建设方面密切合作，中俄两国还积极推进了核能、基础设施、太空项目开发以及北方航道等领域的建设。此外，中俄还就共同创建一个规模超过100 亿美元的民用航空产业发展基金进行积极磋商，该基金的投资领域不仅限于航空业，还将覆盖航天、数字与节能技术以及大数据等领域。

第三，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俄民间交往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持续扩大民意基础。随着疫情影响的结束，中俄都希望尽快恢复民间交往和深化地方合作。自 2023 年 2 月起，中国开始试点恢复公民出境团队游，俄罗斯位列首批 20 个试点国家之中。中方还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分别设立签证服务中心，为俄公民来华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8 月起，俄罗斯对中国公民开放电子签证，使赴俄旅游或商务出行更加便捷。为方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中俄还启动了双方部分口岸之间互免签证团体旅游业务，为两国的人文交流和商业活动提供了更多机会。中俄双方主管部门还正积极推进关于签署新的中俄互免团体旅游签证协定的筹备工作，计划在 2024 年完成所有程序。中俄高校教育交流活动也全面恢复。2022—2023 学年有一万多名中国学生参加了大学生交换，有 7000 多名俄罗斯大学生在中国高校学习。随着《2030 年前中俄人文合作路线图》教育方面内容的逐步落实，双方交换生规模、大学合作范围及领域等都将再次扩大。2024 年是两国建交 75 周年，双方将共同举办中俄文化年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三、中俄关系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第一，美西方全面对俄制裁恶化了中俄关系的环境。西方对俄罗斯的第十三轮制裁明确指向第三方，使中俄之间军事贸易领域的合作难以展开，民用领域的合作也受到影响，一些中国企业已经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美西方对俄罗斯的极端制裁更严重恶化了俄罗斯国内的营商环境和市场规模，也给中国在俄企业和对俄出口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一些企业已经被迫撤出俄罗斯。由于俄罗斯被排除出全球金融通信网络 SWIFT，中俄之间的经济合作还面临支付系统和货币选择问题。

第二，由于核心国家利益的差异，中国和俄罗斯都会选择规避更密切合

作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也将影响两国全力结合自己的力量并更有效地对抗美国的遏制。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在战略利益追求上也并非总是一致。中美军事和政治对峙主要集中在南海和东海，特别是台湾问题上。而俄罗斯与该地区的利益联系并不紧密，并且在远离中国的欧洲东部已经有了自己的战略紧张区，也就是乌克兰问题。

第三，中俄之间尚存互信缺失的问题，不仅在两国政治和商业精英之间，也存在于民间。互信缺失的根源在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问题，包括挥之不去的历史积怨、明显的人口差异以及日益加剧的权力失衡。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俄罗斯的 10 倍，人均 GDP 也历史性持平。中国成为俄罗斯难以替代的贸易伙伴，而俄罗斯却不能为中国提供任何不可替代产品。从俄罗斯重视陆上安全的传统观念来讲，俄罗斯接受与自己拥有漫长边境线和历史恩怨的强大中国，并不容易。

第四，要准确把握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仍要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要不断增强中俄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中俄现有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功能上的弹性，符合双边关系发展的现实，既吸取了历史教训，也符合国内政治现实和法律基础，不存在双方结盟的问题。当前的中俄战略协作有利于应对美国的遏制，但也不失我对美对话与合作的空间。

第五，中俄经济合作要坚持市场原则、企业主导，战略协作要坚持为自己的发展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为目标，要细算外交投入与收益账。在对俄合作项目中往往强调对数量的追求，忽视了对项目质量的实际效果评估，导致一些项目被搁置，为此，要加大项目跟踪，重视落实，并将其与之后的合作项目挂钩。

第六，可以继续加强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合作，特别是推进“一带一盟”对接由贸易便利化向自贸区的发展，这对中国对外自贸区战略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以加快上合示范区和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总结经验，推广扩大，探索形成一批在中国具有开创性的对俄贸易的创新成果。此外，应俄罗斯要求，中俄可以就远东开发展开谈判，包括投资细节及保护，开发权限及年限等，特别是在油气资源并购中要努力争取更有利条件。

俄罗斯大选后的内政外交走向*

杨　波**

2024 年 3 月 21 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总统选举结果，现任总统普京以 87.28%的得票率当选，可以继续执政到 2030 年。大选结果不仅按预期实现，而且其他候选人得票率均符合克里姆林宫预期，说明俄罗斯社会政治力量分布有利于克里姆林宫的规划。在当前俄罗斯面临的复杂局面下，普京高票当选，说明选民总体上支持其执政方针，希望普京继续领导俄罗斯，带领俄罗斯向前发展。大选后，俄罗斯将延续普京的执政理念与实践，应对百年变局之下的全球和地区挑战。

政治上，俄罗斯社会稳定性有保障，治理模式将保持中央集权。普京将继续奉行既定的政治方针，捍卫俄罗斯主权、国家利益和传统价值，在对俄罗斯有利的情况下努力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普京的第五任期开启后，俄罗斯政府面临重新组阁，民众期待新一届政府推出新政策、新举措，落实普京 2024 年 2 月国情咨文中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回应选民对俄罗斯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

随着普京的胜选，“后普京时代”问题也将在未来六年逐步提上日程。面临执政精英的代际更替，俄罗斯政坛亟需新面孔、新思想、新气象。普京在大选前的国情咨文中单独谈到了俄罗斯未来精英培养的问题，指出有资格引领俄罗斯未来发展的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有责任感，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经过特别军事行动历练的官兵可优先参与“当代英雄”后备干部项目。

经济上，俄罗斯更加强调自主，经济军事化和准军事化倾向加剧，结构改革将滞后。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经济制裁，总计 13 轮，共两万多项，试图以制裁压垮俄罗斯。参与制裁的国家和地区 GDP 之和，按汇率计算占世界

*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课题“‘一带一路’视域下大国在中亚的软实力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114004）阶段性成果。

** 杨波，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经济总量的 60%，科技创新研究费用占世界研究费用的 70%，这是俄罗斯千年历史上未曾遭受过的严厉制裁。制裁使俄罗斯遭到巨大损失，但没有出现西方国家预期的经济崩溃。俄罗斯政府迅速出手稳定金融秩序，国家财政实现了平衡，国债规模增长不快。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2 年俄罗斯 GDP 为 5.51 万亿美元，高于德国的 5 万亿美元，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世界排名从十年前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五位。[①]普京认为，“这表明经济的复苏阶段已完成，俄罗斯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和制裁冲击”[②]。2023 年俄罗斯 GDP 增长了 3.6%，为过去十年第二高增速，仅次于新冠肺炎疫情后反弹增长的 2021 年。[③]

2022—2023 年，军工产业及上下游产业链联动对拉动俄罗斯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建筑业异军突起，农业、进口替代表现也相当亮眼。俄罗斯在制裁压力下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经济韧性。但目前俄罗斯出现的经济韧性主要表现为稳住经济的基本盘，是一种阶段性的经济韧性，而不是基于参与全球分工、优化产业结构、加速科技进步等竞争优势之上的经济韧性，不具有长远的持续发展能力。在乌克兰危机和谈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需为国防开支分配必要的资源，不断提升科技水平，扩大工业产能，为特别军事行动持续提供保障。俄罗斯经济近期将在当前的战时经济体系内运行，倚重能源和军工的经济结构短时间内无法得到结构性调整。随着 13 轮制裁“滞后效应”的不断释放，加上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性脆弱以及延伸效应，俄罗斯经济能否保持当前的增长态势仍需观察。

外交上，俄罗斯力争在避免与西方全面冲突的前提下打赢乌克兰战争，扩大与“友好国家”、“全球南方”的合作。普京在大选前夕发表国情咨文时强调，俄罗斯不会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单独谈判，俄罗斯将从国家利

① “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2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World Bank, July 1, 2023, https://databankfiles.worldbank.org/public/ddpext_download/GDP_PPP.pdf

② “普京：俄罗斯的经济恢复阶段已经完成，俄罗斯顶住了制裁压力”，2023 年 9 月 18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30918/1053457317.html

③ 2023 年俄罗斯宏观经济数据参见 О текущей ситуац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тоги 2023 год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7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directions/makroec/ekonomicheskie_obzory/o_tekushchey_situacii_v_rossiyskoy_ekonomike_itogi_2023_goda.html?ysclid=ludzx8batd578946986

益、国家安全和周边稳定的大局出发，全盘评估和磋商影响全球战略安全稳定的重大问题。此次普京胜选继续执政有利于打赢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将持续扩大战果，并根据战场及与美国和西方博弈的情势使战果最大化，与此同时，努力避免与西方全面、正面冲突。核威慑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利用。

在处理同非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俄罗斯正从理念设计、平台建设、外交实践上大力深化与“全球南方”的关系。一方面利用现有多边机制加强与“友好国家”的合作，包括深化欧亚经济联盟内的合作，继续加强俄罗斯-东盟、俄罗斯-非洲对话，全面巩固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强化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作用等。2024 年，俄罗斯将主办金砖国家正式扩员后的首次峰会，相关筹划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目前，俄罗斯方面已为喀山峰会制定了一揽子政治安全、经济金融、教育人文议程，积极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政治方面重点支持新成员国平稳和谐融入金砖机制，以“拓展”[①]和“金砖+”合作模式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各种发展中国家组织；经济金融方面合作抑制多边国际贸易机制碎片化，应对新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反对非法实施单边制裁，协调金砖国家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合作；教育人文方面加大力度建设金砖国家网络大学和金砖国家职业教育联盟。

另一方面，设计新理念，打造新平台，积极推动亚非拉“抵制新殖民主义”议程和青年运动。2024 年第一季度的短短三个月内，俄罗斯官方就密集推出了“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国际政党论坛、首届欧亚哲学大会、2024 年世界青年联欢节（Всемирный фестиваль молодежи 2024）等多场重磅多边外交活动。由统一俄罗斯党倡议并筹办的首届“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国际政党论坛于 2 月 16 日在莫斯科举行，论坛以“为了各国的自由”为主题，邀请来自亚非拉 55 个国家的近 400 位政党代表与会，[②]就反对干涉主权国家内政，消除新殖民主义遗毒，维护政治、经济、信息独立等议题交换意见。

① “金砖+”合作模式 2017 年由中国首倡，俄罗斯为凸显自己对金砖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模式上的创新，在“金砖+”的基础上提出了“拓展”（Outreach）合作模式，参见 2024 金砖喀山峰会官网 https://brics-russia2024.ru/en/russia-and-brics/priorities/

② См. Китай заявил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вместе с дру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бороться с неоколониализмом. 16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20004859?ysclid=lue28dln7t225815838

首届欧亚哲学大会于 2024 年 2 月在莫斯科举行，来自中美法德等国家的 120 余位代表参会，围绕欧亚新秩序、哲学的未来性、世界哲学地图上的全球南方、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当代价值、后现代主义等问题展开论辩。[①]2024 年 3 月在索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则吸引了来自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 万多名青年参与，普京总统出席闭幕式并致辞。[②]三场活动从组织机制、思想理念、青年运动三个层面积极塑造俄罗斯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国际形象。

2024 年是中俄建交 75 周年。中俄关系具有独立自主的价值，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之上，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在过去的 2022 年和 2023 年，中俄关系保持了健康发展，有利于欧亚地区稳定，有利于世界和平，也有利于中俄两国。2023 年双方贸易额突破历史纪录，达 2411 亿美元，提前并且超额完成两国领导人在 2019 年提出的到 2024 年使双边贸易额达到 2000 亿美元的愿景。2023 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1.07 亿吨，俄罗斯取代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这个数据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对于中国，都具有战略意义。

当今世界仍面临着各种结构性、系统性危机，中俄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发展，仍需双方加强协调，提高效率，拓展领域，共同做好战略谋划。例如，如何保持去年双边贸易本币结算超过 90%的良好势头？如何打造相互融通的产业链和科技链？如何推动中俄地区合作走深走实？这些都是维持中俄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中俄关系是俄罗斯应对与西方关系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国运筹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战略的重要因素。普京就职典礼结束后大概率将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共商双边关系、全球和地区议题。俄罗斯期望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内加强欧亚安全框架建设，需要中国的支持与配合，欧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离不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① 五场分论坛的主题分别为“文明对话抑或文明冲突？当代世界的欧亚方案”、“哲学未来主义·未来的思考与挑战：人与新技术”、“民族多样性：世界哲学地图上的东方与全球南方”、“‘俄罗斯思想’与当代：纪念别尔嘉耶夫诞辰 150 周年”、“后现代之后：谁将幸存？传统价值观 vs 新自由主义伦理”。具体内容参见会议官方网站：https://eaphilcong.com/?yscl id=lue2hen4tb103340420

② “俄罗斯 2024 世界青年联欢节开幕”，2024 年 3 月 7 日，https://m.gmw.cn/2024-03/03/content_1303677390.htm

2024 年上半年俄罗斯的外交和国内政策选择

叶甫盖尼·萨夫科维奇*

1. 外交政策形势。对于俄罗斯联邦来说，最近出现了一种相当矛盾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那就是，俄罗斯既不被当代西方认为是西方的一部分，也不被东方认为是东方的一部分。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俄罗斯联邦尝试融入欧洲空间，融入它的各种机制（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俄罗斯–北约”理事会、联合能源开发计划）；而 2010 年代的后半期，俄罗斯出现了所谓的“转向东方”，西方作为外交政策面向的重要性下降。此外，俄罗斯不得不解决自身发展的问题和部分周边“后苏联”国家的问题，包括依靠对于周边地区的组织。这样就出现了‘大区域’（макрорегион）这个概念，即“大欧亚”（或者说是“大欧亚空间”）。规范意义上的大区域是指贸易区，在整个欧亚大陆的拥有共同市场和安全保障。2010 年代后半期到 2020 年代初，由于一些商品流动的重新定位，“转向”开始成为现实。此外，“北南”走廊计划正在积极发展，有关形成通往印度洋新运输通道的相关协议正在陆续签署。在 2022 年以及乌克兰冲突爆发以后，这些联系变得更加重要。

2. 危机现象和概念的混合。对于许多研究人员来说，危机，甚至一系列危机现象，都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但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看法，因为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现象）还没有暴露彻底。在许多国家，它表现为结构性危机，也有人说这是系统性危机，甚至是阶段性危机。在“北溪”管道遭到毁坏后，危机成了能源的，进而发展为经济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系的不同要素参与其中，而危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影响着各类相关的领域。特别是在高水平认证、利用所谓‘标准’关闭市场和能源价格高企的背景下，欧洲的工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在欧元区发生危机的背景下，个别国家之间的一些内部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这些国家在运输货物时越来越多地

* 叶甫盖尼·萨夫科维奇（Евгений Савкович），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东方学系教授。

使用保护屏障。也可以注意到，作为农产品生产者的农场主罢工并推高价格。

还可以观察到国际法的危机，国际法已经被西方国家推行的“基于规则的秩序”所取代，而这种“秩序”损害了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其他参与者。

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强调“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的作用。然而，这些术语只是在理论上运作良好，实际上在实践当中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在“民主峰会”的框架下（最近一次是 2024 年 3 月 18 日至 20 日在韩国举行的第三届“民主峰会”），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干脆就没有被邀请，并且事先就被自作主张地认定为是“民主”的或“不民主”的。另外，“软”“硬”实力的概念正在混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推动的都是“软”实力，而许多国家这方面的能力降低了，使军队专业化，拒绝了某些方面的现代化等等。实践表明，这也是错误的决定。

3. 信任危机。在这一方面，对于俄罗斯联邦而言，重要的不仅是撕毁了那些“写好的”规则和条例，还包括那些还没有形成文件的、尚处在讨论和缔结过程中的“正在写作的”协议。如果某些领导人对俄罗斯外交的信任度仍然很高，那么就不可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进行任何谈判。《明斯克协议》的结果和目前冲突期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多次无法进行的情况，都表明了这一点。事实证明，在西方，根本没有可以与之谈判的人。这也可以用欧洲国家精英的负面选择来概括或解释，这些精英后来成为跨国精英，并不反映本国人民的意见。这实际上也可以概括为西方精英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统根本看不到可以对话的人物。而“当你不说时，他们也听不到你”——对话终止之后，就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共和党和记者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组织了某种“信息突破”，他在国外反俄势力的支持下来到莫斯科采访普京总统。这一事件以及各种平台上播放的采访的各个部分，都在向总统和观看采访的观众展示自己在安全方面的立场。主要还是俄罗斯的安全和北约东扩的问题。信任危机的解决在于政治精英的更替——因为西方的运作有其政治周期性逻辑——可能会出现在不久之后的 2024 年至 2025 年。更复杂的情况是反俄立场和虚假新闻，这些已经成了实际信息议程的一部分，并且已经无法从非西方社会中删除。

4. 预测。俄罗斯 2024 年的选举周期和春季的总统选举显示了人民对总

统的普遍支持。在随后的演讲中，普京宣布了 2030 年前的一些计划和预测，其中一些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有关，并确定了一些新的方向。可以用“家庭、稳定、发展”来概括。

一方面，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普京总统通常不会做出毫无根据的决定，他的特点是权衡立场。另一方面，根据目前的立法，有必要解散现任政府并任命一个新政府。但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政府总体“权力”将会被保留，至少，谢尔盖 •绍伊古（Сергей Шойгу）和瓦列里 •格拉西莫夫（Валерий Герасимов）会留下来。这些变化可能会对不是那么关键的副总理职位（政府中的具体监督部门）产生影响。外交系统可能更新。与中小国家之间的跨境运输、物流等方面的合作将继续，中亚国家和高加索国家将发挥重要作用。

对话仍然应该是发展合作的最重要因素，但目前来看，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可能再推进这一机制。俄罗斯支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树立新的价值观。所以，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安全倡议在俄罗斯有许多支持者。新的外交和新的国际关系正在形成和发展，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在 2022 年 2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主席会谈后得到了巩固，当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①]。该声明说明了新世界秩序的要素、基本方向，并对一些概念作了解释。

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情况——首先，在确保维持和平进程及斡旋方面需要做出更多积极努力，并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在乌克兰问题上，还有中东问题。而这也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治理、国际法体系形成和发展方面的作用和参与的增加。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所提供的道路选择和“中国梦”，是在美国长期以来构建的单极世界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因此，在科学界、学术界以及我们国家的公共空间交流意见并推广这些理念对于实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

（翻　译　宋羽竹，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5 日第 2 版。

2024 年总统选举之后的俄罗斯和中国*

谢尔盖·比留科夫**

关于 2024 年 3 月 17 日俄罗斯总统选举后俄中关系形势，我想与尊敬的听众和学生们分享以下思考：

2024 年 3 月 17 日举行的选举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将有助于对现有政治体系进行有组织的“重启”，并赋予其新的合法性，促成国家政治阶层和民众之间达成新的共识。这次选举关乎动员共识（而非之前的稳定共识）。与此相关的是俄罗斯民众的一系列“自我约束”，并确认他们愿意为了国家长远利益而做出某些牺牲。

与此同时，动员的趋势也很明显。预计不仅会在军事领域展开，还将涉及经济（加强国家对关键企业和行业的管控，进一步将经济引向军事轨道）、意识形态（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垂直体系）和社会（与具有爱国情感的公民社会展开对话，吸引他们参与国家活动）等多个领域。总结来看，动员逐渐成为俄罗斯政治的主要内容。

此外，精英阶层也在经历重大变化：自由派群体的实力减弱，爱国派群体的影响力增强，同时吸引新的管理者（包括强力部门和技术官僚）以及表现突出的地方领导者进入权力核心。这些变化也在平稳和渐进地进行，旨在达成新的共识，避免过度激烈的变革（波动）破坏当前进程的可控性。中央银行行长埃尔维拉·纳比乌林娜的辞职正是这种性质预期变化的一个例子，这将意味着自由经济支持者的减弱，支持经济动员的精英群体相应增强。

2012 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以反对“橙色革命”的口号进行，当时总统支持者联盟由来自不同政治力量（包括左派和右派）的代表组成。与此不同，2024 年的选举活动是以渐进和从容的方式进行的，背景是与西方国家的激烈对抗，现任总统的地位毫无争议。普京总统不用过早确认自己参加选举，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乌冲突与普京的‘后 2024’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10）的阶段性成果。

** 谢尔盖·比留科夫（Сергей Бирюков），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俄罗斯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西伯利亚管理学院教授。

随后“统一俄罗斯”党领导层也如期宣布将支持普京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对总统的支持者动员是逐步进行的，并没有强加于人，这意味着现任总统对选民基础的多样性有所认识（其中不仅有后来的支持者，他们是因为动员的发展选项而回过头来赞成的；也有一直以来的支持者，他们支持总统是希望继续保持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俄罗斯总统深知，各类选民对政治体系的主要诉求和愿望都集中在他身上；普京在最后一次与选民的直接对话中，表示愿意听取各类选民的意见和诉求；与 2012 年以“反对橙色革命”为主题的总统选举活动不同，尽管当前特别军事行动仍在进行，但 2024 选举活动中出现“强硬”言辞的情况要少得多。

选举结果表明，俄罗斯政治体制经历了如此紧迫的演进重启，并获得了新的合法性。总的来说，普京展示了他对当今构成其权力体系结构基础的主要垂直领域（包括总统权力、政府、经济、军事力量和信息）的自信控制，并可作为必要时的动员工具（动员与具体垂直领域相关的资源以及更广泛地动员俄罗斯选民的政治偏好）。与以往的选举相比，新的特点体现在竞选活动的“混合”性质，将动员和稳定的口号、军事和纯粹民事问题结合在一起。2024 年的选举活动希望最大限度地覆盖几乎所有面向俄罗斯总统的选民群体（从退休人员到军人），这在 2012 年和 2018 年都未达到如此规模，并且针对不同选民群体的宣传也有所区别，可称得上是本次独有的新特点。

俄罗斯总统选举已经演变成一种实质上的全民投票，涉及对普京总统及其政治路线和战略的信任。特别是在面临重大考验的年份，全民投票作为人民表达意愿的一种特殊形式，彰显出其现实意义和有效性。可以预测，2024 年总统选举的成功将使普京总统在乌克兰问题上获取更多回旋余地：既有可能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展开短期强有力的行动，也有可能开展更长期和逐步加强力度的针对性行动。俄罗斯也有机会以更强势的谈判立场，通过政治途径结束军事行动。与此同时，普京在取得总统选举的预期胜利后，有望凭借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支持，将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路线从有条件的自由主义转变为更具动员性、保护主义和社会导向性。此外，这也为在新的基础上巩固俄罗斯社会提供了机会。

对于与俄罗斯对立的一方来说，他们期望对俄罗斯社会和政治体系的破

坏显然未能实现，反而是俄罗斯社会的团结进一步加强了。进行特别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没有重复 1917 年 2 月的情况，当时俄罗斯帝国在一战中由于后方动荡而导致了军事失败。在“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发生的大规模、空前残酷的恐怖袭击事件，显然是旨在制造大规模公众恐慌。

在总统选举后，俄罗斯有机会在和平解决方案和军事方案之间做出选择，一切都将取决于与俄罗斯对立的一方是否愿意并准备好达成尊重俄罗斯战略利益的建设性协议。由于选举结果，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机动空间扩大了，西方国家试图通过以少数国家的观点代表全球共识来孤立俄罗斯的尝试已经失败。

此次选举结果为中俄伙伴关系在经济、对外政策和社会人文领域注入了新的动力。我们期待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充分利用这些新机遇，因为有效的协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在俄罗斯总统选举后的形势下，中国提出旨在化解乌克兰危机的和平倡议和努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些倡议和努力无一例外地得到了俄方的高度评价，但尚未得到西方国家应有的恰当评价。

当代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长期规划其政策并确定全球战略的国家之一。今天，捍卫自己主权和以拥有主权和完整主体的身份参与解决重要国际问题权利的俄罗斯，谋求并准备成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构建新的国际关系架构和更加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秩序。

（**翻　译**　*石　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世界秩序变革背景下的俄中关系

亚历山大 • 巴尔苏科夫*

俄中两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该条约明确了两国之间的共同边界。然而，两国对话和交往的全面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的历程。1949 年 10 月 2 日，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解体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 1991 年 12 月 24 日承认俄罗斯联邦为苏联的合法继承国。1992 年至 2000 年，俄中两国元首签署并通过的中俄联合声明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将近 25 年后的今天来看，在 2000 年 3 月 26 日的总统选举中，俄罗斯公民可谓是投下了对国家未来的信任票。在一年多以后的 2001 年 7 月 16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是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建立在互信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基础之上的。

在俄中两国的现代历史中，学术界对价值观、文明发展以及基于安全、伙伴关系、平等的未来世界愿景等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然而，西方不仅谋求世界政治霸权，还试图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危机的背景下进行文化秩序的扩张，导致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和对抗日益加剧。在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受到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外政策举措向世界展示了建立公正和多极秩序的可能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作为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发展、安全、文明对话倡议新视角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2019 年，为纪念俄中两国建交 70 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发表了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冯绍雷教授正确地指出，西方的现代发展模式

* 亚历山大 • 巴尔苏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Барсуков），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在当前阶段需要修正，并且需要深入研究多种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俄中新时代合作的特点是支持一体化进程，这体现为“一带一路”倡议和致力于实现和平稳定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然而，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日益恶化的全球经济危机，又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挑战。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着重指出双方要加强和发展对外政策沟通协调，深化和扩展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相互理解和人民相知相亲。两国领导人指出，俄中合作对世界的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欢迎中国就政治和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出的主张。

因此，在两国建交 75 周年之际，俄罗斯总统选举备受瞩目。2024 年 3 月 15 日至 17 日的总统选举结果显示，弗拉基米尔 •普京获胜，获得了 87.28% 的选票支持。许多人认为，这次选举是对俄罗斯国内发展计划和战略方针的信任投票。

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有前景的研究和讨论方向，以更好地了解新时期俄中关系面临的挑战。

1. 制度和结构性挑战——阐明理解政治体制变革，分析俄中两国在实现战略稳定道路上可采取的对外政策协调策略的重要性。

2. 全球化的扩散——从发展经贸和物流运输合作的角度理解公平的多极化的挑战和一体化进程的潜力。从全世界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共同寻求对“大欧亚伙伴关系”发展的理解。

3. 文化文明挑战——分析俄罗斯和中国的现代性和国家发展的特殊性，以此作为理解文明特性的基础。开发人文合作和学术外交的潜力。

4. 俄中关系挑战——作为应对局部和全球危机趋势的新型国家间合作模式典范的双边关系。

因此，我们两个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尊重主权和文明道路的典范，而俄中两国在新时期的政治思想更加强调在内政外交政策中以道义和正义为基础，而不是霸权主义。

（翻 译 石 靖，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4 年俄罗斯总统大选后中俄反恐合作的分析与前景展望*

郑润宇**

一、大选前后中俄遭遇的新一轮恐怖主义危机与挑战

2024 俄罗斯总统大选落幕不到一周，中俄两国分别遭遇了巨大的国际恐怖主义袭击。3 月 23 日，俄罗斯莫斯科州“克罗库斯城”音乐厅遭受袭击，恐怖分子对音乐厅的人群进行大规模杀戮，并纵火焚烧会场，造成上百人死亡。这是俄罗斯自别斯兰事件以来遭到的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袭击发生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机构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声称对此事件负责。

而中国位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项目也陆续遭到恐怖袭击。2024 年 3 月 20 日，距离瓜达尔港口仅 7 公里的行政大楼遭到袭击，5 名当地安保丧生。俾路支解放军（BLA）的马吉德旅宣称对此负责。3 月 26 日，中方企业承建的开普省达苏水电站项目车辆遭遇恐怖袭击，5 名中方人员和 1 名巴方人员遇难。

面对暴力类型相似、源头相近的几起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使得俄罗斯维护本土安全与中国维护海外利益产生了更多的共识。中俄双方长期存在的反恐合作机制，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更紧密地合作，并在应对新的挑战中提升合作的深度。同时，中俄有必要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多边反恐平台，加强联合反恐，推动区域安全稳定。

二、恐怖袭击执行者：危险性评估

“伊斯兰国呼罗珊”（Islamic State of Khorasan）是极端组织“伊斯兰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乌冲突与普京的‘后 2024’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10）的阶段性成果。

** 郑润宇，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讲师。

国”最活跃的分支机构之一，现在甚至已经成为其中最危险的分支。该组织奉行萨拉菲圣战主义意识形态，旨在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部分地区和印度建立一个哈里发国家，以“激进和强硬的方法”闻名，影响范围广泛，极其野蛮和残忍。该组织于 2014 年年底在阿富汗东部崛起，由巴基斯坦塔利班叛军和宣誓效忠已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当地武装分子组成。与 2018 年左右的高峰时期相比，该组织在阿富汗的成员数量已有所下降，但这一组织仍然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构成重大威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受到严重打击后，残余势力和相关组织却试图在包括南亚地区在内的全球范围内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2018 年以后，尽管阿富汗本土的叛乱活动有所减少，但“伊斯兰国呼罗珊”仍在扩大自己的宣传影响力和外部行动能力。已成功袭击了伊朗、马尔代夫、土耳其和塔吉克斯坦，现在目标直指俄罗斯。此次莫斯科恐怖袭击有“伊斯兰国呼罗珊”的背景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该组织一直在利用其中亚成员进行外部行动。①

莫斯科目前已成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组织“广泛宣传战”的焦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认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对自己构成直接威胁，特别是俄罗斯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军事干预，而且与伊朗的关系密切。此外，俄罗斯雇佣的军事人员与黎巴嫩真主党在叙利亚共同作战，使莫斯科成为维护什叶派利益的先锋。瓦格纳集团在非洲的活动进一步激起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愤怒。②除此以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袭击俄罗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阿富汗塔利班因素。塔利班是“伊斯兰国”的死对头。俄罗斯的亲塔利班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伊斯兰国”对俄罗斯采取行动。

在阿富汗地区，近年来曾多次发生该组织主导的针对中国人的恐怖袭击。在美国撤离阿富汗以后，此类恐怖袭击更加明显了。2022 年，“伊斯兰国呼罗珊”公开了一段 48 分钟的视频，明确对中国发出恐怖威胁，并在

① “莫斯科音乐厅袭击：‘伊斯兰国’为何针对俄罗斯？”2024 年 3 月 24 日，https://chinese.aljazeera.net/news/2024/3/24/莫斯科音乐厅袭击伊斯兰国为何针对俄罗斯

② Lucas Webber, Peter Smith, Colin P. Clarke, “Moscow attack signals broadening footprint of ISKP’s Central Asia contingent”, March 29, 2024, https://eurasianet.org/moscow-attack-signals-broadening-footprint-of-iskps-central-asia-contingent

2022 年 12 月对中国在阿富汗运营的酒店发动了恐怖袭击。

与对俄罗斯的不满类似，“伊斯兰国呼罗珊”针对中国发动恐怖威胁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伊斯兰国呼罗珊”标榜自己是全球穆斯林“圣战”的先锋，对中国的新疆政策不满，“同情”并支持对中国新疆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极端势力，公开招募并收编了许多“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武装人员。[①]“伊斯兰国呼罗珊”对中国新疆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外部威胁。第二，“伊斯兰国呼罗珊”与阿富汗塔利班矛盾严重，近乎水火不容，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差异和权力争夺两个方面。“伊斯兰国呼罗珊”更崇尚暴力和极端主义，与塔利班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目标形成对比。“伊斯兰国呼罗珊”对于更有地方色彩以及实行灵活政策的塔利班极为反感；同时，该组织试图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扩大势力范围的做法已经直接威胁到塔利班的根本利益。中国与塔利班的关系也使“伊斯兰国呼罗珊”将中国视为“敌人”。

对中国的海外利益，特别是中国在巴基斯坦的重大投资项目构成直接安全威胁的，是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以及巴基斯坦塔利班等巴国内的恐怖主义地方武装力量。

中国“一带一路”基建项目的一个重点，是建设一个公路铁路网络，将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西南部的阿拉伯海连接起来，实现中国通往中东、欧洲、非洲的最短的陆地和海洋路线，而位于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港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战略地位地位极其重要。俾路支省与伊朗及阿富汗接壤，是巴基斯坦最不安全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发生的许多暴力事件也被视为对中国基建项目的反应。2021 年，一辆运载工程师前往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水坝建设工地的巴士遭到炸弹袭击，造成包括 9 名中国工人在内的 13 人死亡。2022 年，一名俾路支解放军自杀式袭击者在卡拉奇制造恐怖袭击，导致 4 人死亡，其中包括 3 名中国的语言教师。

这些恐怖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巴基斯坦内部的地方力量与巴基斯坦政府长期存在矛盾造成的。例如俾路支地区一直非常反感巴基斯坦政府从国家

① Roshni Kapur, “The Persistent ISKP Threat to Afghanistan: On China’s Doorstep”, January 6, 2022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persistent-iskp-threat-afghanistan-chinas-doorstep

层面剥夺其地方的重要资源，认为在该地区的俾路支人未能获得公平的财富分配，长期落后和贫困。因为有这种不满的怒火，在巴基斯坦政府将地方的重要项目接受中国投资时，地方武装力量就转而攻击中国的投资项目。巴政府经常会为外国投资项目的安全保护配备巴基斯坦安全力量。针对这些安全力量的攻击，直接对项目中的中国人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此类恐怖主义分子在袭击过程中，个人色彩较重。在这些人中有很多人过去与极端主义组织有联系，如今他们独立运作并承接袭击任务，自行招募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实施袭击。[①]一定程度上，这种恐怖袭击产生的背景，与俄罗斯瓦格纳在非洲的行动与包括“伊斯兰国呼罗珊”在内的有关势力产生矛盾的情况相似。

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与“伊斯兰国呼罗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他们对区域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理清两者的差异，这对于防止这两股力量对区域安全的破坏尤为重要。虽然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反对现有政府的统治，但他们的目标、动机和手段有着很大的不同。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的目标更多是基于地区和民族的，而“伊斯兰国呼罗珊”的目标则是基于对伊斯兰教法的极端解释。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由于他们的目标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两者更有可能是竞争甚至敌对的关系，而不是合作伙伴。“伊斯兰国呼罗珊”的极端主义和对全球伊斯兰哈里发国的追求与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的民族主义和地区自决的目标是不兼容的。

需要注意的是，地区冲突和反叛活动的复杂性，意味着实际情况可能会随时间和环境而变化。各组织之间的动态关系可能会因战略需要而发生改变，包括短期的利益驱动的联盟。

三、被利用的“混合战争”，思考其背后的因素

深入观察被袭击方中国与俄罗斯在当前大的变动国际环境中的特殊角

① “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人为何成为袭击目标？谁组织了这些袭击？”2024 年 3 月 28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68681642

色，让人不得不思考和怀疑背后是否有更复杂的因素。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我们知道恐怖袭击是由谁实施的，我们的关注点是策动者。”①

当前中俄所面临的恐怖袭击，其背后的动机和责任组织可能多种多样，包括地方武装团体、民族分离主义者以及恐怖主义组织。尽管在表面上，看发动袭击的恐怖组织及目标存在差异，但所使用的手段和背景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都是在共同的、复杂变动的国际大背景下发生的。

恐怖主义被用于混合战争，煽动种族和宗教仇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塔斯马甘贝托夫·伊曼加利（Тасмагамбетов Имангали）认为，当前恐怖主义有了新的特点，并被用作混合战争的工具，从而引发对当局行动的不满、内乱、种族间和宗教间的纷争。这种形式的恐怖袭击越来越像是破坏行动。对动机的误解和种族间关系的尖锐化给社会带来了额外的压力。②大国之间也未能制定一个普遍接受的恐怖主义定义，协调各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显得很困难。原因很明显，一些国际行为体利用恐怖主义来实现其地缘政治利益。例如最近的几次恐怖袭击，没有谁的获利比美国更大。③

这里不得不再回顾一下，近几年来原先已经相对平稳的南亚和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死灰复燃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 2021 年美军在没有做好任何善后配套的情况下匆忙撤离阿富汗。这在事实上一度造成了当地的权力真空，使得区域内的恐怖主义力量得以复活。

美军撤离后，阿富汗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为多个恐怖组织提供了重新集结和扩展势力的机会。④这些组织的复兴和活动加剧了南亚地区的不稳定性，增加了跨国恐怖活动的风险。

美国撤军后，这一地区的恐怖组织及其活动，对巴基斯坦、伊朗以及中亚各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后，“伊斯兰国呼罗珊”成为阿富汗境内最激进的武装组织。在中亚地区，极端组织的训练营

① Совещание по мерам, принимаемым после теракта в «Крокус Сити Холле». 25 марта 2024 г. https://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3732

②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呼吁建立打击恐怖主义的机构”，2024 年 3 月 27 日，https://ecrats.org/cn/security_situation/situation/9479/

③ Çin ve Rusya'ya açılan 'özel savaş'. 28 Mart 2024. https://www.cumhuriyet.com.tr/yazarlar/mehmet-ali-guller/cin-ve-rusyaya-acilan-ozel-savas-2190549

④ “阿富汗局势概述”，2023 年 1 月 24 日，https://ecrats.org/cn/security_situation/analysis/1938/

网络在不断扩大，很多恐怖主义训练营集中在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阿富汗北部地区。近年来恐怖组织招募了大量在俄罗斯打工的塔吉克斯坦人，并利用塔吉克斯坦人和俄罗斯人可以免签证入境土耳其的便利，将土耳其当成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后勤中心”。

四、新形势下中俄反恐合作：任务与责任

2023 年中俄就曾推动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反恐阵线，强调谴责恐怖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反对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的政治化和双重标准，谴责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为借口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做法，以及试图利用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达到地缘政治目的的企图。①

当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近年来中国在海外遭受的恐怖主义袭击明显增加。俄罗斯则在乌克兰与北约正面对抗的同时，再次面临恐怖主义“混合战争”的威胁。中俄面临的共同恐怖主义威胁越来越明显，并且发动恐怖袭击的力量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和同源性。

在共同的威胁面前，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中俄共同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变得更为紧迫和现实。安全是中俄对两国本土免受恐怖主义袭击的一个重要合作领域。应对当前共同的威胁，双方有必要在以下领域共同努力，务实提升联合反恐的效果。

1. 加强情报共享和协同行动。中俄双方应加强对恐怖组织、特别“伊斯兰国呼罗珊”和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的情报共享，包括恐怖分子身份、活动动态和财务渠道等信息。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情报共享机制，双方能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恐怖活动。

2. 强化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利用现有的区域安全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推动区域内的反恐合作。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反恐培训和紧急响应机制的建立，以提升区

① Россия и КНР выступили за создание единого контр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го фронта. 2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s://ria.ru/20230321/front-1859616487.html

域安全稳定。

3. 联合反恐演习和培训。更有针对性地定期或不定期举行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和专业培训，提高两军在明确目标、指定区域的反恐方面的协同能力。同时，这也能增强双方的信任和理解，为更广泛的军事和安全合作打下基础。

4. 打击恐怖组织融资渠道。合作打击恐怖组织的融资渠道，包括非法贩毒、武器贸易和网络募资等。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和跨国合作，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

5. 加强网络空间的反恐合作。面对恐怖组织越来越多利用网络空间进行宣传、筹款和招募的现实，中俄应加强网络反恐合作，共同打击和阻断网络恐怖主义。

这种全方位的合作模式，旨在构建一个更加紧密、有效的反恐合作机制，以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

在加强联合反恐的同时，中俄也需要避免地缘政治冲突的干扰，尤其是避免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对合作产生的负面影响，避免卷入其他国家和地区冲突。在进行跨境反恐行动时，必须尊重国际法和相关国家的主权与法律，避免引发外交争端。在打击恐怖主义时，应考虑相关地区和群体的文化及宗教背景，避免行动引发不必要的文化和宗教冲突。反恐合作应着眼长期的地区和平与稳定，避免短期行动损害长期和平建设和地区合作的努力。

在共同的安全威胁面前，中俄有必要且有能力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中俄反恐合作的深化不仅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也将为国际社会提供反恐合作的新模式。中俄反恐合作将继续在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发展，为全球反恐事业贡献力量，同时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新的前景。

【**Abstract**】The year 2024 marks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fter Vladimir Putin was re-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in March 2024,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called to congratulate him. Russia will continue Putin's governanc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to address global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once-in-a-century changes. Domestically, Russia has shown certain resilienc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and will face long-term sever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due to the ongoing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entrifugal tendencies in post-Soviet states, and difficulties in diplomatic breakthroughs. Against this backdrop, Russia has hosted multiple events with conceptual designs and platform-building significance and will host the first summit of the BRICS countries after its formal expans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ussian foreign policy system, China-Russia relations, amid a tense international context, have shown strong internal dynamics and independent value, with bilateral trade continuing to grow and civil exchanges expanding. In the new circumstances, China and Russia still face challenges institutionally and structurally,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spread of globalization and of building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ddition to cultural and civilizational challenges. This requires China and Russia to continue optimizing their foreign policy coordination strategies; to address multipolar challenges and promote integration based on pragmatic cooperation; to alig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the “Greater Eurasian Partnership”; to understand civilizational uniqueness based on recognizing national developmental specaility and the diversity of modernization paths while promoting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drive social progress and actively respond to cultural and civilizational challenges; to enhance the roles of multilateral platforms such as the SCO and the CSTO to address regional issues like terrorism, and to maintain reg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cluding domestic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 and to explore new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specific actions

addressing regional and global crises.

【**Key Words**】China-Russia Relations,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ussi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Ukraine Crisis, Inter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Аннотация**】В 2024 году исполняется 75 лет со дня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После переизбрания Пути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и в марте 2024 год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КНР Си Цзиньпин направил Путину поздравительное послание. Россия продолжает философию и практику правления Путина и будет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глобальные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вызовы, возникшие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толетних перемен. Внутренние социальны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России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и определённую степень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но внешне Россия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тяжёл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туацией, вызванной продолжающимся конфликтом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разделением стран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 трудностями в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 этом фоне Россия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роводит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имеющи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ого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я и создания платформ, охватывающие множество областей, включая первый саммит после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 стран БРИКС. Являясь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и сильную эндогенную движущую силу и независимую ценность в контексте всё более напряжён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вусторонняя торговля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сти, а масштабы межличностных обменов продолжают расширяться. В н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с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ми и структурны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вызванным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м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культурно-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и проблемами построения нового тип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Это требует того, чтобы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продолжали оптимизировать свои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находили реше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х вызовов на основ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одвигали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и связь между «Поясом и путём» и большим Евразийским партнёрством;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нимать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тран на основе уникаль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путе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прогрессу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 концепцией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ообщества с единой судьбой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и актив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вызовы культур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активной роли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платформ, таких как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такие как терроризм,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ключая внутренню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зарубеж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каждой страны, изучать новые модел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конкретн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о реагированию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глобальные кризис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вого типа, выбор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中亚研究

新形势下的中国中亚外交与中亚研究
——杨恕教授访谈*

杨　恕　王术森**

【内容提要】中亚与中国毗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尽管中亚地区只有五个国家，但该地区与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均息息相关。巩固和提高中国中亚外交的成效、加大对中亚问题研究的投入，是新时期我国需着力开展的工作。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进一步凸显。近年来，我们看到诸多域外大国明显加大了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和投入力度，各种“C5+1”机制的出现和升级就是明证。而中亚国家在复杂的内外形势下也遭遇了不少困难，仅在 2022 年，就先后有三个中亚国家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国内骚乱。这些形势的发展，使中国的中亚外交面临一系列机遇和挑战。得益于中国对中亚国家的尊重和双方基于互利共赢理念所开展的友好合作，中国三十多年来对中亚的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双方的政治互信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为下一阶段双方关系的提质升级奠定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时代和形势的变化，以及中亚国家自身发展需要的变化，也对双方关系的深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这为区域国别学的创设提供了契机。应该抓紧机遇，推进中亚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同时在政策层面创新思路、完善举措，以更周全的思维、精心思考的行动，保障中国中亚外交行稳致远，实现双方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中国中亚外交　区域国别学　中亚局势　俄乌冲突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2-0047(22)

* 2023 年 10 月 22 日，王术森博士对杨恕教授进行了采访。本文根据访谈记录整理而成，并经杨恕教授本人审阅。

** 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兰州大学原副校长；王术森，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王术森：杨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是研究中亚的学者，现在公众对中亚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可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亚地区和中亚地区对我国的重要性。

杨　恕：中亚地处亚欧大陆中部，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学术界，中亚的空间范围有多种界定。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成为对“中亚”最为普遍接受的界定。同时，也有将阿富汗列入中亚研究的情况。中亚五国面积约 400.8 万平方公里（不同资料有差异），人口约为 7719 万，GDP 约为 3315 亿美元（2021 年数据，大致与我国山西省相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中亚峰会顺利召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达到新的高度，中亚在我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总体来看，中亚对我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地缘位置来看，中亚处于亚欧大陆的中部，历来是东进西出和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古丝绸之路也经过这一地区。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亚北邻俄罗斯，东接中国，南与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国接壤，西濒里海及俄罗斯。应该说，中亚是欧亚大陆的几何中心，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独一无二的。第二，从经济层面来看，中亚五国是我国互利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伙伴。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我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增长了上百倍，经济合作稳步推进。中亚国家的资源，尤其是油气和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从安全层面来看，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十分复杂，深受“颜色革命”、“三股势力”、水资源争端、边界领土争端、毒品、跨国犯罪等多种安全威胁。中亚局势事关我国、特别是西北安全与稳定，我们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安全合作，如打击“三股势力”、防范“颜色革命”、禁毒等。

21 世纪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首先，尽管中亚并无全球层面的大国，但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参与度很高，且参与的大国数量多，这使中亚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牵动着中国的大国外交。其次，中亚国家是我们的周边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我国的陆

上邻国；而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邻国的邻国，在“大周边”之内。中亚国家作为中国周边国家、近邻国家的位置是不会改变的。再次，中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处于同一水平或阶段，有诸多合作的可能性，这为我国与中亚五国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最后，在多边外交中，中国与中亚国家都共同参与了多个国际组织，中亚国家也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给予了中国很多支持。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合作组织，包含了中亚五国中的四个，各国在上合组织中相互支持、务实合作，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王术森：中亚国家自苏联解体至今，独立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国内对中亚的研究历史也不久，大家对国内中亚研究的情况很少了解，能否介绍一下国内中亚问题研究状况？另外，能否谈一下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研究状况？

杨　恕：1991 年，中亚五国相继宣布独立，建立在国别研究基础上的中国中亚研究由此诞生。北京、上海、新疆和兰州等地成立了研究中亚问题的科研机构，中国的中亚研究初具规模。自此，国内有关中亚问题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不过，由于研究基础薄弱，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中亚国家的国情、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等常识性论著。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学界对中亚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化，关注焦点包括地区安全问题、经贸合作、“三股势力”对新疆的影响、新疆面临的“双泛问题”、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等，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2001 年前后，中国在中亚地区开始有实质性投入，中国的中亚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对中亚国家政治、安全、经贸和外交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国别研究也受到重视。2010 年前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相继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3 年中国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提高了中亚研究的重要性，研究成果涉及的范围也更为广泛。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中亚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具体表现在国别研究、分领域研究明显增多，学理化水平明显提高，并取得了一定的国际认可和国际影响力。

尽管如此，中国的中亚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孙壮志、肖斌、许涛等学者曾对此进行了评价，认为中国的中亚研究存在的问题包括：人才成长缓慢、后继乏人；缺乏对特定领域或议题的持续关注；重政策取向，轻基础研究；

主要关注宏观议题，原创性成果较少，等等。我和曾向红在《中国中亚研究三十年进展评估》一文中，提出了基于观察视角和研究主题的区域研究成果评估框架，将研究成果分为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成果、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成果四类。而通过梳理国内中亚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学术界集中关注的是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成果，但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区域关联研究成果与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都比较有限。鉴于此，我们认为，未来中亚研究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改进：一是拓展中亚研究议题的研究范围；二是鼓励研究者进行理论创新；三是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四是推进与中亚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以此为基础，逐渐弥补当前国内中亚研究的不足，推动国内中亚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

至于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研究，简单地说，可以追溯到帝俄和苏联时期。例如，帝俄时期著名的哈萨克学者瓦里汗诺夫的天山考察就涉及中国。苏联对汉学很重视，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的机构分布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伊尔库茨克、塔什干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等城市。中亚国家的不少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当年都曾在塔什干大学的东方系学习。目前，中亚国家的中国研究队伍尚未形成规模，严谨的学术成果还不多。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其中国研究主要在高校。在大学里，有以中国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但缺少关于中国历史或双边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哈萨克斯坦著名的汉学家哈菲佐娃（К. Ш. Хафизова，1939—）曾在塔什干大学学习，其著作涉及哈中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但她的成名之作《14—19 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主要是在苏联时期完成的。整体来讲，中亚有关中国的综合性或分领域的研究成果都不多，研究队伍尚在形成之中，而且各国之间的情况差异明显。

中亚国家对于中国研究的不足，可能导致中亚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意图的误解，以及对中国的认知出现偏差，使其在与中国互动中产生误判或误解。因此，支持中亚国家开展中国研究，提高中亚国家中国研究的水平，不仅有助于中亚地区更好地理解中国，也能够减少其对中国的认知偏差，促进中亚地区与中国的合作性互动。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王术森：您介绍了中国和中亚国家相互研究的基本情况，但我想，学术研究只是相互了解的一个方面，涉及面比较窄，您能不能从另外的角度，比如认知的角度，谈一谈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情况？

杨　恕：相对于学术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相互认知在智库、媒体、大众层面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先谈一下中亚国家的情况。就智库而言，中亚国家的智库建设始于 1960 年代苏联建立的各种分析中心。苏联解体初期出现了智库数量减少的情况，大致从 2007 年又开始恢复和发展。自 2007 年以来，中亚国家的智库建设开始迅速发展，数量快速增长，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增长了 1 倍多，到 2016 年就分别达到了 210 家和 110 家。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在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道路上不断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中亚国家智库数量的快速增长及其在全球智库排行榜上的名次上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智库在中亚国家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正在日益提高。然而，除土库曼斯坦外，中亚国家的智库类型非常复杂，除了政府型智库外，还有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民间智库等，其中部分智库与西方的 NGO 联系紧密，甚至直接受到西方某些机构的资助。中亚国家智库构成情况的复杂性，客观上就造成了它们在对中国的认知上出现较大差异。从公开资料来看，政府型智库往往是从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阐释该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更多的是分领域对中国进行研究，这也使中国学近年来在中亚地区发展较快，并在研究目的、研究力量、研究机构、研究内容、学科建设等方面出现了与传统汉学不同的变化。然而，这两类智库的研究成果受众面有限，反而是民间智库的一些报告在中亚民众中影响较大，成为社交媒体对华认知的重要表达。

与智库情况类似，中亚国家的官方媒体基本上不会发表对中国进行评价的内容，主要是进行新闻报道；而私营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对中国进行的评论比较多，而且往往涉及国家的对外政策、国家间关系等内容，其中有不少负面评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威胁论”。整体来说，“中国威胁论”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与西方的类似，是输入品；另一类则是基于文化、历史、宗教、民族、经贸关系等因素产生的对中国和对华关系的负面认知和评价。情况复杂，举几个例子。几年前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我与一位吉尔吉斯

学者谈起中吉关系，他对两国关系做了积极评价，同时说道：我们独立初期，经济状况很糟，公众生活很困难，这时候，大量质次价廉的中国商品进入吉尔吉斯，坦率地说，这对我们渡过难关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也败坏了中国的名声，“中国货是假货”的说法至今存在。同时，大量中国货的进入，也严重妨碍了我们民族工业的发展，我希望通过双方努力来改变这一状况。这位吉尔吉斯学者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应该重视。在塔吉克斯坦，由于多个独立媒体片面报道来自中国的债务压力、土地租赁、劳务移民等问题，不少塔民众对中国外交政策持消极态度。事实上，这类评论的出现和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支持的民间智库的影响。再如，2009 年哈萨克斯坦境内出现了一个民间智库政治决策研究所，2012 年该研究所在哈萨克斯坦 16 个城市就哈萨克斯坦与中国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关系的问题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11.5%的哈民众认为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战略伙伴，并表示“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放在首位”；56.3%支持不同程度的合作；27.7%认为哈萨克斯坦需要尽量减少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对我国构成威胁”。当时，政治决策研究所的民意调查结果在哈私营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对于哈民众的对华认知发挥了很不好的作用。类似的情况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也存在。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在中亚各国表现出的形式和程度是有明显差异的，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把它看作主流。

从我们国家的智库、媒体和大众对中亚的认知情况来看，首先，在这三个层面，中亚从来都不是主流。这跟学术界对中亚的研究情况一样。从一些涉及中亚问题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报告来看，主要内容是从“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视角来介绍中亚整体或部分国家的基本情况，其影响力主要在国内学术界。近年来，主流媒体上对中亚的报道有所增长，特别是 2023 年 5 月“中国-中亚”峰会期间，大量报道在民众心目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使普通老百姓对中亚有了新的认知。以往，我们普通民众对中亚国家的认知是比较模糊的，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对中亚的印象就是“西部邻国”、“五个斯坦”、“小”、“穷”、“乱”、“差”。现在，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中亚”峰会的举办等，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知道中亚国家的具体名称、它们的发展程度、资

源情况、民族文化状况以及对我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然而，我国民众对中亚的认知总体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王术森：苏联解体时，中国立即与中亚五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很快派出了使节，并租用场地，作为大使馆临时办公场所，说明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三十余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状况如何？

杨　恕：苏联解体后，中国遵循“睦邻平等、互信互利”原则，在第一时间与刚刚独立的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逐步发展到与中亚各国建立起不同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近几年，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大国博弈激化、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多种挑战，在各领域保持了“稳中求进”的合作态势。如果拿“五通”来叙述，大致情况是：

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92—2001 年）着重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确立发展双边关系的前提和主要原则，围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达成共识。第二个阶段（2001—2013 年）致力于共同打击“三股势力”以及与偷运武器、贩卖毒品有关的跨国犯罪活动，政治互信在上海合作组织和睦邻友好条约的双轨框架下得以增强。第三个阶段（自 2013 年起），依托常态化的高层互访和政府间合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国家发展战略的务实对接。

在设施联通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已形成集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电力、信息和服务为一体的合作。中欧班列、中吉乌铁路等项目，对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提升中亚地区区位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有力地推进了供应国、过境国、消费国的发展。此外，还产生了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新合作领域，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智慧丝绸之路将成为中国与中亚合作的新动力。

在贸易畅通方面，经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中亚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和投资来源国之一。1992—2022 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从 4.6 亿美元增至 702 亿美元，三十年间增幅达到 150 倍。在运输网络、海关程序、电子商务平台等不断便利化的同时，双边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进出口互补性日益增强。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为代表的大型示范项目，拉动了数以千计的合同和大量就业岗位。

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中亚作为欧亚重要走廊，其基建工程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都需要资金支持。丝路基金、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平台符合中亚的需求。在中亚地区使用本币结算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空间。加强金融合作、货币合作和监管合作，将推动中国与中亚金融合作进一步发展。

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认知程度较建交初期有了明显加深。近些年，中国与中亚五国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论坛、媒体合作论坛、国际艺术节和国际电影节等文化交流活动。目前，中亚地区已开设 13 所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和来华留学人数越来越多。中国与中亚国家已签署了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协定。除了教育合作，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合作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推进了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应用技术合作、建立学术交流机制等工作。

这里我想说，在“五通”之中，不少人认为民心相通是另外四通的条件和前提，但我认为，更大程度上它是结果，是衡量双方关系的最终标准。

在苏联解体以来的三十余年中，中国与中亚国家通过交流协商，排除干扰，建立了互利互信的良好关系。同时也要看到，在中亚不同国家，程度不一地在社会层面也存在着对中国的不了解或负面评价。新形势下，中亚国家内外政策的自主性正在显著增强，同时，域外大国也加大了对中亚各国的关注和投入，这是驱动中亚地区秩序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既是机遇也有挑战。

王术森：在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杨老师，请您谈一谈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机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状况。

杨　恕：上合是一个新型的多边区域合作组织。与双边合作相比，多边合作既可以避免与中亚五国合作时“厚此薄彼”的问题，也可以有效应对中亚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中国十分注重创建和运用多边机制，来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发展双边关系和进行多边合作的最重

要平台。借助这一平台，中国与中亚各国先是解决了边界划定和边境互信等问题，又拓展到打击“三股势力”、推进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往等多个领域。在上合的助力下，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稳定、沟通顺畅、合作密切，成效也十分显著。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它更是发挥了实施载体、协商平台和融资渠道等多重作用。中国与中亚各国以多种形式展开共建，同时为中亚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安全与经贸公共产品，使之成为“一带一路”核心区与示范区。

2019 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后，上合组织的这种关键作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是上合组织的议题自然会延伸至南亚地区，对中亚的关注也就被稀释。二是印度在上合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宣言中缺席，成为成员国中的另类，而且在对巴基斯坦的关系方面也未保持克制与和平。虽然这些不会直接冲击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对上合组织的整体运行及重大多边合作倡议的落实仍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当前大国博弈加剧，中亚的地缘政治地位再次凸显，加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已到关键时期，这种情况对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所以，“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的出现恰逢其时。2020 年“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建立，至今已举办四届，2023 年升级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机制。这一机制为中国与中亚合作提供了全方面、宽领域、多层次、长周期的合作平台，也使双边与多边合作更具针对性，面对合作的重点难点时更有执行力。比如 2023 年“中国–中亚峰会”宣布启动沉寂 25 年之久的中吉乌铁路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和开工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同时，全面总结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成果、擘画未来发展新蓝图，受到外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价。这也说明，中国和中亚各国高度重视与期待这一平台。

当然，“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并不会取代上合组织的作用，而是与之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以上合组织为主要平台、“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为重点抓手、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双边与多边共同推进的合作格局。

王术森：上合组织和“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都是中国与中亚合作

的重要平台，您对如何调动中亚国家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有什么考虑或建议？

杨　恕：中亚是“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在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叠加效应的影响，中亚地区政治、安全与经贸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发挥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调动中亚国家的积极性，这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中亚各国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近年来，中亚国家纷纷制定了面向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并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加以调整，旨在促进国内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途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规划。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政治互信达到了建交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中亚国家权力交接陆续完成和政治经济改革进入新阶段，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中亚各国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完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下一个十年，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国家多层次需求相契合。国家需求层次对于理解中亚国家对于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预期、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中亚国家的需求层次涵盖安全、发展和社会和谐等多个领域。近年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热点问题和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爆发，给中亚国家的多层次需求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选择一批契合中亚国家需求、示范效应强的标志性项目进行合作，将有利于调动中亚国家参与的积极性。

再次，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增强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粘性”。中国与中亚国家需要进一步扩大相互开放水平，拓宽相互投资领域，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通过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最后，积极利用各类合作平台和制度安排，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了多个高水平、多层次的合作平台和制度安排，如中国-中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中亚合作论坛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成立的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和多个合作协议。应充分利用这些合作平台和制度安排，加强与中亚国家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国际产能、跨境旅游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王术森：历史上，中亚就是一个大国博弈的场所，苏联解体后，大国都制定了自己的中亚战略，您如何看待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杨　恕：当前大国在中亚的博弈不同于历史上的博弈，如果称其为新博弈的话，可以说它始于中亚国家独立。中国、俄罗斯、美国、德国、印度等大国都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时间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很快制定了自己的中亚政策。近年来，域外主要行为体积极调整中亚战略或政策。俄罗斯总统普京于 2011 年正式提出组建“欧亚经济联盟”的设想，2015 年正式开始运行；中国于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而中亚国家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境外首选区。2019 年 6 月，欧盟出台了新的中亚战略；2020 年 2 月，美国公布了新中亚战略。印度、韩国、日本、土耳其、伊朗等也有各自的中亚合作倡议或计划。为描述大国在中亚地区展开的博弈，早在 1994 至 1995 年，一些学者就提出“新大博弈”（The New Great Game）一词，用以描述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和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态势。

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是中亚地区最主要的域外行为体。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政策竞争有了更多内容。美国中亚政策的目标在于遏制俄罗斯与中国，致力于将中亚国家整合到西方自由主义秩序之中，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地缘政治方向。俄罗斯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在于，在抵御美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扩大的同时，竭力维持恢复自身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而中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等行为体合作，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进而保障中国西部边疆安全，同时以中亚为支点建设“一带一路”。这些积极参与中亚事务的主要大国，它们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不同。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比较

优势在于美国的形象和整体实力优势；俄罗斯与中亚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其传统优势体现在军事、能源、安全、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而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比较优势在经济领域。总体来看，近年来，军事安全领域的竞争主要在美俄之间，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有所下降，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经济和能源领域，美国、俄罗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均有所增强，但整体来看，中俄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存在，在增幅上要超过美国，而且，中国近年来的态势也超过了俄罗斯。在人文领域，俄罗斯与中亚地区的联系虽然近年来有所减弱，但仍强于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同时，美国宣扬的西方民主与人权等价值观在中亚国家社会中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中处于独特的位置。第一，就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言，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力图建立“稳定的中亚、繁荣的中亚、和谐的中亚、联通的中亚”。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与这些国家独立初期相比增长了上百倍，而且中国将中亚地区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组成部分。习近平主席曾强调，“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这四项原则是在合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共同财富，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行稳致远的政治保障，也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友好交往继往开来的力量源泉”①。

第二，就中国与其他域外行为体的关系而言，中国在中亚地区始终遵循非对抗原则，不把中亚地区视为“新大博弈”下的“棋局”，而是致力于在中亚打造为诸多行为体互利共赢的“和谐地区”，推动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加强“一带一路”与各国国家发展战略或区域合作方案的对接，积极寻求大国在中亚的利益汇合点，推进相互合作。总体而言，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中采取了务实、合作、开放的态度，这也是构建和谐、稳定、繁荣的周边环境方针的体现。

王术森：您以上谈到的中国对中亚关系的理念和原则应该是双方关系的

① “习近平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2 年 1 月 25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2-01/25/c_1128300077.htm

重要基础。与中亚国家建交以来，双方关系发展良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您认为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哪些？

杨　恕：在有利因素方面，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位置优势。中亚与中国毗邻，之间又建设了铁路、公路、航空、管线、电路、网络等通道，非常有利于人员、物流、信息等的大规模、高速度、低成本的交流，这是美西方国家无法相比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

第二个因素是政治联系密切。上海合作组织、“C5+1”部长级会议与中国-中亚领导人峰会等合作机制使我国与中亚国家政治联系密切；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亚地区虽然同样发展了类似的合作机制，但限于地缘政治和其他条件，美国和西方国家并没有获得使其与中亚的关系超过中俄的成效。

第三个因素是经济贸易合作基础和效果良好。2022 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达 702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约 40%；而 2022 年中亚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额仅仅为 44 亿美元。在西安峰会上，我国提出给予中亚国家 36 亿美元新的发展援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3 月份访问该地区时，仅承诺提供 2500 万美元资金支持经济增长。

第四个因素是基础设施投资优势明显。我与中亚国家相继建成了中吉乌公路、中塔公路、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等，使中亚国家成为亚欧陆路交通枢纽；而美西方国家对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少。

第五个因素是能源资源合作成果明显。在能源方面，仅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自 2009 年投产以来已累计向我输送天然气 4232 亿立方米（截至 2022 年底），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管道天然气是从中亚进口的，同时，也从哈萨克斯坦累计进口了超过 1.5 亿吨石油。中国—中亚能源合作已成为双方全方位合作的重要领域。

第六个因素是互联互通扩大。我国不仅与中亚国家建立了陆运交通运输路线，也与中亚国家逐步建立了“空中丝绸之路”。目前我国与中亚五国均已签订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其中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放开第三、第四航权，今年还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互相开放；目前已有十家航空公司开通中国至中亚五国航线航班。

第七个因素是人文交流初具规模。一方面，我国已成为中亚国家留学生

的主要留学目的地之一；另一方面，我国境内生活着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跨国民族，这对于双方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已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生效，这将促进我与中亚国家的民间交流。

除了以上谈到的有利因素，我国与中亚国家合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在教育合作方面，高学历留学生比例较低。从 2018 年公布的数据来看，博士研究生仅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2%左右，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公布的数据，2019—2020 学年，美国新招收的国际学生，硕、博留学生占学历留学生总数的 53.4%。美西方国家近来有意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美国计划为中亚未来领导人提供教育奖学金；日本政府也希望增加中亚国家学生留学日本的人数，计划扩大参与“人力资源开发奖学金计划”的日本大学名单。

科技合作范围不大，水平不高。尽管中国与多个中亚国家签署了科技合作的协议，但实际执行的情况远不尽如人意。突出表现在合作项目少，成果自然不多。相比之下，西方与中亚国家的科技合作水平较高。如美国对哈萨克斯坦中度铀浓缩项目进行了投资，并提供现成产品；欧盟多年前就深度参与了咸海问题的研究，德国加强了与中亚国家在气候变化、水资源以及绿色资源方面的技术合作，等等。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外宣效果非常有限，中亚民众对我国存在诸多误解。根据中亚一家有影响的媒体中亚晴雨表（The Central Asia Barometer, CAB）的调查，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受访者对中国的看法从 2017 年到 2021 年趋于负面。在吉尔吉斯斯坦也基本如此，表示对中国持“非常不利”看法的人数有所上升。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中亚国家和国家的不同地区，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其原因很复杂，需要我们正视，而不是忽视。

第三方的不利影响：美西方国家的不断介入给中亚地区局势带来不确定性。受俄乌冲突的影响，美国、印度、欧盟国家以及日本相继提出旨在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的计划，欲提升自身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这些国家可能在中亚地区形成以美国为首的“互动联盟”。

域外国家运输通道建设，可能影响我们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得到了欧盟的支持，印度也意欲加快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的建设。这些运输通道建设对“一带一路”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增加西方及相关国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提出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明显具有与“一带一路”竞争的意图。但应该看到，中亚区域合作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是排他的，这些规划只要中亚国家欢迎，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反对，以实力进行有序的竞争才是可取的。

王术森：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与中亚的关系，我们提出了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您认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应如何继续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

杨　恕：中国在国际层面提出的一系列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实际上解决的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和“运”具有不同的含义，命是与生俱来的，但运却是会改变的，命运就是事物的定数和变数组合而产生的运动，这对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诠释。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的“命”，直观体现在中国和中亚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某些联系。苏联解体后，原中苏之间 3300 多公里的西段边界成为中国与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虽然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没有共同边界，但它们离中国都不远。中国与中亚是历史久远的邻居，这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中国与中亚在领土、山脉、河流、生态环境、气候等地理因素方面紧密相连，如额尔齐斯河发源于中国新疆富蕴县阿尔泰山南坡，沿阿尔泰山南麓向西北流，在哈巴河县以西进入哈萨克斯坦。另外，中国新疆北部与哈萨克斯坦东部属于同一个生态系统。因此，中国和中亚国家作为命运共同体的直观体现，就是中国新疆和中亚国家在地理地质和生态等方面同属一个系统，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居民有相同或相近的自然环境背景，但这方面经常被忽视。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的“运”，主要体现为中国和中亚国家间关系的阶段性变化。中亚国家独立初期，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面临可能的变化，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边界划分。到 2003 年 9 月，中国与哈、吉、塔三国之间的边界全部划定，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消除了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界地区从可能的冲突地带，逐渐成为双方经贸往来、人员流通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总体向好。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发展提质升级，进入快车道。“运”可以解释为成功的机会。它的出现，一类是因客观条件变化产生的，有很大的偶然性；另一类则是主观努力创造的，很大程度上有必然性。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运”，更多是双方共创的。正是因为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将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因素，转变为越来越多的确定和稳定因素。

“命”和“运”之间反复的相互作用能使不同行为体之间形成特定的共同体关系，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的“共同体”，从根本上反映的是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的生成与运作模式，反映了中国和中亚国家对“运”的一种深层理解。总体来看，经过三十多年的交往历程，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关系模式。包括在政治关系、安全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等各个领域，而且双方的行为彼此都是可以预期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方面中国和中亚国家之间不存在问题。存在问题怎么办？也要秉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去解决。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既是对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现状的反映，也是对双方关系的一种战略规划和愿景。可以说，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同时具有描述性、过程性与前瞻性的特征。

中国和中亚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具有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也具有独立自主价值。近年来，国际形势暗流涌动，欧亚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和中亚国家内部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面对新形势，只有不断培育具有较高独立自主价值的共同体关系，才有可能使中国和中亚国家间关系经受住国际和地区秩序演变带来的挑战。一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命运要牢牢掌握在双方手中，需要有战略思维和能力排除域外国家的干扰。另一方面，不能刻意回避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双方要通过深化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增强中国和中亚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

王术森：我们注意到，您从事中亚研究多年，在您的研究内容中，既有

中亚这个区域的，也有各个中亚国家的，兼顾了区域和国家两个层次。当前，国家设立了交叉学科类的区域和国别学一级学科，这为国内中亚问题研究带来了哪些机遇？有哪些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经验和体会。

杨　恕：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为国内中亚问题研究带来了机遇，这是没有疑问的，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丰富研究领域。之前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从外交、国家间关系、国际政治等视角观察相关地区与国家，对于对象国和区域本身的研究很不足。区域国别学跳出政治学的范畴，其研究内容不仅涉及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还包括历史、语言、宗教、社会等领域。这为中亚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领域和思路，有助于全面深入地了解中亚国家和这一地区。

第二，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域国别研究强调对特定地区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研究，这需要不断加大对相关领域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支持，致力于形成既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又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团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而更好地揭示中亚地区的整体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促进跨学科交流，强化理论和方法论创新。一方面，区域国别学强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为中亚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学科交流机会。通过与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流合作，中亚研究可以更广泛地融入国际学术界，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强调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这种创新可以推动中亚问题研究在理论深度和方法论上取得突破，从而更好地解释和解决中亚地区面临的各种问题。

第四，扩大国际合作的范围和内涵。区域国别学主要研究区域和国家的内部问题，这更需要和当地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合作。通过合作，可以借鉴对方的理论和方法，共享研究资源和信息，推动中亚问题研究的国际化发展。理想的状况是：科研团队由国内外成员组成，成果可以国内外共享，研究工作在中亚与国内（也包括其他国家）并行开展；主客位研究的换位深化和交流。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国际社会对中亚地区的

看法和研究进展，同时也可以将中国的中亚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

总体而言，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为中亚研究带来了机遇，有助于推动中亚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中亚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从多个方面推进：在历史与文化方面，需深入研究中亚地区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以及民族关系，研究各民族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与其他地区（如中国、印度、中东、俄罗斯等）的人文交流。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需进一步分析中亚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研究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革和发展。这有助于了解中亚地区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在地缘政治领域，需探讨中亚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分析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及中亚在全球能源、交通和贸易等方面的战略地位。在能源与环境领域，需探讨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尤其是中亚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如水资源问题，需要加强研究。在中亚，几乎无例外地认为，水资源是影响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在一些地方还变得更严重了，突出的例子是咸海危机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生态环境热点。此外，还应关注中亚地区的社会问题，如贫困、教育、卫生、性别平等、人权等。

最后谈一点。作为一个区域，中亚与世界上其他区域相比，其同质性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优点。但要看到，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区域认同度不高，合作水平一直很低，虽然近年来有所改善，但距离一体化的前景还有很大距离；而同时，中亚国家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也明显扩大。下面两组数据集中说明了这一点。

1989 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五个加盟共和国的 GDP 和人均 GDP 之比分别是（设塔吉克斯坦为 1.0）：

GDP：6.6∶1.3∶1.0∶0.9∶4.6

人均 GDP：2.0∶1.5∶1.0∶1.4∶1.2

总量差别最多的达 6.6 倍，人均差别只有 2 倍，说明苏联时期五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比较接近。

2017 年，中亚五国的 GDP 和人均 GDP 之比分别是：

GDP：22.8∶1.05∶1.0∶5.3∶6.95

人均 GDP：11.03∶1.52∶1.0∶9.18∶1.88

GDP 总量差距最多的已近 23 倍，人均差距已经达到 11 倍。差别之大、差别扩大之迅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深层原因，很值得关注。

同质性较高和差别的扩大，会向区域国别研究提出更多问题和要求，这无疑是好事。交出合格的答卷，是我们的责任。

【**Abstract**】Central Asia shares a border with China and hold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Despite the region consisting of only five countries, its importance is intricately linked to China's major diplomatic strategies, including relations with major countries, neighboring countries, developing nations, and multilateral diplomacy. Strengthening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diplomacy in Central Asia, along with increasing investments in research on Central Asian affairs, are crucial tasks for our country in the new era. In the current complex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landscape, the geo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Central Asia has become even more pronounced.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observed a marked increase in attention and investment from external major countries in the Central Asia region, with the emergence and upgrading of various "C5+1" mechanisms serving as clear evidenc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also faced numerous challenges amid complex internal and external situations, with three of them experiencing varying degrees of domestic unrest in 2022 alone. These developments present a series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diplomacy in Central Asia. Thanks to China's respect for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friendly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outcomes, China's diplomacy in Central Asia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political trust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s reached new height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and upgrading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next phase. At the same time, changes in the era and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evolving development needs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placed new demands on deepening bilateral relations. This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ional country studies. We should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advance in-depth and detailed research on Central Asia; innovate in policy thinking and improve measures at the policy level; and with more comprehensive thinking and well-considered actions, ensure the steady and far-reaching progress of China's diplomacy in Central Asia, achiev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both sides.

【**Key Words**】China’s Central Asia Diplomacy, Regional Studies, Central Asian Landscap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Аннотация**】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граничащая с Китаем, занимает важное место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Кита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в регион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сего пять стран, он тесно связан с многими аспектам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Китая, включая дипломатию с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дипломатию с развивающимися странами и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юю дипломатию. Укрепление и повышение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ита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 также увеличение вложений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являются задачами, на которые Китай должен сосредоточ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в новую эпоху. В текущей слож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ё более заметным.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мы видим, что многие страны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регион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увеличили своё внимание к и вложен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что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ся появлением и усилением различных механизмов «С5+1».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также столкнулись с рядом трудностей на фоне сложной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ситуации, причём только в 2022 году в трёх странах региона произошли различного масштаба волнения. Эти события создают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яд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и вызовов. Благодаря уважению Китая к странам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основанному на принципе взаимной выгоды,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дипломатия Кита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достигла 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взаимное доверие между сторонами достигло новых высот. Это создало прочную основу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улучшения и повышения качества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изменения во времени 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а также изменение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в развитии самих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едъявляют нов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углубл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Это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еобходим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эт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и детализаци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а уровне политики необходимо инновационно подходить к разработке идей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ю действий, чтобы с более всесторонним подходом и тщательно продуманными действиям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стабильное и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дипломатии Кита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реализовать скоординирова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Дипломатия Кита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странов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итуаци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责任编辑　宋羽竹）

试论哈萨克斯坦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的构成及其影响（2021—2023 年）*

曾向红　安凯欣**

【内容提要】2022 年“一月事件”过后，哈萨克斯坦政坛人事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主要表现包括：相当数量的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政治红人”已经或准备告别政坛；在整个政治现代化改革过程中，涌现了以托卡耶夫为中心的新势力群体。那么，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的成员有哪些？重组后的决策层对哈萨克斯坦内政与外交有着怎样的影响？通过重点使用“哈萨克斯坦总统官网”和“哈萨克国际通讯社”两个数据库的资料可以发现，重组后的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正逐渐呈现出人员专业化、构成集中化、成分去“纳”化和成员年轻化四个特点。新型核心决策层成员正在积极地参与到哈萨克斯坦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其中部分核心成员对国内外政治决策有显而易见的影响。考察 2022 年“一月事件”后托卡耶夫启动的政治改革，以及俄乌冲突后哈政府应对俄暂停里海管道联盟（CPC 管道）运输原油这两个案例，能够侧面印证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影响。目前来看，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人员调整，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已基本成型，但对哈萨克斯坦今后发展的影响仍需持续观察。

【关键词】哈萨克斯坦　托卡耶夫　核心决策层　精英成员　决策过程
【中图分类号】D736.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2-0069(27)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批准号：21VGQ010）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了 2023 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亚地区形势变化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批准号：2023jbkyjd003）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曾向红，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兰州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教授；安凯欣，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2022 年新年伊始，哈萨克斯坦发生了独立 30 余年来最大规模的突发暴乱事件，哈官方将其定义为“一月事件”（January event）或“悲惨一月”（Tragic January）。[①]这一事件对哈萨克斯坦政局变化和政坛人事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自然也关系到哈萨克斯坦对外关系的演进。“一月事件”之前，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缔造的精英网络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月事件”之后，托卡耶夫以此为契机大规模重建政治团队。在哈萨克斯坦启动政治改革的背景下，哈执政精英团队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相当数量的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政治红人”已经或准备告别政坛；二是涌现了以托卡耶夫为中心的新势力群体。两年来，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逐渐成形，并迅速地在哈萨克斯坦政治领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且拥有了显而易见的权力。该决策层由托卡耶夫本人以及他的主要政治盟友和顾问组成，他们共同决定着国家的政治方向和经济发展策略。

既有关于核心决策层在哈萨克斯坦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关注哈萨克精英对哈萨克斯坦某一领域政策制定的影响，包括哈萨克斯坦的能源政策、[②]外交政策[③]等；另一方面，关注哈萨克斯坦精英团队的组成结构、价值趋向和行为方式对整体政策制定的影响，包括政党建设、[④]社会与国家建设[⑤]等。然而，学术界还没有对托卡耶夫执政时期的精英组成及其影响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而该问题对于如何理解当今哈萨克斯坦的政局及其发展前景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旨在分析托卡耶夫

① 哈萨克斯坦官方网站将这起暴乱描述为“一月事件”（January event），对应的哈语为（Қаңтар оқиғасы），或“悲惨一月”（Tragic January），对应的哈语为（Қаралы қаңтар），为避免增加不必要的情感色彩，使文章产生歧义，故本文将统一描述为“一月事件”。

② ［德］J • 库兹涅尔、孙溯源：“哈萨克斯坦石油精英及其对能源政策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151 页。

③ 周明：“哈萨克斯坦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参与及限度——结构制约与精英偏好的影响”，《俄罗斯东亚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160 页。

④ 曾向红：“从规则治理到关系治理——三十年来中亚地区治理模式的变迁”，《东北亚论坛》，2022 年第 2 期，第 47 页。

⑤ Michael Mesquita, “Kazakhstan’s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Elite Networks”,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16, Vol.24, No.3, p.372；［哈］纳扎尔拜 • 叶尔肯：“当代哈萨克精英与社会转型”，《俄罗斯东亚中欧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89 页；孙铭：“哈萨克斯坦构建威权政治制度研究”，《俄罗斯学刊》，2017 年第 1 期，第 33 页；Мәмбет Қойгелдиев, *Ұлттық саяси элита. Қызметі мен тағдыры (XVIII-XX ғғ.)* Алматы: Жалын баспасы, 2004.

核心决策层的构成，并探讨其对哈萨克斯坦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尝试为理解哈萨克斯坦的政局提供一定的借鉴，并为理解哈政局发展方向提供必要的启示。

一、如何识别政治精英和核心决策层

政治精英是由共同体全体成员中极少数人组成的上层集团。埃米莉·哈夫纳·伯顿（Emilie M. Hafner-Burton）等人认为，精英是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占据最高地位的少数决策者，他们通过许多途径被选拔出来服务公共事务。[①]伊丽莎白·纳森·桑德斯（Elizabeth Nathan Saunders）将精英的特征分为五种类型，分别为归属性的特征、通过“社会经历”获得的特征、认知或行为方面的特征、关系特征、政治或党派关系特征。[②]在政治精英研究中，识别政治精英是研究社会权力结构和政府决策过程的重要前提，也是框定核心圈层（inner circle）的重要条件。换言之，核心决策层与政治精英有一定的重叠度。不过，政治精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群体，核心决策者往往只限于政治精英中的部分人员。而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核心决策圈层，首先需要明确该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政治精英构成，并从中推定对政府决策有决定性影响的核心人物。

核心决策层对于国家未来走向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比如美国决策核心圈成员的平衡战略与价值观倾向等理念，直接推进并塑造了以平衡战略与价值观外交为核心的“奥巴马主义”[③]。而就核心决策层人员的来源而言，他们至少经由两种渠道产生：其中一种是与核心领导人有亲密的关系，并在关键的决策部门发挥决策和领导职能；另一种是由政治精英组成、专门从事为高层领导人提供决策咨询的顾问团队，他们依靠自身对领导人的忠诚以及优秀的专业能力为领导人提供服务，并且通过自己掌控的机构或职位发挥决策

① Emilie M. Hafner-Burton, D. Alex Hughes and David G. Victor,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Elite Decision Making”,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1, No.2, 2013, pp.368-386.

② Elizabeth Nathan Saunders, “Elites i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Foreign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2, Vol.25, pp.219-240.

③ 刁大明：“决策核心圈与奥巴马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5 期，第 32 页。

职能。[①]

显而易见，了解一个国家或政府的核心决策层构成，对于把握该国或特定政府的政策走向具有重要意义。掌握这一名单，至少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梳理他们与领导人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而这种关系可能源自血缘、亲属、私交等维度；二是观察和分析他们所处部门或职位的重要程度。一般而言，攸关国家安全、政权生存、社会稳定、对外交往的部门属于要害部门，其领导人通常属于核心决策人员。相较而言，第二条分析路径更加直观，而第一条路径更为隐秘。能否较为顺利地梳理出一个国家或政府的核心决策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所能获得的资料的丰富性和准确性。因此，对于不同国家或政府核心决策人员的把握，是一个难易程度有显著差异的工作。

因为核心决策层通常来自政治精英，故对于核心决策层人员的梳理，可以借鉴学术界对于政治精英的研究路径。目前来看，尽管关于政治精英的各种定义对政治精英的特征各有侧重，但共同点在于对少数担任最高权力职责的人群的关注。既有关于如何识别政治精英或核心决策层人员，主要包括三种方法：职位分析法、声誉分析法和决策分析法。[②]

职位分析也被称作定位分析，是对正式机构各个职位的影响力进行分析的有效方式。职位分析将政府机构认定为正式机构，通过分析对象在机构中的任职经历以及职位本身的影响展开研究。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 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提出，进入重要政府机构是人们获取财富、权力和名望的主要方式。人们在机构中所占据的职位，很大程度上会赋予他们持有这些（财富、权力和名望）的机会和经验。[③]职

① Glad B, Link M W, “President Nixon’s Inner Circle of Adviser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6, No.1, 1996, pp.13-40; Knoke D, “Networks of Elite Structure and Decision Making”,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22, No.1, 1993, pp.23-45; 张玉友：“摩洛哥金字塔式外交决策机制初探”，《中东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197–199 页；刁大明：“决策核心圈与奥巴马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5 期，第 23–32 页；张勇、孟樊超：“政策推手：日本首相外交安保团队与对外决策过程”，《日本学刊》，2021 年第 6 期，第 89–114 页；张昊琦：“当代俄罗斯政治精英的代际更替”，《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1 期，第 71–79 页。

② Heinrich Best, John Higley et al.,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lit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pp.79-92.

③ Mills, *The Power Elite*,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0-11.

位分析最大的优势在于其清晰确定的分析对象，因为正规机构对每个职位的任免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也使职位分析成为当下识别政治精英最常用的方法。不过，职位分析有其缺陷，如其假设的偏移性质，即由于整个职位分析将政府机构假定为中立稳定的正式机构，忽视了非正式机构和非政治机构与领导人之间的密切联系。

声誉方法摒弃了正式机构带来的限制，更侧重分析对象自身的声誉检测。声誉分析来源于弗洛伊德·亨特（Floyd Hunter）对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主要方式是组建一个“专家小组”，他们扮演“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其成员往往是被认为参与过或密切观察过政治变革的人员。声誉分析的前提，主要是“专家小组”作为系统的参与者可以有效判断谁拥有或没有权力。声誉分析有效突破了正式机构对职位分析的限制和影响，但是由于信息提供者的不稳定性，例如信息提供者的选择、问题内容的设置、信息提供者自身主观思想的影响等，均有可能导致声誉分析的准确性产生偏差。为了减轻这一潜在的影响因素，部分学者会采取扩大丰富“专家小组”的人数和组成结构的方式，从而获取更为中立的信息。

无论是职位分析还是声誉分析，都是从被分析对象的视角出发，寻找恰当的依据，以证明其政府精英的身份。然而，这两种方式受制于政府职位的复杂性以及对政策影响的多样性，或多或少地可能产生偏颇，而决策分析因专注于事件本身的分析，可以有效地规避这一弊端。决策分析的基础假设是：将政府权力转化为政府活动的影响力，从活动和决策本身入手，研究某一活动或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人员，特别是成功发起或否决提案的个人，以此来确定其精英身份。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在研究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有关城市重建、公共教育和公共职位的提名过程中就使用了决策分析的方法。[①]然而，不同于职位分析中职位的任免过程和声誉分析中“专家小组”的意见收集，决策本身有着一定的隐秘性，只有少数决策可以完整地被详细研究。同时，通过决策本身研究精英的权力多寡，本身也有一定的滞后性。

鉴于三种分析方法各有优劣，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将研究过程分段，并结

① Robert A. Dahl, *Who Gover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104-162.

合研究内容的特质选用相应的方法，从而将研究过程精细化。如艾伦·巴顿（Allen Barton）等人在研究南斯拉夫和美国精英的过程中采用了“滚雪球”方法，这一方法有效结合了职位分析和声誉分析。[①]具体的做法是将分析过程划分为两个部分：首先，通过声誉分析的方式筛选，形成初步的精英名单。艾伦·巴顿团队组建专家小组后，要求专家们提供可供选择的其他联系人，或者他们认为有影响力者；然后，通过职位分析的方式厘清其之所以具有影响力的因素。与此类似，莎莉·卡明斯（Sally N. Cummings）在研究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权力核心圈时也采用了“滚雪球”的分析模式，通过职位分析和声誉分析的有效联动，编制了纳扎尔巴耶夫政府政治精英的初步名单。[②]由此可见，将研究过程分段后选择相关研究方法的复合分析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单一方法研究所带来的弊端。

综上所述，使用单一的研究方法在选择和把握政治精英的组成过程中均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最常用的职位分析优势在于其信息来源的准确性，但是往往会忽略非正式机构在精英团队中的重要性和对领导人的影响；声誉分析虽然弥补了职位分析中对非正式机构的忽视，但是其数据来源易受到被采访人的主观影响，故需要通过大量的数据或是复杂的专家小组人员构成予以弥补；决策分析可以有效规避信息来源的不稳定性，但是政治决策本身具有一定的隐秘性，这会给研究者找到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精英造成困扰。基于此，本文将尝试采用复合路径来开展研究，即通过职位分析确定精英名单，然后结合对具体案例的决策分析进行验证。

需要说明的是，就本文的研究对象，哈萨克斯坦托卡耶夫政府的核心决策层人员构成及其影响而言，本文所采取的复合研究路径具体呈现为通过梳理这些人员和托卡耶夫的会面次数作为一个他们与最高领导人关系亲近程度的衡量指标。这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哈萨克斯坦所形成的是“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权力分配格局，这意味着与总统的关系亲疏度是他们能否进入核心决策层的重要依据或屏障；第二，会面次数虽然不能与影响力直接画等号，但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后者的必要条件。至少就公开报

① Barton Allen H. et al., *Opinion-Making Elites in Yugoslavia*, New York: Praeger, 1973, pp.3-23.
② Sally N. Cummings, *Kazakhstan Power and The Elite*, New York: I. B. Tauris, 2005, p.11.

道的会面而言，它一定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无论在会面中他们讨论的内容是象征性的还是实质上的（事实上，除个别情况，研究者往往并不清楚他们的谈话内容）。当然，也需要承认，这些精英与托卡耶夫的会面次数与其真实影响力之间一定会存在偏差；然而，对于把握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个政治信息公开程度依旧存在一些局限的国家而言，这毕竟是尝试了解其核心决策层构成的一种方式。

二、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的人员构成与主要特点

为梳理出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人员的初步名单，本文采用的样本是“哈萨克斯坦总统官网”[①]和“哈萨克国际通讯社”[②]对托卡耶夫与其下属会面的相关报道，辅之以“总理府官网”[③]和“哈巴尔通讯社”[④]的相关报道。之所以选择这四个信息来源，首先，是因为它们在哈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权威性和政治性；其次，四个新闻来源可以相互佐证和补充。尽管这些新闻报道无疑会存在遗漏，但就研究的目的而言，通过这种梳理至少有助于我们把握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的大致范围。

① “哈萨克斯坦总统官网”是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官方网站，详细记录总统每天的行程。该网站有助于更细致地观察总统和下属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如此可作为框定哈萨克斯坦外交和安全事务中关键角色的一种重要方式。

② “哈萨克国际通讯社”（哈通社）创立于 1920 年，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国家通讯社和世界性通讯社，前身为俄罗斯电讯社驻奥伦堡分社。哈通社中文网站是哈萨克斯坦第一家中文新闻信息类网站，是中哈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见证。自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以来，哈通社加大了对中国经济和政治领域新闻的报道，尤其高度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国新疆的新闻。近年来，虽然有关中哈其他领域的报道数量增多，但有关中哈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报道仍较为缺乏。关于哈通社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孙佳：“哈萨克国际通讯社涉华报道研究”，《青年记者》，2016 年第 5 期，第 101 页。

③ “总理官网”是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官方网站，负责记录总理的每日行程。当“总统府官网”记录会议时未给出参会人员名单时，“总理官网”的相关新闻可作为辅助资料。

④ “哈巴尔通讯社”从政治、经济、外交、官员的任命等多个领域对哈萨克斯坦社会进行报道，是哈萨克斯坦官方通讯社。无论是哈国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还是现总统托卡耶夫，均会定期接见哈巴尔通讯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且多次指出该机构在实施国家信息政策中的重要作用。2022 年 3 月 29 日，托卡耶夫任命此前担任总统府助理的别热克·瓦里为哈巴尔通讯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一）托卡耶夫核心决策层的主要成员

2022 年 1 月 11 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签署命令，批准了“一月事件”后哈政府内阁成员名单，这建立了哈政府核心决策层的雏形。后几经调整，托卡耶夫政府的核心决策层逐渐成形，并大致稳定，直至 2024 年 2 月 5 日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散政府，并任命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罗曼·斯克利亚尔为代理总理。[①]我们梳理了自 2022 年 1 月 5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这一时段核心决策层成员与现任总统托卡耶夫的会见频次，据此总结了托卡耶夫政府中可能被视为决策层的关键角色（见表 1）。可以认为，作为案例或样本，本表所列人物应能大致反映这些人物在 2021 年托卡耶夫执政以来在哈萨克斯坦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政治地位或重要性。[②]当然，本文的分析毕竟是不完全统计，且这种统计无法完全捕捉到托卡耶夫与哈萨克斯坦政治精英之间的全部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尤其无法准确把握托卡耶夫任免高级官员时的心理，故这里的梳理不可避免会存在偏差，对此应予以承认并提请读者注意。

从对会见频次的大致估算来看，托卡耶夫会见次数最多的要员主要包括叶尔詹·哈兹汉诺夫、帖木儿·苏莱曼诺夫、穆拉特·努尔特列吾、罗曼·斯克利亚、叶尔兰·卡林、阿里汗·斯迈洛夫等人。

其中，叶尔詹·哈兹汉诺夫于 1954 年出生在阿拉木图，1989 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曾担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部长等职务。在担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一职期间，叶尔詹·哈兹汉诺夫就曾多次参与首任总统、民族领袖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个人的秘密行动。[③]2023 年 9 月，托卡耶夫任命叶尔詹·哈兹汉诺夫为总统国际事务助理，解除其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统直属国际合作事务特别代表的职务。

---

①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散政府”，中央电视台，2024 年 2 月 5 日，https://news.cctv.com/2024/02/05/ARTI32EEtqgwKjt7fKwRljA1240205.shtml

② 2024 年 2 月 5 日，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散政府。由于本文成稿于 2023 年年底，未及对此时间点之后的哈政局动向进行分析，故本文依旧按照阿里汗·斯迈洛夫政府重组前一些政治人物所担任的职位来陈述相关事实。从本文梳理的会面次数来看，托卡耶夫在本文所考察的时间段会见阿里汗·斯迈洛夫的次数位居第六，或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与总统关系不够密切。当然，这一判断是否准确，有待进一步观察。

③ Сизифов труд Ержана Казыханова.

表 1　2022 年 1 月 5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托卡耶夫会见主要官员的次数

姓　名	官　职	会见次数
叶尔詹·哈兹汉诺夫（Erzhan Kazykhan）	总统国际事务助理	172
帖木儿·苏莱曼诺夫（Timur Suleimenov）	央行行长	125
穆拉特·努尔特列吾（Murat Nurtleu）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21
罗曼·斯卡利亚尔（Roman Sklyar）	政府第一副总理	99
叶尔兰·卡林（Yerlan Karin）	国务顾问兼国家库鲁尔泰副主席	98
阿里汗·斯迈洛夫（Alikhan Smailov）	政府总理	92
阿依达·巴拉耶娃（Aida Balayeva）	文化和新闻部部长	84
萨肯·伊萨别科夫（Saken Issabekov）	国家警卫局局长	78
穆赫塔尔·特列乌别尔季（Mukhtar Tileuberdi）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驻奥地利特命全权大使兼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	78
赛里克·茹曼加林（Zhumangarin Serik）	哈萨克斯坦政府副总理	74
叶尔兰·霍沙诺夫（Yerlan Koshanov）	马吉利斯（议会下院）议长	72
鲁斯兰·贾克斯勒科（Ruslan Zhaksylykov）	国防部部长	62
阿勒马斯阿达姆·萨特哈利耶夫（Satkaliyev Almassadam）	能源部部长	62
马吾林·阿什姆巴耶夫（Maulen Ashimbayev）	参议院议长	61
耶尔乌兰·加玛吾巴耶（Yerulan Zhamaubayev）	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60
叶尔麦克·萨赫姆巴耶夫（Sagimbayev Yermek Aldabergenovich）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60
巴格达特·穆辛（Bagdat Mussin）	数字发展、创新和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	52
玛拉特·阿赫梅特詹诺夫（Akhmetzhanov Marat Muratovich）	2023 年 9 月前任内务部部长，现任阿克莫拉州州长	50
阿斯耶特·伊谢克舍夫（Asset Issekeshev）	曾担任总统助理	48
黑扎特·努尔达吾列托夫（Gizat Nurdauletov）	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前担任总检察长）	45
阿塞特·伊尔加利耶夫（Aset Irgaliyev）	总统经济事务助理	31
尤里·伊林（Yury Ilyin）	紧急情况部部长	30
沃勒扎斯·别克帖诺夫（Olzhas Bektenov）	总统府主任	28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①

① 由于哈萨克斯坦新闻很少提及参会人员，表中所列会面次数可能少于实际次数，部分数据通过识别新闻中的人物获得。表中内容按照与总统会面的次数进行降序排列，统计时间从 2022 年 1 月 5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需要指出，以上数据由作者汇集官方网站的数据而制成，囿于资料的匮乏和信息的隐秘，哈总统与其各部部长之间履历的重合、私人关系状况，以及他们获得重用的原因等关键问题仍有许多不明之处。

帖木儿·苏莱曼诺夫 1978 年出生在巴甫洛达尔州，毕业于巴甫洛达尔国立大学并获得管理学学位。托卡耶夫任总统后他开始担任总统助理，并在“一月事件”后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无论是在托卡耶夫会晤各国领导人还是接见各部部长时苏莱曼诺夫均陪伴左右。2023 年 8 月底，托卡耶夫解除其总统办公厅副主任一职，又于 9 月初将其任命为央行行长。

穆拉特·努尔特列吾 1976 年出生在阿拉木图，毕业于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国立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穆拉特·努尔特列吾多年来一直与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托卡耶夫关系密切。在托卡耶夫担任外交部长时，努尔特列吾曾担任托卡耶夫的顾问。托卡耶夫就任总统后，便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将其任命为总统办公厅主任。2022 年 1 月 5 日，托卡耶夫调任其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实际是为了监控涉嫌叛国罪的时任主席的卡里姆·马西莫夫。在马西莫夫被坐实罪名、解雇逮捕后，努尔特列吾以总统代表的身份协助该部门度过艰难期。2023 年 4 月 3 日，托卡耶夫任命其为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以代替老部长穆赫塔尔·特列乌别尔季。①

罗曼·斯克利亚尔 1971 年出生在巴甫洛达尔市，先后毕业于巴甫洛达尔大学、莫斯科现代商业学院和哈萨克斯坦法律与国际关系学院，曾任哈政府副总理职务。作为权力机构里的俄罗斯族代表，罗曼·斯克利亚尔不仅代表着哈境内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利益，也是哈萨克斯坦加强哈俄联盟的一种含蓄表示。

叶尔兰·卡林 1975 年出生在南哈萨克斯坦州，先后毕业于阿克托别国立大学、阿里法拉比国立大学，曾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助理。2022 年 1 月 5 日，托卡耶夫解除叶尔兰·卡林原本担任的总统助理职务，任命叶尔兰·卡林为国务秘书。国务秘书一职最初由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1995 年取消副总统职位后设置，其主要任务在于执行总统下达的私人命令，负责在总统的委托下与议会、法院、社会组织等机构进行各种事务的处理协调，在国际事务层面代表总统利益进行发言。2022 年 6 月 14 日，托卡耶夫取消国务秘

① Руководитель АП Мурат Нуртлеу получил новую должность// Tengri News. 3 апреля 2023 г. https://tengrinews.kz/kazakhstan_news/rukovoditel-ap-murat-nurtleu-poluchil-novuyu-doljnost-495298/?ysclid=lr0x3tj75s818718598

书职位，新设国务顾问一职，并将叶尔兰·卡林任命为国务顾问，直接接受总统指示。根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 44 条第 19 款的规定，除了国务秘书原有的事务，国务顾问还负责协调和制定国家战略规划，就战略问题向国家元首提出建议。①

阿里汗·斯迈洛夫 1972 年出生于阿拉木图市，先后毕业于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和哈萨克管理经济预测学院，获得应用数学本科和国家管理硕士学位。阿里汗·斯迈洛夫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统计局局长、国民经济部统计委员会主席、总统助理、政府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等多个职位。②2022 年 1 月 5 日，在哈萨克斯坦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背景下，托卡耶夫调任其为总理，接替因应对动乱不力而下台的马明。长年从事行政工作的阿里汗·斯迈洛夫与托卡耶夫在纳扎尔巴耶夫执政时期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阿里汗·斯迈洛夫 2003 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时任外交部部长正是托卡耶夫。

阿依达·巴拉耶娃 1974 年出生于阿拉木图州，先后毕业于阿拜国立师范大学、哈萨克斯坦国立农业大学。作为托卡耶夫核心决策层的女性角色，阿依达·巴拉耶娃多次陪同参与领导人与下属的工作会谈。2022 年 6 月，托卡耶夫任命她担任国家库鲁尔泰③秘书一职，主要负责根据规定聘请专家和学者来开展或者执行特定类型的工作、库鲁尔泰会议的筹备和组织，以及代表主席和副主席行使其他职权。2023 年 9 月，托卡耶夫将新闻和社会发展部重组为文化和新闻部，并任命阿依达·巴拉耶娃为文化和新闻部第一任部长。

穆合塔尔·特列吾什巴耶夫 1968 年出生在南哈州（现图尔克斯坦州），曾毕业于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特列吾什巴耶夫 2019 年便在外交部工作，先后在外交部担任亚洲、中东、非洲司一等秘书，双边关系司部门主任等职

① Токаев упразднил должность госсекретаря, занимавший ее Ерлан Карин стал госсоветником// Фергана. 14 июня 2022 г. https://fergana.media/news/126539/?ysclid=l914n5pekx769021753

②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і. https://primeminister.kz/kz/government/composition/smailov

③ 国家库鲁尔泰是哈萨克斯坦的一个咨询机构，成立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该机构由哈萨克斯坦总统领导，其主要目的是为进一步发展社会凝聚力制定思路和步骤。

务，并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达鲁萨兰国、菲律宾、瑞士等多个国家出任大使。托卡耶夫借助穆合塔尔·特列吾什巴耶夫等人的既有经验及时稳定了“一月事件”后的形势，同时缓和了与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精英团队的关系。2023 年 4 月的部长职位变更中，穆合塔尔·特列吾什巴耶夫外交部长一职由穆拉特·努尔特列吾接任。

除了以上关键成员，国家警卫局局长萨肯·伊萨别科夫、能源部部长阿勒马斯阿达姆·萨特哈利耶夫、政府副总理赛里克·茹曼加林、国防部长鲁斯兰·贾克斯勒科、马吉利斯（议会下院）议长叶尔兰·霍沙诺夫也是哈萨克斯坦核心决策层中的重要成员。2022 年 1 月 6 日，托卡耶夫将担任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的萨肯·伊萨别科夫擢升为国家警卫局局长。2023 年 4 月，托卡耶夫免去阿勒马斯阿达姆·萨特哈利耶夫“萨姆鲁克-卡泽纳”国家基金董事会主席一职，将其改任为能源部部长。[①]“一月事件”之后，托卡耶夫将赛里克·茹曼加林调任为政府副总理兼贸易和一体化部代理部长，不再担任竞争保护和发展署署长职务。2023 年 9 月 2 日，托卡耶夫总统决定将赛里克·茹曼加林同劳动和保障部部长塔玛拉·杜伊谢诺娃一起留任政府副总理。[②]国防部长鲁斯兰·贾克斯勒科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部队指挥工作。2022 年 1 月 19 日，根据总统令，他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防部部长。鲁斯兰·贾克斯勒科在官方报道中的信息相对较少，但他的临危不乱、坚韧的性格赢得了总统托卡耶夫的信任。据国防部的一名上校透露，鲁斯兰·贾克斯勒科在紧急情况下表现出“独立性和钢铁意志”，这种特质显然吸引了托卡耶夫总统。[③]在托卡耶夫的授权下，鲁斯兰·贾克斯勒科可自行任命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叶尔兰·霍沙诺夫曾先后担任哈萨克斯坦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交通运输部民航委员会主席、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政

① Алмасадам Сәтқалиев Энергетика министрі лауазымына тағайындалды// ҚазАқпарат. 4 сәуір 2023 ж. https://www.inform.kz/kz/almasadam-satkaliev-energetika-ministri-lauazymyna-tagayyndaldy_a4053014?ysclid=lg50o0oz18404964949

② С.М. Жұманғарин туралы// 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2 қыркүйек 2023 ж. https://www.akorda.kz/kz/sm-zhumangarin-turaly-28754

③ «Кто не согласен, можете писать рапорт об увольнении» Как новый министр обороны начал свою работу// ORDA. 26 января 2022 г. https://orda.kz/kto-ne-soglasen-mozhete-pisat-raport-ob-uvolnenii-kak-novyj-ministr-oborony-nachal-svoju-rabotu/?ysclid=lsak9mihb4682720058

府驻议会代表、总统办公厅主任等职务。[①]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期间，叶尔兰·霍沙诺夫密集参与了托卡耶夫召开的会议。2022 年 2 月 1 日，托卡耶夫将其调任为马吉利斯（议会下院）议长。而在 2023 年 3 月和 2024 年 2 月的两次议会重组中，叶尔兰·霍沙诺夫被继续留任马吉利斯议长。

此外，相比较下会见次数较少的沃勒扎斯·别克帖诺夫的表现也值得关注。出生于 1980 年的沃勒扎斯·别克帖诺夫于 2001 年毕业于哈萨克斯坦国家法学院，获得法学学位。此后，他在总统府和司法部任职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人脉资源。沃勒扎斯·别克帖诺夫于 2012 开始从事反腐败工作。“一月事件”托卡耶夫任命其为哈萨克斯坦反腐败行动署署长一职后，又于 2023 年 4 月将其改任为总统办公厅主任。关于沃勒扎斯·别克帖诺夫的新闻报道相对较少，他与托卡耶夫的会面也多集中在他担任反腐败行动署署长一职时期。尽管如此，他的能力不容忽视。2024 年 2 月 6 日，沃勒扎斯·别克帖诺夫出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总理。[②]基于此，新任总统办公厅主任阿依别克·达德巴耶夫（Aibek Dadebayev）有望在未来哈萨克斯坦政治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由此可见，在人事改组过程中，托卡耶夫不仅任用了部分纳扎尔巴耶夫时期的部门负责人，还重用如叶尔兰·卡林、萨肯·伊萨别科夫、穆拉特·努尔特列吾等自己精心培养的哈萨克精英。

（二）托卡耶夫核心决策层的主要特点

以“一月事件”为节点，托卡耶夫通过对哈萨克斯坦高层人员的多轮调整，逐步组建了以其为核心的精英团队。目前来看，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的人员构成主要有人员专业化、构成集中化、成分去“纳”化和成员年轻化四个特点。

第一，托卡耶夫的精英团队构成专业化。托卡耶夫很大程度上摒弃了通过血缘关系建立精英团队的方式，在选择精英团队成员过程中更侧重人员的

① Ерлан Қошанов ҚР Парламент Мәжілісінің төрағасы болып сайланды. 1 Ақпан 2022 ж. https://egemen.kz/article/302808-erlan-qoshanov-qr-parlament-madgilisininh-toraghasy-bolyp-saylandy?ysclid=lr0wxqegoi152633524

② Новым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Казахстана стал Олжас Бектенов. 6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www.nur.kz/politics/appointments/2059307-novym-premer-ministrom-kazahstana-stal-olzhas-bektenov/.

专业化能力和忠诚表现，其中以法学、经济学专业等学科出身的人员为主。团队中的重要成员如政府总理阿里汗·斯迈洛夫、副总理罗曼·斯卡利亚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叶尔麦克·萨赫姆巴耶夫等都拥有良好的法学和经济学基础，这也为他们在行政部门的工作顺利展开打下基础。而总统办公厅人员的选择更侧重其法学专业的能力，如沃勒扎斯·别克帖诺夫、帖木儿·苏莱曼诺夫、阿依达·巴拉耶娃以及曾担任总统助理的阿斯耶特·伊谢克舍夫等，均拥有法学学位。核心决策层成员的专业素养和忠诚表现，无疑为哈萨克斯坦政府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二，托卡耶夫的精英团队构成集中化。这主要指的是核心决策人员与总统府的关联度较高，多数是总统府成员或曾在总统府任职。总统府作为哈萨克斯坦的国家最高决策机构，为精英成员增加了权威性和影响力。梳理目前核心决策层成员的履历可以发现，多数精英成员都曾先在总统府任职学习，再转向重要岗位，例如，政府总理沃勒扎斯·别克帖诺夫曾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文化和新闻部部长阿依达·巴拉耶娃曾任总统府办公厅副主任，外交部部长穆拉特·努尔特列吾曾任总统府办公厅主任，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曾任国务秘书以及央行行长帖木儿·苏莱曼诺夫曾任总统助理。这一现象表明，总统府在培养和选拔精英成员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在总统府的任职学习，精英成员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家的状况，积累丰富的资源和人脉，为他们在重要岗位上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托卡耶夫重组精英团队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摆脱前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影响。因此在团队成型过程中逐渐去“纳”化。托卡耶夫上台前期并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变动。直到“一月事件”后，托卡耶夫与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为代表的重要政治力量才逐步地达成一定的“妥协”。整个权力变革拉锯战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双方势力的互相拉扯博弈。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纳扎尔巴耶夫的侄子、身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萨马特·阿比什（Samat Abish）的几次任命过程。萨马特·阿比什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被托卡耶夫宣布解职并被逮捕，随后又戏剧化地官复原职。尽管与纳扎尔巴耶夫政府的团队组织有一定重叠，但托卡耶夫政府的核心决策层任命了不少新人，而纳扎尔巴耶夫时期的老派官员已很少担任重要职务。

第四，精英团队成员的年轻化趋势，是托卡耶夫精英团队一个引人瞩目的特点。2023 年 1 月 4 日，托卡耶夫签署了五位部长的人事任命，其中祖里菲娅·苏莱曼诺娃（Zulfiya Suleimenova）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年仅 32 岁的祖里菲娅·苏莱曼诺娃被任命为生态和自然资源部部长，又于 9 月出任总统顾问兼总统国际环境合作事务特别代表。[①]此外，新任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部长马拉特·卡拉巴耶夫 2023 年上任时仅 35 岁，与其前任部长相比，卡拉巴耶夫年轻了 23 岁。司法部长阿扎马特·叶斯卡拉耶夫比其前任年轻 43 岁。总体来看，2023 年政府改组后哈萨克斯坦核心决策层成员平均年龄为 47.8 岁，而在此之前哈萨克斯坦官员的平均年龄为 50.1 岁。[②]相较于过去，哈萨克斯坦政府已经开始注重吸引更多年轻人才加入精英团队，以保持决策层的活力和适应未来的挑战。

以上四个特点都从侧面反映了托卡耶夫的政治见解和哈萨克斯坦政治体系的变化调整。通过对特点内容和内因的厘清，能有效帮助研究者们把握哈萨克斯坦未来的政局走向。

三、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对哈萨克斯坦内政的影响过程

“一月事件”后托卡耶夫政府重组精英团队与哈萨克斯坦政府启动的多轮改革并行不悖。这些改革举措的制定和出台，既反映了哈萨克斯坦政府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同时也给了托卡耶夫深度重构国家决策层以重要契机。为初步厘清托卡耶夫政府重组精英团队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选择哈萨克斯坦政局在“一月事件”后实行的部分改革举措作为案例予以分析。通过梳理托卡耶夫与核心决策层成员的会面时间与会议频次，或许有助于对哈萨克斯坦核心决策层在哈萨克斯坦内政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得

① Советник Президента –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м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Сулейменова Зульфия Булатовн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21 сентября 2023 г. https://akorda.info/ru/sovetnik-prezidenta-specialnyy-predstavitel-prezidenta-respubliki-kazahstan-po-mezhdunarodnomu-ekologicheskomu-sotrudnichestvu-suleymenova-zulfiya-bulatovna-2781128

② На сколько помолодел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Казахстана// Tengri News. 4 января 2023 г. https://tengrinews.kz/kazakhstan_news/na-skolko-pomolodelo-pravitelstvo-kazahstana-487672/?ysclid=lr0xkaclk0797829459

出初步结论。

（一）哈萨克斯坦实施的政治改革

2022 年 3 月 16 日，托卡耶夫总统出席议会上下两院联席会议，并发表了 2022 年国情咨文。在此次会议上，托卡耶夫宣布了一项使哈萨克斯坦政治制度“全面现代化”的计划，决意在哈萨克斯坦进行一次“全面改革”，从而使哈萨克斯坦从一个“超级总统制政府”过渡到一个“拥有强大议会的总统制共和国”。[①]具体改革举措包括：削弱总统权力；总统不再担任执政党的领导人，且在任职七年后不得连任；进行议会改革，将权力下放至议会，下院议员通过混合选举制产生，赋予其更重要的地位；对《宪法》进行重要修订，设立宪法法院和监察员机构——人权专员；成立四个新的州级行政单位，将部分权力下放至地方；以哈萨克新闻媒体为抓手进行改革，打破传统媒体在信息领域的垄断；部门改组调整，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等等。

“一月事件”是哈萨克斯坦开始实行政治改革的重要原因。这一事件爆发的原因包括哈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收入分配不平衡，政府长期对社会民粹主义思潮的默许与纵容激化了社会矛盾，等等。对此，托卡耶夫也认为，“一月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内停滞不前的结果。因此，哈萨克斯坦迫切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制度的全面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挑战，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同时，托卡耶夫也尝试以此为契机，削弱前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对哈萨克斯坦政治的影响力，以结束“艾尔巴西（Елбасы，意为国家领袖）时代”。为此，托卡耶夫在“一月事件”后即将纳扎尔巴耶夫亲属从公共部门的重要职位上调离，并在 2022 年 6 月举行了修宪公投，其中一项修正案就是禁止纳扎尔巴耶夫的亲属担任政府职位，以期重塑政府格局。

在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托卡耶夫与核心决策层成员保持了高频的密切联系（见表 2）。以安全会议为主的这一系列会议显示，核心决策层成员在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① Мемлекет басшысы Қасым-Жомарт Тоқаевтың «Жаңа Қазақстан: жаңару мен жаңғыру жолы» атты Қазақстан халқына Жолдауы// Қордай ауданының әкімдігі. 17 наурыз 2022 ж. https://www.gov.kz/memleket/entities/zhambyl-korday/press/news/details/342807?lang=kk&ysclid=lr0wtlk8b279111517

表 2　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实施中重要讲话及会见安排（2022 年）

日　期	托卡耶夫会见和行程	备　注
2 月 12 日	叶尔詹·哈兹汉诺夫、阿斯耶特·伊谢克舍夫、叶尔兰·卡林、阿依达·巴拉、萨肯·伊萨别科夫	安全会议，会后 14—24 日期间总统频繁、单独地会见相关部门负责人
2 月 25 日	穆赫塔尔·特列乌别尔季、叶尔詹·哈兹汉诺夫、玛拉特·阿赫梅特詹诺夫、叶尔兰·图尔古姆巴耶夫、帖木儿·苏莱曼诺夫、阿里汗·斯马伊洛夫、穆拉特·努尔特列吾	内务部高级人员会议
2 月 26 日	阿里汗·斯马伊洛夫、穆赫塔尔·特列乌别尔季、叶尔兰·卡林、黑扎特·努尔达吾列托夫、鲁斯兰·贾克斯勒科夫、萨肯·伊萨别科夫	安全会议
3 月 1 日	全体人员	总统宣布开启政党改革
3 月 3 日	阿里汗·斯马伊洛夫、叶尔兰·卡林、央行行长哈利姆詹·皮尔玛托夫、最高改革委员会副主席兼总统自由顾问苏马·查克拉巴蒂、阿塔梅肯企业家协会主席拉伊穆别克·巴塔洛夫、黑扎特·努尔达吾列托夫、穆拉特·努尔特列吾、穆拉特·别克塔诺夫	最高改革委员会会议
3 月 4 日	巴伊铁列克国有控股公司执行总裁哈纳特·沙尔拉帕耶夫、沃勒扎斯·别克帖诺夫、穆拉特·努尔特列吾、叶尔詹·哈兹汉诺夫、玛拉特·阿赫梅特詹诺夫、海尔别克·吾斯肯巴耶夫、帖木儿·苏莱曼诺夫、萨肯·伊萨别科夫、黑扎特·努尔达吾列托夫	安全会议
3 月 16 日	全体人员	总统宣布开启全面改革
3 月 29 日	阿里汗·斯迈洛夫、叶尔兰·霍沙诺夫、叶尔兰·卡林、阿依达·巴拉耶娃、穆拉特·努尔特列吾、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努尔兰·阿布德若夫	宪法修正会议，会后总统会见相关部门负责人
4 月 22 日	玛吾林·阿什姆巴耶夫、叶尔兰·霍沙诺夫、叶尔兰·卡林、穆拉特·努尔特列吾、司法部部长哈纳特·穆辛、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叶鲁兰·扎马巴耶夫、阿依达·巴拉耶娃	托卡耶夫对该国宪法进行修正与补充
4 月 26 日	全体人员	总统宣布退出执政党
4 月 28 日	玛拉特·阿赫梅特詹诺夫、叶尔詹·哈兹汉诺夫、穆合塔尔·特列吾什巴耶夫	工作汇报
4 月 29 日		总统建议全民投票修改宪法
8 月 22 日	阿里汗·斯迈洛夫、罗曼·斯卡利亚尔、海尔别克·吾斯肯巴耶夫、鲁斯兰·贾克斯勒科夫、穆拉特·努尔特列吾	安全会议，会后总统会见相关部门负责人
8 月 23 日	阿里汗·斯迈洛夫、穆拉特·努尔特列吾、哈利姆詹·皮尔玛托夫、耶尔乌兰·加玛吾巴耶夫、帖木儿·苏莱曼诺夫、国家审计委员会主席娜塔莉亚·格都诺娃、国家经济部部长阿勒别克·库安特洛夫	经济会议
8 月 24—25 日	帖木儿·苏莱曼诺夫、穆赫塔尔·特列乌别尔季、叶尔詹·哈兹汉诺夫、耶尔乌兰·加玛吾巴耶夫、阿斯耶特·伊谢克舍夫、阿勒马斯阿达姆·萨特哈利耶夫、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总裁海拉特·克里姆别托夫	会谈
9 月 1 日		托卡耶夫发表国情咨文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托卡耶夫政府实施政治改革的决策过程

深入考察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的决策过程，大致可以发现，哈萨克斯坦对内政策的制定，基本遵循“召开以安全会议为主的小型会议讨论问题→频繁、单独会见相关部门人员→举行大规模的会议讨论决策内容→形成总统决策”的决策流程（见图 1）。具体来看，托卡耶夫及其核心决策层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主要经历四个步骤：首先，召开以安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规模较小的会议，在会议上由核心决策层成员和相关部门的代表针对议题集中报告信息、表达意见，通过这样的讨论过程为托卡耶夫提供解决方案与方向。这一过程以信息的共享交流为主要目的，形成托卡耶夫与其核心决策层之间的信息双向交流与影响。其次，在报告会议后，托卡耶夫会对会议内容进行权衡，在此基础上单独约见相关部门人员，以获取专业意见。这个阶段通常需要持续三天到十几天的时间。再次，由总统府召集大规模的集体会议，针对议案本身的可行性以及面临的各项问题进行详细讨论。此时的会议规模与人员构成相较于安全会议有所扩大，往往会纳入相关部门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最后，会议最终形成针对国内政策的相关方案，后续再由相对应的部门制定实施细则并推动落实。

图 1　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实行政治改革的决策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小型安全会议的作用最为关键。具体而言，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成信息的收集和汇总，二是搭建决策平台。在小型会议的过程中，核心决策层成员会围绕议题内容阐述相关的信息和各自的建议，之后总统再听取各个部门高官的单独汇报，然后再召集较大规模的会议围绕议题进行商讨。在这个过程中，核心决策层成员已经在小型会议中优先向总统表达了意见和建议，因此，小型安全会议的召开，可以看作是政

治决策在制定之初就已经被核心决策层深刻影响着的证据。虽然参加小型会议的成员并不固定，但有部分人名频繁出现，如政府总理阿里汗·斯迈洛夫、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穆拉特·努尔特列吾、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和总统国际事务助理叶尔詹·哈兹汉诺夫、国防部长鲁斯兰·贾克斯勒科等，偶尔还会有总统办公厅的助理和秘书。这些成员均具备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背景，尤其是法学方面的学习经历基本成为总统府人员的履历标配。这主要是由于托卡耶夫在选拔精英团队成员时，摒弃了纳扎尔巴耶夫时期更偏好投身于哈国家建设的苏联精英以及“权贵门阀”的选人方式，转而以能力、专业和忠诚程度作为主要选拔标准。总统办公厅人员在履历方面的明显倾向，既代表了托卡耶夫目前重视法治体系的整顿改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核心决策层成员对托卡耶夫决策的影响。

四、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对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的影响过程

2022 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哈俄关系，哈萨克斯坦开始尝试疏远俄罗斯，并积极寻求与美国、欧洲及其他国家的接触与合作。这种变化导致了哈俄两国在“追随”和“自主”战略方向上展开了一定的博弈，其中主要表现之一，是双方围绕里海管道联盟（Caspian Pipeline Consortium，以下简称“CPC 输油管道”）出现的争端。因此，本文选取 2022 年 7 月 CPC 输油管道停运事件这一案例。梳理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中断 CPC 输油管道的反应以及决策过程，可以对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在哈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形成初步认识。

（一）2022 年 7 月 CPC 输油管道停运事件及哈萨克斯坦的反应

CPC 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领衔的石油财团、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哈萨克斯坦政府共同运营。该管道全长 1500 公里，主要功能在于收集西哈萨克斯坦的大型油田和俄罗斯生产商的原油，输往黑海边的新罗西斯克港口，再从黑海运往欧洲。其中，CPC 输油管道主要依赖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卡拉恰加纳克（Karachaganak）、卡沙干（Kashagan oil field）和田吉兹（Tengiz）三个重要油田的产能。可以不夸

张地说，CPC 输油管道堪称哈萨克斯坦石油对外出口的“命脉”，运输量超过每天 120 万桶（每年 5400 万吨），约占哈国年石油出口量的 80%。[①]正如哈萨克斯坦前能源部长、总统顾问波拉特 •阿克楚拉科夫（Bolat Akchulakov）所说，“CPC 输油管道在石油产量和技术上均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使其成为哈萨克斯坦能源输送的首选通道，并且替代方案的部署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完成”[②]。

2022 年 7 月 5 日，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滨海边疆区法院下令暂停 CPC 输油管道活动 30 天。[③]鉴于 CPC 输油管道对于哈萨克斯坦能源出口的重要意义，这一行为直接影响了哈萨克斯坦对欧洲国家的石油出口，并对欧洲国家能源进口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俄罗斯这一行为被视为对哈萨克斯坦拒绝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的“惩罚”。2022 年 6 月 17 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指出国家完整性和民族自决权的矛盾，并拒绝承认“准国家实体”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独立。此外，7 月 4 日，托卡耶夫在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 • 米歇尔（Charles Michel）会晤期间表示，哈萨克斯坦可帮助其度过油荒处境。因此，俄罗斯试图通过中断 CPC 输油管道施压哈萨克斯坦，以影响哈萨克斯坦的外交政策。阿斯卡尔 •艾索托夫（Askar Aysautov）甚至表示，通过观察 CPC 输油管道能否正常运行，可以判断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④]

为应对此次 CPC 输油管道中断事件，哈萨克斯坦于 2022 年 7 月 6 日公

① See “Russian court orders halt to Caspian oil pipeline but exports still flow”, Reuters, July 6,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gy/caspian-pipeline-consortium-says-court-orders-suspension-operations-30-days-2022-07-06/; “Pipeline Critical to Kazakh Oil Exports Ordered to Halt Operations by Russian Court”, Diplomat, July 6,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7/pipeline-critical-to-kazakh-oil-exports-ordered-to-halt-operations-by-russian-court/

② “Мы не хотим уйти от одного риска и породить другой”: Акчулаков об экспорте нефти через КТК// NUR.KZ. 20 мая 2022 г. https://www.nur.kz/politics/kazakhstan/1970293-my-ne-hotim-uyti-ot-odnogo-riska-i-porodit-drugoy-akchulakov-ob-eksporte-nefti-cherez-ktk/?ysclid=lr0zucf3w094894598

③ “Russian Court Suspends Kazakh Oil Pipeline’s Operations”, *the Moscow times*, July 6, 2022, https://www.themoscowtimes.com/2022/07/06/russian-court-suspends-kazakh-oil-pipelines-operations-a78221

④ Экспорт нефти из Казахстана через Россию прерывается в четвертый раз за этот год. 25 августа 2022 г. https://inosmi.ru/20220825/kazakhstan-255679733.html?ysclid=lqyx5ouc83774850936

布禁令，表示哈政府不会认证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货物的电子发票，而没有电子发票的货物将被禁止从哈萨克斯坦过境，无法运输至俄罗斯和白俄罗斯。7 月 7 日，哈萨克斯坦召开物流运输潜力发展专项工作会议，强调了交通物流运输领域对哈萨克斯坦经济的重要作用。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员包括总理阿里汗·斯迈洛夫、政府第一副总理罗曼·斯卡利亚尔、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穆赫塔尔·特列乌别尔季、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部部长海尔别克·阿伊特拜吾勒·吾斯肯巴耶夫、能源部前部长波拉特·阿克楚拉科夫等。7 月 8 日，托卡耶夫宣布退出 1995 年签署的独联体跨国货币委员会协议。同时，哈萨克斯坦明确表示要优先发展跨里海运输走廊，以实现石油出口路线的多样化。7 月 11 日，原裁决中对 CPC 输油管道实施为期 30 天暂停的内容被取消，改为 CPC 输油管道支付 20 万卢布罚款。[①]在此期间，托卡耶夫及其核心决策层成员保持了较为高频的密切联系。这些成员中除了相关部门的主责官员，核心决策层人员还包括总理阿里汗·斯迈洛夫、政府第一副总理罗曼·斯卡利亚尔、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穆赫塔尔·特列乌别尔季、国务秘书叶尔兰·卡林等。7 月 12 日，哈萨克斯坦政府总理阿里汗·斯迈洛夫在接受该国国家电视台《新哈萨克斯坦》栏目采访时表示，CPC 管道的石油输送处于稳定的工作模式当中，哈萨克斯坦石油的出口没有受到任何阻碍。[②]7 月 13 日，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同欧盟中亚问题特别代表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会晤，双方就深化交通物流领域合作和发展跨里海国际运输航线的紧迫性达成了共识，并对确保能源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予以特别关注。[③]

观察哈萨克斯坦对 2022 年 CPC 输油管道中断事件的反应，可以发现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决策透明性不高。在俄罗斯于 7 月 5 日采取中断管道的举措后，哈萨克斯坦直至 7 月 7 日才召集会议讨论此事。而 7 月 5 日和 6 日，托卡耶夫会见了哪些官员的信息目前不得而知。整个决策过程主要限于托卡耶夫及部分核心成员，其中总统办公厅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角色。第二，多元

① “俄法院修改裁决 CPC 石油管道不会停工”，哈萨克国际通讯社，2022 年 7 月 11 日，https://cn.inform.kz/news/cpc_a3953406/

② “政府总理：哈萨克斯坦石油出口未受到任何阻碍”，哈萨克国际通讯社，2022 年 7 月 12 日，https://cn.inform.kz/news/article_a3954157/

③ “哈萨克斯坦与欧盟讨论进一步深化合作问题”，哈萨克国际通讯社，2022 年 7 月 13 日，https://cn.inform.kz/news/article_a3954223/

平衡外交政策贯彻始终。哈萨克斯坦对于俄掐断 CPC 管道事件仍然主张通过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谋求其他国家和联盟的合作，借此对冲此次事件带来的冲击。第三，其他党派参与关键议题的作用极其有限。参与此次事件决策的主要成员多数来自哈萨克斯坦执政党——阿玛纳特党，而其他党派的参与度相当有限。这与托卡耶夫在政治改革决策过程中的倾向相符，更偏向于采纳党内的意见和建议，而对其他党派的观点相对忽视。

（二）哈萨克斯坦应对 CPC 输油管道停运事件的决策过程

通过简要回顾哈萨克斯坦应对俄罗斯掐断 CPC 管道的决策过程，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遵循“部分核心成员讨论→总统决策→形成外交政策”的决策流程（见图 2）。具体来看，托卡耶夫及其核心决策层制定对外政策的过程主要经历三个步骤：首先，部分核心成员围绕特定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从而全面分析、评估相关问题，同时探讨各种可能的政策选择和解决方案，从而为总统决策提供信息或建议。其次，总统在收到核心决策层成员的各种建议和观点后进行分析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选定相应的外交政策。最后，在总统决策确定后，由外交部等相关的政府机构开始落实政策，从而确保政策的执行与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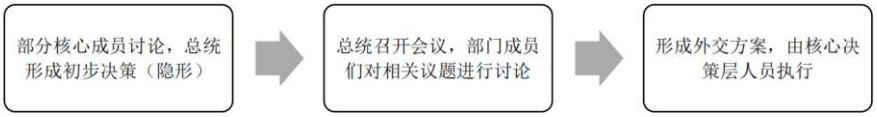

图 2　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应对 CPC 管道事件的决策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伴随着总统与核心成员之间的双向影响，总统通过人事任免和权力分配的方式从人员结构上直接影响精英团队的决策判断，而核心成员对于总统的影响往往隐蔽而不易察觉，这一点在总统对外政策的决策判断过程中可以窥见一二。整个总统对外政策的决策判断过程可以粗略分为两个环节：先是小范围的部分核心成员为总统的决策提供关键性意见建议；再是通过物流运输潜力发展专项工作会议细化决策的落地

战略，两个环节共同构建了对外政治决策的重要部分，主导着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战略目标的达成。而在环节中，核心成员通过策略与意见的传递影响着总统对决策的判断。与对内政策制定过程有所不同的是，第二环节中的会议以相关的外交议题为主，而不是采用前文提及的安全会议的形式。

由此可见，由于内政外交政策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决策制定的响应时间以及相关人员的参与程度不同，托卡耶夫及其核心决策成员在制定内外政策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决策模式。这一差异主要表现在预案制定过程的公开程度以及参会人员的规模这两个方面。第一，预案制定过程的公开性。对内政策的相关预案基本形成于小型会议和总统与部门代表会晤的过程中。这一有组织有计划的会议使整个决策过程更加透明。相较之下，对外政策流程更加隐晦。第二，参会决策人员的规模。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托卡耶夫政府更重视总统和核心决策层成员之间的讨论，而总统是否会见相关决策或执行部门人员并不是必要的流程。这或许是因为，一方面，对外政策的时效性要求更高，限制了总统府逐步了解情况的时间；另一方面，对外政策需要一定的保密性，频繁的会面会影响最终的决策效率。显而易见，托卡耶夫及其核心决策层对于内政与外交政策制定的决策流程不同，凸显了托卡耶夫政府的灵活性，或许有助于哈政府更好地应对国内外局势变化。

五、结　语

近年来，随着哈萨克斯坦核心决策层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对哈萨克斯坦核心决策层成员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不过，尽管精英在总统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得到了一定关注，但对于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的构成及其对哈内政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式等，研究者尚未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而本文尝试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由于传统的职位分析、声誉分析和决策分析三种精英识别方法均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故本文选择通过职位分析确定精英名单，然后结合具体案例的决策分析进行验证，以期对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在哈萨克斯坦内政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形成初步认识。

整体而言，托卡耶夫政府的核心决策层已经大致成型。主要核心成员包括总统国际事务助理叶尔詹·哈兹汉诺夫、第一副总理罗曼·斯克利亚尔、国务顾问兼国家库鲁尔泰副主席叶尔兰·卡林、总理阿里汗·斯迈洛夫、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穆拉特·努尔特列吾、国防部长鲁斯兰·贾克斯勒科等。相较于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核心决策层，如今的哈政府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托卡耶夫核心决策层呈现出人员专业化，托卡耶夫更注重哈萨克精英的个人能力与忠诚。第二，成分去“纳”化，核心决策层人员大幅度更迭，纳扎尔巴耶夫时期的老派官员已很少担任重要职位。第三，构成集中化，核心决策层人员主要以总统府成员或曾在总统府任职的官员为主。第四，托卡耶夫政府开始注重新鲜力量的输入，政府呈现成员年轻化趋势。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哈萨克斯坦官方新闻中并未公开与会人员的名单，本文对于托卡耶夫核心决策层成员及其对哈萨克斯坦内政和外交决策的影响的研究只能被视为初步的、探索性的尝试。因此，关于托卡耶夫核心决策层如何构建“新的哈萨克斯坦”以及核心决策层内部成员如何发展，仍需作进一步的观察和更深入的研究。

从哈萨克斯坦全面政治改革及其对俄罗斯切断 CPC 输油管道的反应可以看出，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层对哈内外政策有重要影响。不过，核心决策层在内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模式有差异：在对内政策制定过程中，托卡耶夫精英团队主要遵从“召开以安全会议为主的小型会议讨论问题→频繁、单独会见相关部门人员→举行大规模的会议讨论决策内容→形成总统决策”的决策流程；而对外政策则遵从“部分核心成员讨论→总统决策→形成外交政策”的决策模式。在这两种决策模式中，预案制定过程的公开性和参与决策人员的规模有明显区别。相较于对内政策清晰的决策流程，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程度较低，且参与外交政策决策的人员规模要小得多，往往仅限于托卡耶夫的亲信。

通过对托卡耶夫政府核心决策者的人员组成及其在哈内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尝试性的分析，本文或许能为人们把握哈萨克斯坦的政局及其内外政策的变化提供必要的启示。不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基于公开资料来梳理哈萨克斯坦核心决策层名单，而且，对哈内外政策

决策模式的提炼属于孤例。这些均会导致本文的初步结论仅是尝试性的，难以达到精确、全面和深入的要求。不仅如此，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其核心决策人员都在不断调整中，而真正的决策过程又难以做到真正的透明，因此，本文的研究无疑有待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此外，本文仅仅梳理了一个托卡耶夫政府精英团队的构成名单，未及对这些精英的政治倾向、政策偏好、人际网络等展开更细致的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本文研究的深度。总而言之，如果说本文有助于人们把握托卡耶夫政府核心精英的构成及其在决策中产生的影响，并对人们了解和把握哈萨克斯坦内外政策的变化趋势有所帮助，那么，这里的分析还是有价值的。

最后，我们特别期待学术界能对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五国的决策过程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在“新大博弈”话语盛行的背景下，中亚国家的能动性虽然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和承认，但五国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的、经历了什么样的决策过程等关键问题，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亚研究中的一个“黑箱”。尽快打开这个“黑箱”，是中亚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Abstract**】After the “January Events” of 2022, Kazakhstan’s political scene underwent drastic changes, including the departure of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political elites from the Nazarbayev era, either already having left or preparing to do so. In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reforms, a new power group centered around President Tokayev emerged. So, who are the members of Tokayev’s core decision-making team? What impact does the restructured decision-making body have on Kazakhstan’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Research using the “Presidential website of Kazakhstan” and the “Kazakhstan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databases reveals that the restructured core decision-making body of the Tokayev government is gradually displaying four characteristics, namely, specialization of personnel, concentration of composition, reduction in “Nazarbayev-era” influence, and younger members. Members of the new core decision-making body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shaping Kazakhstan’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 with some having a noticeable impact on political decisions both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An exam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reforms initiated by Tokayev after the January 2022 events, as well as Kazakhstan’s response to Russia’s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the Caspian Pipeline Consortium (CPC) transporting oil in the wake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provides indirect evidence of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okayev’s government’s core decision-making team on major national decisions. Currently, after two major personnel adjustments, Tokayev’s government’s core decision-making body has essentially taken shape, but its impact on Kazakhstan’s future development still requires ongoing observation.

【**Key Words**】Kazakhstan, Tokayev, Core Decision-making Body, Elite Member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Аннотация**】После январских событий 2022 год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цен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изменилась колоссально в кадровом плане, что проявилось в двух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о-первых,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числ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знаменитостей» назарбаевской эпохи уже ушли из политики

или готовятся это сделать; во-вторых, в процессе рефор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появилась новая группа сил, в центре которой оказался Токаев.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кто входит в основной состав член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я 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Токаева? Какое влияние оказывает ре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е централь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я на внутренние и внешние дел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Изучая информацию из баз данных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сайт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агентства «Казинформ», можно заметить, что слой ключевых лиц, принимающих решения в ре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Токаева,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боле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м, более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ым, более де-назарбаевским и более молодым по составу. Члены нового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активно участвуют в процессе выработк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а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оказывают замет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принятие внутри- 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шений. Исследова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реформы, начатые Токаевым после январских событий 2022 года, и реакцию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азахстана на приостановку Россией поставок нефти по Каспийскому трубопроводному консорциуму (КТК) после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можно подтвердить влия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по принятию решений 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Токаева на важнейшие решен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но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осле двух крупных кадровых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й централь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принятию решений в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Токаев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сь, но его влияние на дальнейшее развитие Казакстана ещё требует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наблюд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Казахстан, Токаев, централь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 принятию решений, члены элиты, процесс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责任编辑　崔 珩）

乌克兰危机的多重影响

俄乌冲突以来日本对外战略调整态势

阎德学　邱宇鹏*

【内容提要】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的对外战略也出现了若干新变化。在外交政策方面，日本与西方国家保持“同一步调”，对俄罗斯持强硬立场，进行多次制裁。同时，日本又积极发展与乌克兰的伙伴关系，从财政、人道主义、难民、战后复兴、军用装备等多方面对乌克兰进行援助，并借机展开穿梭外交，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在安全政策方面，日本试图借俄乌冲突推进强军扩武计划，持续挑战专守防卫底线，意图动摇一直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另一方面，日本又渲染东亚紧张局势，宣扬“中国威胁论”，不断加强与西方的安保合作，拓展影响范围，扩大安全空间，试图以此赋予遏制中国的“正当性”。然而，日本对俄制裁必定对双方都产生不利影响，日俄两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博弈仍将持续，日本新的安全政策也将加剧地区安全冲突风险，同时在国内将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和反战声音的限制。

【关键词】俄乌冲突　日本对外战略　日俄关系　日乌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1.3**【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2-0096(22)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岸田政府一改此前安倍政府的对俄友善政策，转而对俄采取强硬立场。在外交政策上主动与美西方国家对标，一方面跟随美西方多次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另一方面与乌克兰发展伙伴关系，从财政、人道主义、难民、战后复兴、军用装备等多方面对乌克兰进行援助。同时，日本政府高层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试图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拉近与世界各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谋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同频共振”。此外，

* 阎德学，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邱宇鹏，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日本还趁俄乌冲突之势修改了代表本国国家安全战略与防卫政策的“安保三文件”，试图推进强军扩武计划，增加对和平宪法解释的弹性，挑战专守防卫底线，甚至开始动摇长期坚守的“无核三原则”。日本对外战略的转变对周边国家和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安全秩序等将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日本政府对俄乌冲突的基本立场

安倍在任期间采取对俄战略接近的对俄友善政策，积极发展与普京总统的个人友谊，推动两国关系发展。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方面要求安倍政府一同跟进制裁俄罗斯，然而安倍政府却表现得颇为敷衍。日本虽然出于盟友身份，追随美欧等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但均被视为较为温和的象征性措施。直到 2022 年 2 月，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美国、欧盟随之宣布对俄实施制裁，日本也紧随其后调整本国对外战略，与美欧等国迅速协调，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对俄制裁措施，与之前安倍的对俄友善路线彻底决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随后在 2022 年 6 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上提到，“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①]，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同时也表明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方面也试图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来表明自己对乌克兰的支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时任日本外相林芳正就分别于 2023 年 3 月和 9 月在危机后首次出访乌克兰，将双边关系升级为“特殊全球伙伴关系”，并开始协调缔结日本-乌克兰信息安全协定。日本新任外相上川阳子随后在 2024 年 1 月也出访乌克兰，宣布向乌提供无人机侦测系统等军事援助。2 月 19 日，日乌经济重建推进会议在东京召开，双方在有关战后重建的七个领域签署了 56 份合作文件，而且日本在日乌联合公报中承诺，将“提供必要的长期援助以确保乌克兰经济稳定。”[②]

① 首相官邸「シャングリラ・ダイアローグ（アジア安全保障会議）における岸田総理基調講演」、2022 年 6 月 10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2/0610speech.html

② 外務省「日・ウクライナ経済復興推進会議」、2024 年 2 月 20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c_see/ua/pageit_000001_00299.html

日本有官方文件显示，岸田政府继承了安倍政府的外交遗产，一直在强调价值观外交，并与七国集团（G7）国家一道公开谴责并制裁俄罗斯。岸田政府认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威胁到国际秩序的根基，当前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在长期努力和大量牺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应该隔岸观火”①。同时也强烈要求，“无论在欧洲还是东亚，任何地方都不能允许凭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多次强烈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侵略，将军队撤回俄罗斯境内”②。

同时，日本也与以 G7 为首的部分国家紧密合作，共同对俄罗斯进行严厉的制裁，并对乌克兰提供强力的支援。此外，为了解决由于俄乌冲突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如粮食和能源价格高涨等全球性问题，为了维持和强化日本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岸田政府也在积极参与包括安理会改革等强化联合国职能的全球治理议题，希望借此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③

二、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

（一）对俄罗斯进行多方面制裁

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日本对俄持续施压，对其实施了多轮制裁，日俄关系呈急转直下之势。2022 年 2 月 21 日，俄罗斯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后，日本立即对上述两个“共和国”采取进出口管制措施，冻结 24 名相关人员的资产，禁止俄罗斯在日本发行债券。紧接着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后，日本外相林芳正立即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米哈伊尔・加卢津（Mikhail Galuzin），传达了对俄罗斯的强烈谴责，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侵略”并将军队撤回本国境内。④

① 外務省「日本記者クラブにおける林外務大臣講演」、2022 年 10 月 4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_pd/prs/page6_000760_00001.html
② 同上。
③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23』、2023 年 4 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23089.pdf
④ 外務省「林外務大臣によるガルージン駐日ロシア連邦大使の召致」、2022 年 2 月 24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9277.html

此后，日本与 G7 其他西方国家进一步加强合作，对俄罗斯采取了多轮次、多方面的制裁措施，姿态强硬。在金融措施方面，日本针对俄罗斯政府相关人员、军队相关人员、国家杜马议员、金融领域相关人员等，实施资产冻结措施或相关金融措施，冻结了包括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在内的 11 家银行及其子公司的资产，限制与俄罗斯央行的交易，防止俄罗斯使用数字资产逃避制裁，同时禁止在俄罗斯进行新的投资和为俄罗斯提供信托、会计审计、管理咨询、建筑、工程等服务，并对俄罗斯石油交易设定价格上限。①

在贸易措施方面，日本取消了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并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和特定木材，同时禁止向俄罗斯出口基于国际协议的管制清单品种、半导体等通用产品、尖端产品、炼油设备、汽车等工业产品以及化武相关用品。在能源领域，日本也采取措施试图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计划分阶段减少或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和石油；在人员往来方面，日本暂停了向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部分俄罗斯人员发放赴日签证。②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针对日本的制裁采取了相对应的反制措施。在日本宣布制裁俄罗斯后，俄罗斯就将日本列为“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之一。③之后，俄罗斯对等驱逐了 8 名日本外交官，并永久取消 63 名日本公民与 384 名日本国会众议员的入境资格，其中就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外相林芳正等政府高级官员以及部分大学教授与媒体从业人员。④俄方还宣布中断与日本就二战后的和平条约问题进行的谈判，并退出与日本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开展联合经济活动的对话。⑤日本此前数届内阁的努力化为乌

① 参见経済産業省「対ロシア等制裁関連」、https://www.meti.go.jp/policy/external_economy/trade_control/01_seido/04_seisai/crimea.html

② 同上。

③ 「ロシア『非友好的な国と地域』のリスト公表 日本も含まれる」、『NHK ニュース』、2022 年 3 月 8 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20308/k10013519491000.html

④ 「ロシア 岸田首相らの入国禁止措置 日本は新たな制裁措置」、『NHK ニュース』、2022 年 5 月 4 日、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lastweek/82043.html；「ロシア、日本の衆院議員 384 人を入国禁止 菅前首相・野党の代表ら」、『朝日新聞』、2022 年 7 月 16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7J0GKYQ7HUHBI03P.html

⑤ “Japan protests Russian halt to World War Two peace treaty talks”, Reuters, March 22,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russia-halts-japan-peace-treaty-talks-over-sanctions-2022-03-21/

有，两国外交接触和沟通的后路被断绝，两国官方乃至非官方交流渠道都受到极大影响。

（二）对乌克兰提供多方面援助

日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之后，从财政、人道主义、难民、战后复兴、军用装备等多方面对乌克兰进行了援助，并且承诺将坚持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持续为其提供支持。

在财政援助方面，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两年时间内，日本对乌克兰援助金额累计已达 121 亿美元。[①]实际上，岸田文雄在 2022 年 2 月 15 日就与泽连斯基通话，称日本方面将向乌克兰提供至少 1 亿美元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贷款。之后日本更是多次增加援助金额，2022 年 4 月 19 日决定从 1 亿美元增加到 3 亿美元，5 月 20 日又决定直接将总额增加到 6 亿美元，为乌克兰提供资金以应对战后重建的经济危机。此外，日本还在 2023 年 1 月 16 日同意了乌克兰延迟偿债（约 7000 万美元）的请求，减轻乌克兰债务负担。2023 年 1 月 23 日，日本政府又通过为乌克兰向世界银行提供信用增级担保以实施 50 亿美元的财政支援贷款。[②]2024 年 1 月 7 日，在日本发生地震的情况下，日本外相上川阳子仍突访乌克兰，在俄乌冲突长期化、欧美各国出现“支援疲劳”的情况下，宣布将通过北约信托基金向乌克兰捐助 3700 万美元以帮助乌克兰建立无人机探测系统。[③]

在人道援助方面，日本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向乌克兰提供了庇护所、食物等援助。2022 年 3 月至 6 月，日本向乌克兰政府提供了 1 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帮助维持人道主义安全通道，并制定了《乌克兰难民救援国际合作实施计划》，通过国际及日本的相关组织为乌克兰和接受乌难民的周边国家提供食物、日常生活与医药用品等。

在难民问题上，日本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同意接收乌克兰避难人

① 鶴岡路人「なぜウクライナ支援が必要なのか」、2024 年 2 月 7 日、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tsuruoka_23.html
② 外務省「ウクライナ情勢に関する対応」、2024 年 4 月 11 日、https://www.kantei.go.jp/jp/headline/img/ukraine/jp_stands_with_ukraine_jpn.pdf
③ 「上川陽子外相ウクライナ訪問、無人機検知へ 54 億円拠出」、『日本経済新聞』、2024 年 1 月 7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57MV0V00C24A1000000/

员入境日本，并设立了乌克兰难民志愿小组为入境的难民提供生活援助。但是，日本难民认定要求较高，难民认定率仅为 1%，截至 2024 年 2 月仅接收了约 2100 人。[①]此外，在战后复兴方面，作为 2023 年七国集团主席国的日本也与西方部分国家合作，承诺共同帮助乌克兰重建在战争中受毁的基建设施，包括住房、交通运输设施、能源供应设施、农工商业相关设施等，以及处理地雷、炸弹等危险爆炸物。[②]

在提供军用装备方面，日本政府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条款中新增“特别条款”后，首次破例为处于战争状态中的乌克兰提供了非杀伤性防卫装备。[③]在农业与能源方面，日本向乌克兰提供种子与肥料，帮助乌克兰恢复农业生产，并且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向乌克兰提供了包括大型变压器、移动电源车以及发电机等在内的总价值超过 4.7 亿美元的能源设备。[④]

日本试图通过上述这一系列对乌援助，向国际社会传达其“坚定不移支持实现持久和平”的立场，巩固自身“法律支配”的国际秩序主导者的地位，彰显其一直以来所强调的基本民主价值观，以及“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自由民主国家”的姿态，提升自身国际影响力。

（三）加强与美国、国际组织合作，积极开展穿梭外交

日本在深化日美同盟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 G7 及北约等西方组织的合作机制。G7 在 2022 年举行了 6 次首脑会议和 11 次外长会议，此前并未有过如此频繁的会晤。[⑤]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当天，日本参与 G7 国家视频会议，共同以 G7 的名义发布首脑联合声

① 「軍事侵攻 2 年 ウクライナから日本への避難者 多くが就職に悩み」、『NHK ニュース』、2024 年 2 月 23 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40223/k10014368571000.html

② 公明党ニュース「ウクライナの復旧・復興、日本が後押し」、2024 年 3 月 6 日、https://www.komei.or.jp/komeinews/p339822/

③ 基于《自卫队法》第 116 条第 3 款，“对于遭受有违国际法之侵略的乌克兰”，日本防卫大臣同意提供包括提供非杀伤性军事装备的出口在内的军事装备的出口。

④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ウクライナ、日本から新たに発電機とソイルアーマー受領」、2024 年 3 月 29 日、https://www.jetro.go.jp/biznews/2024/03/748154d0df5fbd12.html

⑤ 外務省「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侵略と日本の対応」、2023 年 6 月 30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3/pdf/pdfs/1_3.pdf

明，指出俄乌冲突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严重威胁，造成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欧洲范围；认为以武力改变国际公认的边界是不合理的，并且谴责了俄罗斯的行为。[①]在之后的多次会议上，日本始终与七国集团其他各国保持一致立场，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紧密沟通，紧随美国和欧洲国家多次加码制裁俄罗斯，并向乌克兰提供多轮次、多方面的援助，声称要“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岸田文雄继承了安倍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强调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身份认同，呼吁阵营内部的进一步团结。他在 G7 的视频会议上强烈谴责俄罗斯袭击乌克兰各地，并称：“乌克兰东部地区举行的所谓‘公投’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吞并’永远不会得到承认。”[②]此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岸田文雄连续两年出席北约峰会，提出“欧洲与印度太平洋的安全保障密不可分，”要“为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坚定不移地展开合作。”[③]

日本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还展开了频繁的穿梭外交，积极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同频共振”。首先，日本竭力团结所谓价值观相近的欧美中小国家，与这些国家举行不同级别的会谈、协调行动或发表声明，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比利时、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挪威、瑞士等国。其次，日本尝试拉拢部分战时中立国家共同制裁俄罗斯，或是至少确保这些国家不会在立场上偏向俄罗斯。这些国家包括亚洲的东盟国家、部分非洲国家如南非、乌干达、埃塞俄比亚、部分中南美洲国家如墨西哥、厄瓜多尔、巴西、阿根廷等国。同时，日本还强化与中东产油国的合作，如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岸田文雄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就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谈时提出，希望印度能与美西方保持“同一步调”，要求印度谴责俄罗斯、对俄制裁以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试图拉拢印度以分化印俄关系。然而，印度并没有同意日本的要求，

① 外務省「G7 首脳テレビ会議」、2022 年 2 月 25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cm/ec/page6_000665.html
② 外務省「G7 首脳テレビ会議」、2022 年 10 月 1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cm/ec/page6_000762.html
③ 外務省「岸田総理大臣の NATO 首脳会合出席（結果）」、2023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7_000044.html

在日印首脑联合声明中，仅强调应立刻停止战争，采取措施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必须通过对话和外交解决问题，并没有加入任何批评俄罗斯的内容。[①]

三、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对外安全政策的变化

（一）利用俄乌冲突，推动防卫战略调整

俄乌冲突的爆发成为日本安全战略转型的一大契机。首先，日本在危机爆发后借机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实施方针。日本此前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实施方针指出，“杀伤性军事装备仅限出口至参与联合研发与生产的国家，非杀伤性军事装备仅限出口搜救、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 5 种类型”[②]。然而，日本在 2022 年 3 月 8 日将其修改为“可以向遭受违反国际法侵略的乌克兰提供非杀伤性装备品，”[③]意味着日本放宽出口条件，允许向乌克兰输送防弹背心和其他物资。2022 年 12 月 16 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修改后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即“安保三文件”）。新通过的“安保三文件”被评价为战后日本安保防卫政策的巨大转变。[④]

2023 年 1 月，岸田文雄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声称：“此次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将在 5 年内彻底强化日本的防卫力量，国防预算将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并且决定导入长射程的‘反击能力’等，将成为日本战后防卫政策史无前例的分水岭。”[⑤]从 2024 年日本政府的预算案来看，2024 年防卫预算已提升至 7.9496 万亿日元（约合 525.9 亿美元），较 2023 财年增加了 16.5%，创历史新高。日本将重点用于发展防区外防御能力、综合导

① 外務省「日印首脳共同声明：『平和で安定し、繁栄した新型コロナ後の世界のためのパートナーシップ』」、2022 年 3 月 1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page6_000669.html

② 内閣官房「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について」、https://www.cas.go.jp/jp/gaiyou/jimu/bouei.html

③ 同上。

④ 中西寛「『時代の転換期』と日本の安全保障政策」、『国際問題』No.715、2023 年 10 月、6-18 頁。

⑤ 首相官邸「第二百十一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3 年 1 月 23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3/0123shiseihoshin.html

弹防御能力、无人装备防御能力、针对太空和网络的跨领域作战能力等体系化防卫能力。[①]日本新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中虽然没有明确表达，却能从中看出日本未来安保政策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希望加强与美国以外的欧洲及印太地区国家的安全保障合作；另一方面，着眼于建立日本独立的安全防卫体制，使自卫队拥有反击和持续作战的能力。

此外，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实施方针以进一步扩大防卫装备品出口，也被明确列为“安保三文件”的目标。2023 年 3 月，岸田文雄在参议院接受质询时再次提出，将进一步推动修改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以“维护印太和平安定、创造日本理想的安保环境。”[②]2023 年 4 月，联合执政的自民党与公明党成立了修改三原则与其实施方针的工作小组，就“向纷争当事国乌克兰提供扫雷、通信装备和防空导弹”、“弱化约束他国将共同研发的武器装备出口至第三国”、“扩大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对象范围”等进行讨论。[③]2023 年 12 月 22 日，日本政府正式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进行了修改，允许日本将其生产并组装的成品武器出口到给予日本“生产许可”的授权国，[④]标志着日本武器出口政策的重大转变。岸田政府不断渲染俄乌冲突，实则是在为自身摆脱战后体制、放宽武器出口政策、谋求军事松绑寻找借口。岸田政府借俄乌冲突提升日本军事能力并扩大武器出口，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将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不安定因素。

（二）拥核问题在日本国内引发讨论，长期来看日本“拥核”风险增加

考虑到历史原因与现有法律的约束，在日本，“拥核”一直都是非常敏感又备受争议的话题。然而，在俄乌冲突这一背景之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 2022 年 2 月 27 日在电视节目当中声称，在安全形势恶化的当下，对于“拥核”问题的讨论不应该再有禁忌，日本应当就日美“核共享”问题进行

① 防衛省「防衛力抜本的強化の進捗と予算」、2023 年 12 月 22 日、https://www.mod.go.jp/j/budget/yosan_gaiyo/2024/yosan_20231222_summary.pdf
② 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第 211 回 国会 参議院 予算委員会 第 2 号 令和 5 年 3 月 1 日」、https://kokkai.ndl.go.jp/txt/121115261X00220230301
③ 「自民・公明 防衛装備品の海外移転 運用指針など見直し議論へ」、『NHK ニュース』、2023 年 4 月 25 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0425/k10014049231000.html
④ 防衛省「『防衛装備移転三原則』等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2023 年 12 月 22 日、https://www.mod.go.jp/j/press/news/2023/12/22f.html

讨论。[①]时任日本自民党政务调查会会长的高市早苗也在随后公开表示，当下“不引入核武器”原则在紧急情况下应当允许“例外”，[②]即希望实现类似于北约机制的日美“核共享”。

此后，日本自民党内部也开始重新讨论核威慑的有效性，其主要观点是：尽管日本是核爆受害国，废除核武器仍然是日本应继续坚持的目标，但更应当先考虑现实问题。按照他们的思维模式，如何应对复杂的周边局势，解决针对日本的核威慑问题，相较于遥远的无核化理想更加重要；甚至有更激进的声音提出，应放弃“不引进核武器”原则，另外，“不拥有”与“不制造”两条原则也应被置于美国向日本提供核保护的前提条件之下。[③]

然而，在核共享问题上，岸田政府仍然相对保守。岸田文雄曾表示，“无论是从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来看，还是从遵守如《原子能基本法》等国内法的立场来看，都不会在政府内部讨论‘核共享’的议题”，并且“无法允许在本国领土部署美国核武器并共同运用。”[④]随后，在参议院选举期间有人问及日本是否应当拥有核潜艇时，岸田文雄也认为目前并不合适。[⑤]总体来说，至少从目前来看，虽然部分右翼保守派试图动摇日本核政策的基本立场，但岸田政府总体上对拥核问题持谨慎态度。

但是从长期来看，日本仍然存在“拥核”的风险。日本本身就是“核门槛”国家，拥有强大的核技术能力。2018 年相关报告显示，日本拥有超过 47 吨的钚材料储备，远远超过核电站的需求量，而这一数量足以支持制造 6000 多枚核弹。[⑥]此外，日本在 2022 年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

① 「『核共有』安倍元首相“現実直視し日本も議論進める必要ある”」、『NHK ニュース』、2022 年 3 月 3 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20303/k10013511741000.html

② 「首相、核共有『政府で議論する考えない』」、『日本経済新聞』、2022 年 3 月 2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22AI0S2A300C2000000/

③ 「維新・馬場氏『非核二原則も』持ち込ませず削除論」、『産経新聞』、2022 年 5 月 3 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503-CHWC5TJBSNND3HGMXQ3S4FU6QU/

④ 「『核共有』議論、岸田首相は否定的前向きの維新も賛否問われると…」、『朝日新聞』、2022 年 3 月 2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326QNLQ32UTFK010.html

⑤ 「岸田首相、原子力潜水艦の保有に慎重『コスト莫大』」、『日本経済新聞』、2022 年 6 月 19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90FM0Z10C22A6000000/

⑥ 久保木太一「プルトニウム削減に向けた実現可能性のある選択肢を－日本のプルトニウム政策の変遷」、『ND Policy Brief』、第 3 巻、2018 年 11 月。

次审议大会上，就在提交的报告中删除了过去长期提及的“无核三原则”[①]，并且大会最后也没有就实质性成果达成共识，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已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每日新闻》的民调显示，57%的日本民众认为“核共享”是应该被讨论的问题，表明日本国内的反核情绪已经有所衰退。[②]在右翼的不断鼓动之下，日本社会可能会渐渐抛弃核禁忌传统，将拥有核武器视为“正常”国家的安全需要，最终顺理成章发展核武器。此前美国与北约国家“核共享”并部署核武器遭到许多国家谴责，而美日“核共享”如果成真，可能直接导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崩溃，并引发全球核军备竞赛。

（三）借俄乌冲突渲染“中国威胁”，赋予遏制中国的“正当性”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官方就多次借机渲染东亚紧张局势，宣扬“中国威胁论”。2022 年 2 月 24 日，岸田文雄在 G7 首脑会议上表示：“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行为应采取适当的应对举措，以免给他国留下错误的示范效应”[③]。这里的“他国”显然暗指中国，试图借俄乌冲突重新炒作“中国威胁”。之后，岸田文雄又在国会施政演说时说：“基于乌克兰也许就是明天的东亚的强烈危机感，我反复强调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允许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在东海、南海等我国周边安全形势骤然严峻的情况下，为了断然维护我国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强化遏制力和应对能力是最优先的使命。”[④]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也在 2022 年 3 月的记者会上渲染“中国威胁”，指责中国国防预算的增加，并声称：“绝不容许乌克兰事件在东亚发生，……日本必须采取毅然行动，从根本上维护国际秩序。”[⑤]日本高官在公开发言

① 「外交部『日本は「非核三原则」を遵守すべき』」、『人民網日本語版』、2022 年 8 月 9 日、http://j.people.com.cn/n3/2022/0809/c94474-10133211.html

② 社会調査研究センター「3 月 19 日実施全国世論調査の分析と結果」、2022 年 3 月 22 日、https://ssrc.jp/blog_articles/20220319.html

③ 「首相『断じて許容できない』、ビザ発給停止・半導体の輸出規制、対ロシア追加制裁」、『読売新聞』、2022 年 2 月 25 日、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20225-OYT1T50061/

④ 首相官邸「第二百十一回国会における岸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23 年 1 月 23 日、https://www.kantei.go.jp/jp/101_kishida/statement/2023/0123shiseihoshin.html

⑤ 「ウクライナ侵攻『東アジアで許してはならない』官房長官、台湾 念頭に」、『朝日新聞』、2022 年 3 月 7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3765HXQ37UTFK00V.html

中，不断地渲染国际局势的紧张程度以及日本的周边安全问题，将矛盾点引向东亚邻国，实际上就是为了煽动日本国民的危机感，创造有利于达成自己企图的舆论环境，为改变日本安全战略赋予正当性，并在事实上对中国进行遏制。

日本官方文件中也多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加速日本安全战略转型，谋求遏制中国。日本 2023 年的《外交蓝皮书》和《防卫白皮书》都将中国定性为“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国家，并将中国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定义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①]在新修改的“安保三文件”中，将对华定位从“担忧”提升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②]对华负面性认知不断强化。文件中还重点提到要发展“反击能力”，即只要日本判断即将遭受攻击，就可以在敌方发动进攻前先行发动攻击。此举明显会影响周边地区安全局势。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神保谦对新版本的“安保三文件”的界定是基于拒止战略的竞争战略。[③]他认为，目前日本防卫战略的核心构想是在目前对华劣势的战略环境中，以不断重复实施中短期的拒止战略（如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强化太空、电子、网络等跨领域作战能力、强化与盟国安全保障合作等），实现作为长期目标的对华竞争战略。在以拒止战略对抗中国的过程中，削弱中国的安全竞争优势，并迫使中国花费资源加强在安全对抗中较为劣势领域的投资，使得日本能够在短期甚至是中长期的安全竞争中取得优势，最后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从近期日本外务省智库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JIIA）发布的相关报告及文献中也可以看到，日本学界将中俄接近以及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绑定在一起，重提“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论调，并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对日本的战略威胁，中国已成为日本安全战略中的重要

① 参见外務省『外交青書 2023』、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3/pdf/index.html；防衛省『令和 5 年版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3/pdf/R05zenpen.pdf

② 防衛省「国家防衛戦略について」、2013 年 12 月 17 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nss-j.pdf；防衛省「国家防衛戦略について」、2022 年 12 月 16 日、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③ 神保謙「日本の安全保障戦略の新しい展開」、『国際問題』No.715、2023 年 10 月、6-18 頁。

元素。[①]

（四）日本与西方国家安保合作加强

日本积极开展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活动。俄乌冲突爆发后，G7 的首脑会议、议长会议、外长会议、财长会议、能源部长会议以及日本与欧盟、日本与北约、“日美澳印”四国联盟首脑会议等多边会议相继召开，日本还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开展一系列密集的双边首脑或外长会谈，协调各国相关政策以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挑战，增强了日本与欧洲各国的合作关系。

鉴于日本岸田政府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日本与欧洲各国的政治、安保合作显著增强，欧洲各国政府对岸田政府以及日本各界在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方面的行为给予高度肯定。2022 年 4 月，日本外相林芳正首次参加北约外长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是分别于 2022 年 6 月和 2023 年 7 月连续两年参加北约首脑峰会。岸田在峰会上就曾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北约的伙伴关系，认为“欧洲的安全与亚洲安全紧密相连，”期待北约在亚太事务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②]随后，2023 年 7 月，日本即与北约正式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ITPP），以提升双方军事力量间的协同与相互适应，增加联合演习频次、强化情报信息交流与合作等。同时，日本以“民主”、“法治”等西方价值观为外交武器，大力谴责俄罗斯的战争行为，积极支持欧洲各国对俄制裁，强化价值观理念对日欧合作的促进作用，使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国际现状”的共识增强、范围扩大，欧洲各国对日本倡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更加支持。

日美安保合作迈上新台阶。俄乌冲突提高了日美联盟的紧密性，两国联盟合作的威慑能力、应对能力增强。日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紧密合作，两国首脑会谈、外长会谈、财长会谈等双边协调紧密开展。根据日本官方统计

① 参见林成蔚・加藤洋一「台湾有事論と日本の安全保障戦略」、『国際問題』No.715、2023 年 10 月、50−62 頁；益尾知佐子「中国の国内統治と安全保障戦略」、『国際問題』No.715、2023 年 10 月、40−49 頁；小原凡司「インド太平洋の安全保障」、https://www.jiia.or.jp/pdf/research/R04_Korean_Peninsula/JIIA_Korean_Peninsula_research_report_2023.pdf；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危機の時代の同盟：ロシアによるウクライナ侵略後の日米世論』、https://www.jiia.or.jp/research/2023/03/23/US-JapanReport2023.pdf

② 外務省「岸田総理大臣の NATO 首脳会合出席（結果）」、2022 年 6 月 2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4_005633.html

数据，2022 年日美联合训练次数为 108 次，相较于 2021 年的 86 次有大幅度增加，[①]其中包括海军和空军的实战演练、电子战、弹道导弹信息共享等多类型的军事演练。2023 年度的日本自卫队联合演习的规模也创下历史之最，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出动的士兵人数以及作战工具的规模几乎为 2021 年度联合实兵演习的两倍。[②]可以看出日本试图在战略、战役和战术层面提高自卫队与美军互动的频率和深度，进一步提升日美军事协调。在 2023 年 1 月召开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2+2）会议上以及随后的日美首脑会谈上，双方就“建立一个更有能力、一体化和灵活的联盟”，并加强威慑力，应对不断变化的区域和全球安全挑战，将同盟关系提升到新阶段，达成了一致。另有消息称，《美日安保条约》将大规模升级，美国政府决定加强驻日美军司令部（东京横田基地）的功能，赋予其在日美联合演习和训练计划拟定、同日本自卫队“统合作战司令部”协调，以及情报共享等方面的权限。[③]美日将在 2024 年底设立一个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的常设组织（名为“统合作战司令部”），以推进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在 2024 年 5 月召开的“日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2+2）会议中，双方将商定细节。[④]以俄乌冲突为契机，日本不断拓展与美国在诸多军事领域的联动，双方的军事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四、日本对外战略的前景展望

（一）制裁导致日俄两国互相伤害

尽管俄罗斯的情势不仅仅受到日本一国的影响，但作为实施重要制裁的国家之一，日本对俄罗斯的影响不可小觑。日本前外相林芳正指出，对俄罗

① 参见防衛省『令和 5 年度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3/pdf/index.html；防衛省『令和 4 年度防衛白書』、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2/pdf/index.html

② 統合幕僚監部「令和 5 年度自衛隊統合演習（実動演習）について」、2023 年 10 月 27 日、https://www.mod.go.jp/js/pdf/2023/p20231027_01.pdf

③ 「在日米軍、司令部機能を強化へ…『統合作戦司令部』創設の自衛隊と連携促進」、『読売新聞』、2024 年 3 月 25 日、https://www.yomiuri.co.jp/world/20240324-OYT1T50113/

④ 「日米防衛相、5 月初旬に会談へ木原氏、ハワイ訪問で調整」、『東京新聞』、2024 年 4 月 17 日、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321877

斯的制裁已经取得显著成效。[①]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也指出，日本的对俄制裁措施涉及俄罗斯国防部、情报机构以及国家武器出口企业等部门，对俄罗斯的核心战斗能力造成重大冲击。[②]

制裁措施冲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中央银行将近一半的外汇储备（约为 3000 亿美元）被冻结至今。[③]同时，由于被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之外等原因，卢布兑美元的汇率持续下跌，在 2023 年已贬值超过 40%，甚至在 2023 年 10 月一度突破了 100 比 1 美元大关，为 2022 年 4 月以来最低点。[④]日本政府也在冲突爆发后禁止日本企业对俄进行新的投资。而且，截至 2024 年 2 月，因为制裁，在俄罗斯活动的 168 家日本企业中有 80 家（占 47.6%）已退出或暂停与俄罗斯市场相关的业务。[⑤]这些企业的经营范围涵盖日用品、资源、建筑机械、餐饮、汽车、金融和 IT 等多个领域，对俄罗斯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日俄之间的经贸往来也随着制裁升级出现急剧下滑，2022 年两国间贸易总额仍能保持与前几年相近的水平，[⑥]而到了 2023 年，情况急转直下，日本对俄出口额比 2022 年下降了 34.5%，日本自俄罗斯的进口额也下降了 47.4%。[⑦]整体来看，双方经贸往来十分低迷，并且随着时间推移仍在进一步下降。[⑧]另

① 「林外相『ロシアへさらなる制裁強化 抜け道防止を』NHK 日曜討論」、『NHK ニュース』、2022 年 3 月 27 日、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20327/k10013554101000.html

② 「米大使『ロシア戦力の中枢に打撃』日本の追加制裁」、『産経新聞』、2022 年 3 月 19 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319-AEDUTINSH5KDJP4IXETX67KP2Q/

③ “The West won’t seize Russia’s reserves any time soon. Here’s what it can do with the funds instead”, September 21, 2023,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e-west-wont-seize-russias-reserves-any-time-soon/

④ “Russian ruble buckles under trade sanctions, declining export earnings”, October 10, 2023, https://www.dallasfed.org/research/economics/2023/1010

⑤ 帝国データバンク「日本企業の『ロシア進出』状況調査（2024 年 2 月）」、2024 年 2 月 22 日、https://www.tdb.co.jp/report/watching/press/p240208.html

⑥ 参见财务省「財務省貿易統計 報道発表資料 2022 年（年分）」、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2022/2022_117.pdf

⑦ 财务省「財務省貿易統計 報道発表資料 2023 年（年分）」、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2023/2023_118.pdf

⑧ 参见财务省「財務省貿易統計 報道発表資料 2024 年 1 月」、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2024/2024016.pdf；财务省「財務省貿易統計 報道発表資料 2024 年 2 月」、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2024/2024025.pdf

外，俄罗斯的整体经济状态也仍然处于低谷。俄罗斯 GDP 在 2023 年 4 月至 6 月间转为正增长，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向军工产业投入大量资金，创造了特定需求，对 GDP 的增长做出了贡献。[①]尽管军需品的增产和个人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为刺激经济而投入大量资金导致俄罗斯财政状况越发窘迫。由于国家为减轻公民通胀压力提供支持，俄罗斯财政预算从 2021 年仍能盈余到 2022 年开始转变为赤字，赤字规模占 GDP 的 2.2%，2023 年赤字规模占 GDP 的 1.9%，预计在 2027 年之前将持续处于赤字状态，直到 2028 年才有望再次实现盈余。[②]

从日本方面来看，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对俄罗斯的制裁日本自身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譬如，日本国内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供应受到直接冲击，油气价格急剧上升，电力供应出现紧张，石油储备急剧减少，不得不多次动用民间储备石油，甚至释放国家储备石油以抑制油价上涨。[③]2022 年 5 月 31 日，东京交易所的交易价上涨到每千升 83600 日元（约合 553 美元），创下了自 2008 年 8 月以来的最高交易价。同时，日元汇率也急剧下跌，进一步增加了日本企业的运营成本。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到了 2023 年 7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对多个与俄罗斯能源项目有关的制裁项目进行豁免，这些项目包括与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勘探、开采、存储、运输以及转运相关的建筑和工程服务，以及附带的运营，包括“萨哈林 1 号”项目、“萨哈林 2 号”项目和“北极 2 号”液化天然气项目，这一措施旨在减轻能源方面的影响。然而，由于日本取消了对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等措施，原油、原材料和食品价格上涨，导致部分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农林渔业和运输业的经营成本以及一般国民的生活成本明显上升。日本全国电价、燃气价格已经连续多月持续上涨，2023 年 6 月，电

① “Russian GDP increases 4.9% in Q2 after 1.8% drop in Q1 – Rosstat”, August 12, 2023, https://interfax.com/newsroom/top-stories/93499/

② “Russia: Budget balance from 2018 to 2028 in relation to gross domestic product”,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1356/budget-balance-in-russia-in-relation-to-gross-domestic-product-gdp/

③ 「石油備蓄の放出開始 1 カ月間、IEA 決定で」、『産経新聞』、2022 年 3 月 10 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310-TYEZM4B5WRJRJGX253ENNS425Y/；「国家備蓄石油 76 万キロリットル放出経産省、入札公告開始」、『産経新聞』、2022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422-76DYV44UXRONRBRG7HDUVOG4IQ/

费涨幅甚至达到 42%。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对电费和燃气费进行补贴，但依然难以完全抵消上涨带来的影响。

日俄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冲击。2012 年年底，安倍晋三再次上任执政时，曾提出了对俄外交“新思路”，试图“以经促政”，希望解决与俄罗斯之间的领土争端，并缔结和平条约。日俄之间逐渐开展了定期首脑会谈以及建立了外交、安全 2+2 会谈机制，还开展了一系列经济合作活动，两国关系急速升温。然而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安倍晋三的下台，日本开始表现出鲜明的“挺乌反俄”立场，两国关系降到冰点。日本将俄罗斯定义为“安全保障上的强烈关切”，而俄罗斯也将日本列为“不友好国家”，互相制裁对双方都影响巨大，两国正常的经贸关系受到严重冲击，战略互信大大降低，解决两国间领土争端也希望渺茫。岸田文雄抛弃了安倍晋三留下的外交遗产，采取对俄极限施压策略，试图迫使俄罗斯做出让步、缓和局势，然而双方关系反而不断恶化。除非两国都能够在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否则短期来看日俄关系难以改善。

（二）日本对外政策对现行国际体系和结构的影响

日本目前施行的对外政策恐将助推国际秩序走向“新冷战”。俄乌冲突已经成为日俄关系的转折点，并且受到日美同盟等因素的影响，短期来看日俄关系难以改善。危机发生后，日俄两国原本的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已经暂停，“北方四岛”问题陷入僵局，日俄渔业协定谈判也停滞不前。在应对俄乌冲突方面，日本与美西方国家并没有起到促和劝谈的作用，而是采取积极的对俄制裁政策，目的是将俄罗斯降为地区大国。日本选择响应美国的对俄制裁要求，不断扩大制裁的范围和强度，甚至使用金融“武器”把俄罗斯排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日本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积极对众多亚非拉地区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外交活动，试图拉拢他们加入西方阵营对俄进行制裁，至少确保他们不会在立场上偏向俄方。基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划线，日本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推动阵营对抗，无疑将国际秩序推向“新冷战”，对国际秩序的稳定产生较为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日本更新的安全政策将加剧地区安全冲突风险。首先，日本将日美同盟作为外交与安全战略的核心。日本新发布的《国家安全

保障战略》中提道，“在大力强化日本防卫力的同时，与美国深化安全合作，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以及“切实深化日美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对于维持和加强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至关重要。”[①]日本已经通过构建美日联合指挥机构、统一战术概念和武器系统等方式，加速推进两国的军事捆绑。配合美国在所谓的“印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与战略优势，已经成为日本新安全政策的目标之一。

此外，日本还试图引入欧洲和北约等外部军事力量介入亚太。岸田文雄出席 2023 年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显示出配合北约干涉亚太地区事务的倾向。日本与北约不仅统一步调发布了新的安全合作四年计划、深化日本与北约之间的防务合作，还讨论了在东京开设其在亚洲的首个联络处等问题，试图将日本建设成北约在亚太协调政策、共享情报的沟通枢纽，进一步推动“亚洲北约化”。[②]

（三）日本对外战略的制约因素

日本在追随西方对俄罗斯制裁方面存在一定限度。从能力上看，日本在经贸、金融、科技等领域确实有相对优势，但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对俄制裁只能与美欧等大国进行联合行动，因此首先是受美欧等国影响较大。

如上文所述，制裁俄罗斯给日本国内经济带来重要挑战，日本国内物价、油价、粮食价格显著上升并呈持续扩散之势。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日本 2023 年平均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不含生鲜食品）比 2022 年上涨 3.1%。这是 41 年来的最高增长率，与 1982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影响下的 3.1%的增幅相当。除生鲜食品外，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普遍上涨。不包括新鲜农产品的食品价格上涨 8.2%，为 1975 年的 13.9%以来的最大涨幅。[③]居民生活成本显著上升，导致岸田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国内饱受争议。根据 2024 年 3

① 防衛省「国家安全保障戦略（概要）」、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_outline.pdf
② 参见外務省「岸田総理大臣の NATO 首脳会合出席（結果）」、2023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erp/ep/page7_000044.html
③ 総務省統計局「2020 年基準消費者物価指数全国 2023 年（令和 5 年）平均（2024 年 1 月 19 日公表）」，2024 年 1 月 19 日，https://www.stat.go.jp/data/cpi/sokuhou/nen/index-z.html

月的最新民调，岸田政府的支持率仅为 20.1%，创下其执政以来的新低。其中，有 61.1%的人认为当前日本经济没有明显改善。[①]岸田政府若不尽快出台有效经济对策，未来执政将举步维艰。

在日本国内经济方面，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61%的日本企业认为俄乌冲突对企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运输仓储业认为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比例达 76.9%，制造业达 62.3%，服务业也达到 54%。[②]日俄经贸合作长期低迷也降低了日本对俄制裁的效果，日俄间年贸易额自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基本在 2 万亿日元（约合 129 亿美元）上下徘徊，最高时（2022 年）约为 25730 亿日元（约合 166.4 亿美元），[③]最低时（2023 年）仅有 14324 亿日元（约合 92.8 亿美元）。[④]俄罗斯在日本的贸易伙伴排名中也一直在 15 至 20 名之间。[⑤]日俄两国或将在“制裁”与“反制裁”间不断调整政策，为实现自己国家的既定目标而努力。当前，日俄在俄乌冲突上的博弈仍将持续。

日本激进扩军的安全战略转型也受到多方面限制。日本国内仍然存在部分反战声音。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民调显示，有 36%的民众反对在未来 5 年内大幅增加防卫预算，31%的民众反对拥有打击对方基地的“反击能力”。[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以及《东京新闻》等媒体也对新的“安保三文件”激进扩军的路线提出质疑，[⑦]而且扩军还受到日本国内财政状况

① 「内閣支持率 20.1%で過去最低を更新 共同通信世論調査」、『日本経済新聞』、2024 年 3 月 10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1020Z0Q4A310C2000000/
② 「『ウクライナ悪影響』関西企業、全国より多く」、『産経新聞』、2022 年 3 月 9 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309-4V2GKQBOORJMDACS7MMQNH5YUA/
③ 财务省「财务省貿易統計 報道発表資料 2022 年（年分）」、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2022/2022_117.pdf
④ 财务省「财务省貿易統計 報道発表資料 2023 年（年分）」、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2023/2023_118.pdf
⑤ 详见财务省「财务省貿易統計 報道発表資料」、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happyou.htm
⑥ 「岸田内閣支持 36% 防衛費増 賛成 51%」、『NHK ニュース』、2022 年 12 月 13 日、https://www.nhk.or.jp/kaisetsu-blog/700/477346.html
⑦ 「（社説）平和憲法と安保 3 文書 民主主義の形骸化許されぬ」、『朝日新聞』、2023 年 5 月 3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5627121.html；「＜社説＞安保 3 文書を決定 平和国家と言えるのか」、『東京新聞』、2022 年 12 月 17 日、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220477；「安保戦略の閣議決定 国民的議論なき大転換だ」、『毎日新聞』、2022 年 12 月 17 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21217/ddm/005/070/129000c

的制约。日本深受俄乌冲突影响，最近一年多以来，每个月的通胀数据都超过央行 2%的目标，经济不确定性仍非常高。而岸田政府却仍在讨论增加防卫预算，并且希望通过增加税收填补资金缺口，引致不少民众与企业的不满。日本广播协会（NHK）的民调显示，高达 64%的日本民众反对增税。即使是执政联盟内部同意增加防卫预算的人（赞成人数约占 43%）中，也有 40%的人也反对增税。[①]日本的强军扩武之路仍然受到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制约。

五、结　语

俄乌冲突的爆发及其后续发展，为日本对外战略提供了重大调整的契机，日本政府借机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主动转向。这一系列调整，既是日本对国际形势快速演变的响应，也是其试图在地缘政治格局重塑过程中强化自身角色与利益的体现。一方面，日本以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等方式彰显自身“国际秩序捍卫者”的姿态，推行其价值观外交以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并强化与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日本又通过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加速安全政策转型，深化与美国军事绑定，寻找遏制中国的理由，意图在亚太地区构建更有利于自身的安全体系。然而，这些调整并非一帆风顺，国内经济压力、民众反战情绪以及与邻国关系的复杂性，均对日本对外战略的调整构成了制约。日本如何在国内外诸多因素的交织中寻求战略平衡，既有效维护其国家利益，又能避免过度激化地区矛盾，将是其对外战略调整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俄乌冲突的演变以及国际格局的持续动荡，日本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仍需密切关注。

①「防衛費増額は賛否割れる 防衛増税に“反対”64%」、『NHK ニュース』、2023 年 2 月 13 日、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lastweek/95766.html

【**Abstract**】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Japan's foreign strategy has seen several new changes. In terms of foreign policy, Japan has align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 in maintaining a tough stance against Russia, implementing multiple sanctions. At the same time, Japan has actively developed its partnership with Ukraine, providing assistance in various areas including finance, humanitarian aid, refugee support, post-war reconstruction, and military equipment. Japan has also engaged in shuttle diplomacy to increas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terms of security policy, Japan has attempted to use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o advance its military expansion plans, continuously challenging the baseline of its exclusively defensive posture and intending to undermine the long-held "Three Non-Nuclear Principles". On the other hand, Japan has exaggerated tensions in East Asia, promoting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the West, expanding its influence, and enlarging its security space, attempting to justify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 However, Japan's sanctions against Russia will inevitably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both parties, and the strategic games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on the issue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ill continue. Japan's new security policy will also increase the risk of regional security conflicts, but it will be constrained by domestic budgetary limits and anti-war sentiments.

【**Key Words**】Russia-Ukraine Conflict, Japan's Foreign Strategy, Japan-Russia Relations, Japan-Ukraine Relations

【**Аннотация**】С момента нач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нешняя стратегия Японии также претерпела ряд нов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Япония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те же темпы», что и западные страны, занимая жёсткую позицию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оссии и вводя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е санкци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Япония активно развивает партнёрство с Украиной, оказывая помощь Украине во многих аспектах, таких как финансы, 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помощь, беженцы, послево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военная техника, а также пользуе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проводить челночную дипломатию для увеличения свое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влияния.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Япония пытает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для продвижения своего плана военной экспансии, продолжает бросать вызов основной линии обороны и намерена поколебать «три неядерных принципа», которых она всегда придерживалась.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Япония преувеличивает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ь в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продвигает «теорию китайской угрозы», постоянно укрепляе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 Западом, расширяет сферу своего влияния и расширяет своё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ытаясь придать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сдержать Китай. Однако санкции Японии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окажут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обе стороны. Игра между Японией и Россией по поводу конфликт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Н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Японии также усилит риск конфликтов в област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о внутри страны это будет зависеть от финансовых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и антивоенных голосов.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внешняя стратегия Японии, отношения Японии и России, отношения Японии и Украины

（责任编辑　崔　珩）

“全球南方”视野下的俄非“特殊关系模式”分析*

郭　锐　赵俊杰**

【内容提要】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洲国家随即成为俄罗斯对外战略转型关注的重点。2019 年首届俄非峰会后，俄非政治领域合作机制化加深，外交领域相互策应加强，贸易及投资增长缓慢但贸易结构渐趋优化，安全领域合作持续拓展。俄非关系持续升温且深入发展，受到俄罗斯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规避外部制裁和推动对外战略转型的内因以及大国竞争加剧导致国际秩序重组等外因的双重影响。虽然当前俄非关系发展受制于“全球南方”自身固有的缺陷、俄罗斯本身实力不济以及大国在非洲的激烈竞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内难有突破性成果，但从长远来看，伴随“全球南方”不断突破自身发展瓶颈、俄罗斯坚持“东进南下”的对外方针以及其新建“非洲军团”持续加强在非军事投入，将为俄非“特殊关系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新基础、提供新保障。

【关键词】“全球南方”　俄罗斯战略调整　“东进南下”　俄非关系　俄非“特殊关系模式”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2-0118(28)

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在俄罗斯对外战略转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双方在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新殖民主义以及构建多极化国际秩序等方面存在诸多共同利益。2023 年 3 月发布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东北亚国际与地区重大问题跟踪及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22JJD810035）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郭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吉林大学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赵俊杰，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构想》中明确提出，将优先发展同“全球南方”的关系作为俄罗斯对外战略转型的重点内容，非洲国家作为“全球南方”大本营的重要地位受到高度重视。俄罗斯通过召开两届俄非峰会，旨在同非洲国家建立“完全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共同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①]非洲大陆成为复杂形势下俄罗斯构建国际关系合作网络的延伸区，[②]俄罗斯期望通过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宣扬其地缘政治主张，并减轻美国和西方国家长期制裁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某种意义上，俄非关系发展具有非对称性，现阶段非洲对俄罗斯的重要性远超俄罗斯对非洲的重要性，部分非洲国家领导人把同俄罗斯接触视为彰显自身战略自主性和更多获得美西方国家支持的一种策略。[③]总之，从“全球南方”视野看，俄非关系互动加强并逐渐走实走深，对双方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将产生重要的战略影响。

一、“全球南方”崛起与俄罗斯对非战略转型的动因

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搅动国际局势的复杂背景下，“全球南方”作为重要力量之一对世界格局走向的影响力却不断增强，[④]重要作用备受瞩目。有鉴于此，俄罗斯对“全球南方”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并将“全球南方”视为其摆脱美国和西方国家制裁和构建多极化国际秩序的重要合作伙伴。由此，俄罗斯有针对性地加大了对“全球南方”重要代表——非洲国家的投入力度，其对非战略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一）“全球南方”崛起与国际秩序新变革

“全球南方”崛起堪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一个缩影，其以“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公道正义的共同主张，成

① 沈陈：“新型大国对‘全球南方’的政策立场与行动”，《世界知识》，2023 年第 12 期，第 20 页。

② 王晓泉：“从新《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析俄外交战略调整”，《俄罗斯学刊》，2023 年第 5 期，第 20 页。

③ Joseph Siegle, “Russia-Africa summit provides a global stage for Moscow to puff up its influence”, July 21, 2023, https://theconversation.com/russia-africa-summit-provides-a-global-stage-for-mosco w-to-puff-up-its-influence-209982

④ 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64 页。

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①]实际上，“全球南方”并非新兴力量，其重要性的再次显现，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国竞争和地区冲突拓宽了“全球南方”的活动空间，使其在调节国际冲突、促进世界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文明对话等方面不断凸显独特的优势和作用。[②]“全球南方”所呈现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从未有过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成为大国竞相拉拢的重要对象。2023 年 2 月，第 59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MSC）设置“南北合作”专场讨论；5 月，七国集团（G7）广岛峰会将加强同“全球南方”合作作为重要议题之一。这些都体现了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的高度重视。[③]

近二十年来，“全球南方”经济发展不断提速，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高。据统计，2002 年至 2021 年，亚非拉国家商品出口总额从 2 万亿美元快速增长至 9.6 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37.5%增长至 51.3%，达到世界贸易的一半以上。其中，亚洲国家出口增长至原来的 4.9 倍，从 19550 亿美元增至 95830 亿美元，非洲国家出口增长至原来的 5 倍，从 1120 亿美元增至 5570 亿美元，拉丁美洲国家出口增长至原来的 3.5 倍，从 3450 亿美元增至 11960 亿美元。[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全球南方”将延续经济崛起的势头，2028 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 GDP 总量或将达到发达经济体的 1.6 倍。[⑤]“全球南方”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未来的良好预期，使其更加自信地追求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以改变当前国际秩序中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规则、制度和模式，核心诉求之一是增强战略自主性。短期看，这意味着“全球南方”不会盲目跟随美国和西方国家，不会贸然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仍将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公平正义一边。长期看，“全

① 刘建超：“凝心聚力，携手同行，共建现代化全球南方”，《当代世界》，2023 年第 11 期，第 4 页。
② 牛海彬：“‘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当代世界》，2023 年第 11 期，第 22 页。
③ Ravi Agrawal, “Why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in 2023”, January 12,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1/12/global-south-geopolitics-economics-climate/
④ Россия и глобальный Юг: реальн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27 июня 2023 г. https://interaffairs.ru/news/show/41019
⑤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Rocky Recovery”, IMF, April 11, 202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4/11/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3

球南方”致力于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①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当今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力量分化重组，国际失序状态趋于严重。②“全球南方”不甘做西方大国的附庸，而是通过“积极的不结盟”立场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在涉及全球安全和发展等重大全球性议题上主动作为，以实际行动促进国际秩序新变革。一方面，西方大国几乎没有能力单方面违背“全球南方”的意愿，强迫其执行自己的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全球南方”不会放弃在主要大国间进行战略协调的“新特权”，会利用自身灵活外交的政策优势和关键多数的独特地位不断增进利益获得，推动构建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公正合理的多极化国际秩序。

（二）俄罗斯对“全球南方”的认知和定位

由于“全球北方”向“全球南方”的持续性权力转移，“自由主义的霸权时代已经过去”③，当今国际体系正在发生实质性的结构和规范变化。俄罗斯在其中扮演传统大国和崛起大国双重角色，其对外战略旨在改变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构建新兴的多极化国际秩序，与“全球南方”的国际秩序观高度契合。俄罗斯作为“全球南方”机制化合作的典型代表之一（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核心成员），与绝大多数的“全球南方”国家保持着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同时也和由“全球南方”国家组成的阿盟、非盟、东盟和拉美共同体等区域性组织频密互动。有学者将俄罗斯与“全球南方”关系分为四类，即“等级关系、战略关系、表面关系和对抗关系”④，

① 黄超：“国际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全球南方’的时代内涵”，《世界经济研究》，2023年第 9 期，第 9 页。

② 阎德学：“国际失序与全球安全治理”，《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34 页。

③ A. Acharya, “After Liberal Hegemony: The Advent pf a Multiplex World Order”,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Vol.31, No.3, pp.283.

④ “等级关系”是指俄罗斯的庇护对象，主要在政权安全领域依赖俄罗斯；“战略关系”是指俄罗斯认为的对其更广泛的国际议程至关重要的伙伴；“表面关系”指的是对俄罗斯利益较小且未能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层面的国家；“对抗关系”是指少数与俄罗斯重要伙伴发生冲突的国家。See I. U. Klyszcz, “How Russia Brings Its Aggession Against Ukraine to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Defense and Security*, April 2023, p.V.

分别对应采取战略沟通、规避制裁、市场替代和政权庇护等手段寻求发展双边关系。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对“全球南方”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增大，增进双边关系发展的政策意愿更加迫切。“全球南方”在俄乌冲突中的中立立场也显示了俄罗斯重视“全球南方”战略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联合国大会就美西方提出的制裁俄罗斯的决议案的投票结果彰显了“全球南方”日益增强的战略自主性，也反映出俄罗斯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弹性和韧性。俄罗斯提出了在“全球南方”引发强烈共鸣的反新殖民主义主张，并希望通过深化与“全球南方”的互利合作来实现获得国际影响力、扩大地缘战略存在、与西方国家竞争、掌控能源资源来源、推动建立多极化国际秩序的战略目的。

当前俄罗斯对“全球南方”的政策基调是担任过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的普里马科夫提出的，也被称为“普里马科夫主义”。简单来说，俄罗斯的主要国家利益是成为多极化世界的大国之一，决不能为了更快地与西方融合而放弃世界各地的传统盟友和伙伴，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北非和中东地区。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与俄罗斯本已脆弱的关系完全破裂，他们对俄罗斯施加了史无前例的制裁和打压，致使俄罗斯处境日趋艰难。俄罗斯将“全球南方”作为重要突破口，试图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关系转移自身战略压力，同时确保和提升其在全球和地区格局中的影响力。[①]这表现为三个方面：坚持多元外交路线、与“世界多数国家”为伍和构建全球反霸统一战线。[②]在俄罗斯与美国、西方国家对抗日趋激烈且短期内关系难以改善的情况下，“全球南方”随即成为俄罗斯在全球寻找新机遇、实现新突破的对外战略支点，在俄罗斯对外战略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非洲作为“全球南方”的典型代表，自然成为俄罗斯发展与“全球南方”关系的核心关键，并日益凸显愈发重要的战略作用。一定意义上，俄非关系能否相向而行、行稳致远，事关俄罗斯对外战略转型成功与否的大局。

（三）俄罗斯对非战略转型及动因

普京执政以来，将全方位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推动民族复兴视为对

① D. Parlar, E. Emre, *Russia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5.
② 王晨星：“俄罗斯新版‘对外政策构想’与‘多极世界’战略”，《世界知识》，2023 年第 8 期，第 36 页。

外战略的基本目标。2023 年 3 月发布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提出，建立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秩序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①]其中就包括重新建立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将发展俄非关系作为俄罗斯对外战略转型的关注重点。[②]俄罗斯日益将自身视为非洲和平与稳定的维护者、非洲经济发展的建设者以及非洲推动国际秩序转型的支持者。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对外战略加速调整，凸显出与美国、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对抗性加大、谋求推动构建多极化国际秩序等鲜明特点。[③]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凭借大国身份、军事实力、资源禀赋、地缘位置和传统影响等自身优势与特点，进一步提升了在非洲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了俄非“特殊关系模式”。归结起来，俄罗斯对非战略转型的主要特点是：不直接参与部分非洲国家旷日持久的战争，将危险或代价高昂的开发活动委托给非国家行为体，把军事合作作为对非合作的杠杆以撬动经济和政治合作，强调运用低投入、高回报的战略手段拓宽俄罗斯在非利益。俄罗斯之所以不断加强对非战略投入，不仅是俄罗斯对外战略转型和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内在战略需求，也是大国竞争加剧导致国际秩序深刻演化和“全球南方”崛起等外部因素驱动的必然结果。

从内在战略需求看，俄罗斯对非战略转型服从、服务于俄罗斯对外战略调整和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2023 年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一个核心指向是“东进南下”，即专注于“全球南方”，借助“全球南北分化”之势，拉紧与“全球南方”的关系，摆脱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孤立和战略打压。[④]俄罗斯把发展对非关系置于深化与“全球南方”的战略框架之下，将其作为俄罗斯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增强战略叙事的有力工具。[⑤]在最新

① “The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arch 31, 2023, https://mid.ru/en/foreign_policy/fundamental_documents/1860586/

② Саммит Россия – Африка. 24 октября 2019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1893

③ 李勇慧：“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对外战略调整及基本走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56 页。

④ 于游：“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评析”，《东北亚学刊》，2023 年第 5 期，第 136 页。

⑤ R. Kanet, D. Moulioukova, “Introduction: Russ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eturn to Authoritarian Roots”, in R. Kanet, D. Moulioukova eds, *Russian and the World in the Putin Era, From Theory to Reality in Russia Global Strategy*,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5.

构想中，俄罗斯明显提升了非洲的战略地位，将非洲的次序置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欧洲之前，强调“俄罗斯与非洲国家站在一起，希望共建一个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①]对当今国际秩序的不满以及推动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战略诉求，是俄非深化互利合作的重要基础。此外，俄罗斯需要进一步打开和进入非洲市场，作为俄乌冲突后失去的美西方国家市场的替代，以促进自身经济发展和摆脱制裁的消极影响。斯蒂芬·布兰克（Stephen Blank）强调，俄罗斯在非洲的经济活动具有“战略重要性”，因为这些活动让“俄罗斯在非洲站稳了脚跟，并在此基础上向多个方向扩大影响力”。[②]而俄罗斯则有学者指出，俄非经济发展的关键方向在于建设双边技术伙伴关系。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技术领域是互动双方发展关系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建立新战略联盟的核心要素。[③]非洲作为资源型大陆能够为俄罗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必要的战略性资源，如关键矿产和稀有金属，而俄罗斯生产的冶金设备、建筑机械、化肥和机电产品等则正适合非洲推进现代化建设。

俄罗斯在发展对非关系时将自身定位为平等的合作伙伴，而非“老大哥”、“捐助者”，更不是霸权国。[④]俄非关系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俄罗斯在非洲大陆没有殖民主义历史。因此，俄罗斯希望秉持历史上的对非友好传统，通过帮助非洲国家领导人调整发展方向、提升国家实力，摆脱西方后殖民主义的深刻影响。俄罗斯在非洲强调军事和非军事措施的结合使用，通过软实力向非洲国家不断投射力量，包括外交、信息战和签订商业合同等方式，并在地方层面将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紧密结合。[⑤]俄罗斯通过混合

① Указ об утверждении Концепц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31 марта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70811

② Stephen Blank, “Russia’s Military Diplomacy in Africa: What Does It Mean?” June 5, 2019,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ussias-military-diplomacy-in-africa-what-does-it-mean/

③ Абрамова И. О. Африканский вектор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 условиях слома стар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27 мая 2022 г. http://www.ras.ru/news/shownews.aspx?id=7180d283-2d7d-4342-b018-b69e0123cdda.

④ Маслов А. А., Суслов Д. В.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в Африку: как сделать его российским приоритетом//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2. №.1. С.139.

⑤ A. Duursma, N. Masuhr, “Russia’s return to Africa in a historical and global context: Anti-imperialism, patronage, and oppotunism”,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Vol.29, No.4, p.418.

战争[①]的策略在叙利亚反叛乱行动中取得的成功，提升了其在非洲大陆的吸引力，尤其是国家治理能力脆弱和陷入政治暴力的非洲威权国家，迫切希望加强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俄罗斯支持“非洲当家作主”的立场，与其在国际事务中不畏强权、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理念一脉相承。俄罗斯遵循安全与发展相协调的方针，积极推动与非洲国家的互利互惠合作，进而更加坚定地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秩序。俄罗斯坚定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即是例证。

从外部因素看，俄非关系调整深受国际秩序变动、非洲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诉求以及大国在非洲地区竞争的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了国际秩序的变迁与重组，西方国家实力进一步衰落使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难以为继，“全球南方”崛起推动国际力量对比走向均衡。[②]多极化格局的发展态势，助推俄非战略合作不断深化。俄罗斯是敢于直接挑战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坚定力量，是“全球南方”寻求改变当今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的天然合作伙伴。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教授、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指出，人们期待已久的多极世界并非几个权力中心以某种方式相互沟通，而是关于不同地位的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不同关系的网络。这些水平和垂直的联系并不完全有序，其不同的高度增加了非线性。[③]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转型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俄罗斯和作为整体的非洲大陆深化关系、互相支持，还需要双方以及次区域组织等形成网络化的合作关系，以顺应多极化国际秩序的非线性发展趋势。

从非洲发展对俄关系的角度出发，虽然非洲被视为发展潜力巨大的大

① 混合战争是指俄罗斯参与国际竞争乃至冲突的一种全政府、全社会的策略模式，即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舆论等多种力量，综合运用常规和非常规军事手段，隐蔽实施的非传统军事行动。参见卓振伟、武斌：“俄罗斯与非洲的军事合作：混合战争的视角”，《西亚非洲》，2023 年第 2 期，第 121 页；段军泽：“俄式‘混合战争’实践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3 期，第 31–36 页；韩克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混合战争’”，《战略决策研究》，2021 年第 6 期，第 51–80 页；Anna Borshchevskaya, *Putin's War in Syria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rice of America's Absence*, London: I. B. Tauris, 2021.

② 弗拉基米尔·亚库宁、马克西姆·维利索夫、王雨萌等：“构建多极化世界格局：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与中俄关系新发展”，《俄罗斯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56 页。

③ F. Lukyanov, “Not Against, But Beyond the West”,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23, Vol.21, No.4, p.6.

陆，但目前发展还未步入快车道。部分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政局极度不稳，西非地区甚至被称为“政变带”。[①]俄罗斯对非洲的军事援助，主要选取的是国内存在强大反政府武装的“脆弱国家”和被西方孤立、排斥的“威权国家”[②]，这些国家在发展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意愿较为迫切。当然，俄罗斯对非进行军事援助或扩大对非国际支持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在金砖国家扩员问题上的立场是，金砖国家机制内不应有针对俄罗斯等非法单边制裁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坚定不移的”[③]。俄乌冲突爆发后，多数非洲国家坚持战略自主，在联合国大会涉俄决议投票时保持中立，但也有少数非洲国家认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主张，并通过联合国大会投票和拒绝出席第二届俄非峰会表明立场。[④]莫斯科大学亚非研究院院长安德烈•马斯洛夫（Андрей Маслов）和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专家弗谢沃洛德·斯维里多夫（Всеволод Свиридов）指出，非洲期待俄罗斯采取全面、实质性的行动来支持“全球南方”。[⑤]2023 年 7 月，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提出，非洲国家需要俄罗斯作为战略伙伴和全球力量平衡的制衡因素，以便为自身争取不再成为西方原材料附庸和发展自身价值链的机会，他们将俄罗斯视为提供创新技术的发展源泉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应对内部危机与冲突的安全和稳定之源。[⑥]

《非洲 2023 年议程》提出了加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其对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培训所需的技术及设备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些需求符

① 刘海方：“寡头还是改革者？——部分非洲国家以政变‘塑造’国家新方向”，《世界知识》，2023 年第 19 期，第 50 页。
② 卓振伟、武斌：“俄罗斯与非洲的军事合作：混合战争的视角”，《西亚非洲》，2023 年第 2 期，第 129 页。
③ “俄副外长谈金砖国家扩员时称机制内不应有支持单边制裁的国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3 年 6 月 2 日，https://sputniknews.cn/20230602/1050777115.html
④ 孙红、韩奕琛：“俄罗斯借峰会加大对非洲战略运筹”，《世界知识》，2023 年第 16 期，第 49 页。
⑤ Андрей Маслов. Всеволод Свиридов От созвучия риторики к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 шагам. Россия и новые задачи в Африке//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3. Т.21. №2. С.201.
⑥ O. Barabanov, L. Chkoniya, E. Kharitonova, I. Nyaburi Nyadera, D. Poletaev, R. Tsafack-Nanfosso, N. Zaiser, “Russia and Africa: An Audit of Relations”, Valdai Discussion Club, July 2023, p.11.

合俄罗斯创新发展的优先事项。非洲经济相对欠发达，其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种类较少，金融体系和运输基础设施相对落后。[①]对非洲国家来说，优先事项是工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而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工业基础，并且正向更加注重科技支撑、数字技术赋能和综合规划制造业发展的“新工业化”转变，[②]更乐于通过设备、技术等对外贸易方式推动非洲的现代化进程，这也有助于提高俄罗斯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匈牙利奥布达大学副教授亚诺什·贝塞尼尤（János Besenyő）指出，从非洲的视角看，俄罗斯为摆脱美国的全球霸权以及消除非洲前殖民统治者挥之不去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战略选择。[③]从大国竞相争夺“全球南方”的主阵地非洲大陆来说，近年来非洲凭借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等优势吸引世界大国广泛投入，使其再次成为大国竞争的战略舞台。[④]相较于其他大国在非洲大陆的强大影响力，俄罗斯意识到其大国地位的维持和延续离不开非洲国家支持，因此，普京从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就全面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深入交往。2022 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非洲国家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单方面、不负责任的制裁的“减震器”。在多次会议和磋商过程中，非洲国家领导人向美国和西方国家明确表示：世界是相互联系的，西方通过实施反俄限制，不仅给自己也给所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引发粮食危机恶化、通货膨胀上升和不确定性增大等恶果。[⑤]这为俄罗斯通过“重返非洲”的战略布局对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政策型对冲创造了条件。[⑥]因此，俄罗斯不仅需要与大国竞争在非影响力，还需要维持好、发挥好非洲的“减震器”作用。

① Хмелева Галин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Состоян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африкан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23. №.7. С.78.
② 高际香、刘伟、杨丽娜：“俄罗斯工业化 200 年：回顾与展望”，《欧亚经济》，2021 年第 5 期，第 60 页。
③ János Besenyő, “Russia in Africa: can it offer an alternative to the US and China?” June 2, 2019, https://the conversation.com/russia-in-africa-can-it-offer-an-alternative-to-the-us-and-china-117764
④ M. Kepe, E. Treyger, C. Curriden, R S. Cohen, K. Klein, A L. Rhoades, E. Schuh, N. Vest, “Great-Power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in Africa”, RAND Corporation, 2023, p.V.
⑤ Андрей Маслов, Всеволод Свиридов, От созвучия риторики к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 шагам Россия и новые задачи в Африке//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3. №.2. С.200.
⑥ 强晓云：“对冲视角下的俄罗斯对非洲政策”，《西亚非洲》，2019 年第 6 期，第 19 页。

二、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新进展

首届俄非峰会的成功举行，为双方扩大和深化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①]普京在首届峰会上表示，“希望俄非合作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②]。非洲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主力军之一，正自信地获得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秉持“积极的不结盟”立场参与地区和全球议程，努力将自身打造成多极化国际秩序的重要一员。在俄罗斯持续加大对“全球南方”战略投入的背景下，俄非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俄罗斯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得以维持，与南非的伙伴关系实现部分重建，在红海地区、中非和萨赫勒地区等施加影响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③]此外，俄罗斯还拓展了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

（一）政治领域：双边机制化合作加深，外交领域策应加强

首届俄非峰会通过的联合宣言将双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约定每三年举办一次俄非峰会，每年举办一次俄非议会会议。该宣言强调，俄罗斯与其他世界中心相比具有的优势是：希望采取全面、包容的方法与所有非洲国家建立对话，而不是将它们划分到“正确”或者“错误”的类别，并支持非洲议程。首届俄非峰会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机制化合作，包括构建俄非对话伙伴机制，以便俄罗斯与各国外交部门以及非盟（AU）之间定期举行政治磋商；建立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以协调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解决与粮食及信息安全等有关的重要议题。埃及总统塞西在首届俄非峰会前的 2018 年 10 月访问俄罗斯期间，与普京总统签署了政治和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俄埃双边合作达到“全新水平”。2019 年，俄罗斯与埃及两国元首共同主持了首届俄非峰会。2023 年是俄埃两国建交 80 周年，双方的庆祝活动持续了一年。普京总统向到访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塞西总统表示，“两国关系具有特

① O. Barabanov, L. Chkoniya, E. Kharitonova, I. Nyaburi Nyadera, D. Poletaev, R. Tsafack-Nanfosso, N. Zaiser, “Russia and Africa: An Audit of Relations”, Valdai Discussion Club, July 2023, p.3.

② Саммит Россия – Африка, 24 октября 2019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1893

③ R. Saamuel, *Russia in Africa: Resurgent Great Power or Bellicose Preten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103.

殊性质”[①]。在俄罗斯看来，埃及是中东和非洲稳定的关键国家、合作伙伴和重要支柱，[②]也是俄罗斯深入与非洲国家合作交流的重要战略支点。因此，俄罗斯坚定支持埃及加入金砖国家组织，致力于扩大以“全球南方”成员为核心的国际组织的全球影响力和治理能力。

随着俄非峰会的成功召开，俄罗斯加紧了与非洲国家的政治往来。2020年，俄罗斯外交部设立俄非伙伴关系论坛秘书处，并将其作为第二届俄非峰会和俄罗斯与非洲大陆开展有效商业对话的主要协调机构。2022 年 7 月 23 日至 27 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先后访问埃及、刚果、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会见相关国家领导人及阿盟和非盟代表。2023 年伊始，拉夫罗夫第一时间开启访非之行，1 月访问南非、斯威士兰、安哥拉和厄立特里亚，2 月访问苏丹、马里和毛里塔尼亚。其中，斯威士兰、马里和厄立特里亚是俄外长历史上首次到访，足见俄罗斯对整个非洲的关注度在上升。7 月，拉夫罗夫访问了埃及、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刚果共和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俄罗斯外长多次出访非洲，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举行会谈，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诉求，深化了双方的互利合作。作为“全球南方”重要组成部分的地区组织也是俄罗斯外交的关键发力点。俄方高度重视发展与非盟的关系，俄非峰会规定由俄罗斯总统和非盟主席共同主持，近年来普京总统也保持着定期会见非盟主席的机制化做法。俄罗斯联邦政府和非盟、欧亚经济委员会和非洲联盟委员会还共同签署了《基于相互关系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③]

俄乌冲突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向非洲国家施压，要求其谴责俄方并加入制裁阵营。非洲国家秉持不结盟和中立的原则立场，从维护

①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中国网，2023 年 7 月 27 日，http://news.china.com.cn/2023-07/27/content_95518410.htm?f=pad&a=true

② “With Egyptian Participation, the ‘Sochi Summit’ Reformulates New Frameworks for the African-Russian Partnership”, October 19, 2019, https://www.shorouknews.com/news/view.aspx?cdate=19102019&id=52dfbd94-f947-4534-ba21-f84ee06dc7e9

③ 2019 年 10 月 24 日，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俄非峰会上，欧亚经济联盟委员会和非洲联盟委员会签署了经济合作领域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拟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贸易、投资和商业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领域开展互动。См. ЕЭК и Комиссия Африканского союза подписали Меморандум о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и. 24 октября 2019 г. https://eec.eaeunion.org/news/24-10-2019-5/

自身国家利益以及发展对俄关系的长远角度出发做出自主选择。这体现在联合国大会涉及俄乌冲突的相关决议投票上，如表 1 所示。在联合国大会就对俄制裁决议进行投票时，非洲国家并未追随美国和西方国家，而是进行了多样化的选择。投票后，非洲多国表达了对北约的不满和不信任。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公开表示，俄乌冲突的根源是北约多年来的持续东扩行为，正是北约不能清醒地认识到东扩的严重后果，才导致了冲突的不可避免。[①]南非明确拒绝西方制裁俄罗斯的主张，强调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端。从联合国大会对俄乌冲突相关决议的五次投票结果看，超半数的非洲国家选择弃权或缺席投票，占比为 52%。虽然饱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尖锐批评，但这些非洲国家始终坚持战略自主，无疑是对俄罗斯外交的有效策应。[②]

表 1　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对俄乌冲突相关决议的投票情况

时　间	投票决议	弃权	赞同	反对	缺席	总计
2022 年 3 月	谴责俄方入侵	17	28	1	8	54
2022 年 4 月	暂停俄方在人权理事会资格	24	10	9	11	54
2022 年 10 月	反对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	19	30	0	5	54
2022 年 11 月	呼吁俄罗斯对乌克兰赔偿	27	15	5	7	54
2023 年 2 月	呼吁和平	15	30	2	7	54

资料来源：R. Gopaldas, “Will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Change Russia-Africa Relati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023, p.3.

俄乌冲突爆发后，虽然非洲大陆一些地方的民众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持有负面看法，但这种反感情绪和俄罗斯起初的军事行动进展不顺并没有大幅度影响非洲国家发展对俄关系的意愿。在非洲国家看来，俄

① Tim Cocks, “South Africa’s Ramaphosa blames NATO for Russia’s war in Ukraine”, March 18,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safricas-ramaphosa-blames-nato-russias-war-ukraine-2022-03-17/

② R. Gopaldas, “Will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Change Russia-Africa Relati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023, p.5.

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没有严重影响到非洲的和平与稳定。[①]非洲国家积极充当调解人，力争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贡献非洲智慧和非洲方案。赞比亚、塞内加尔、刚果共和国、乌干达、埃及和南非六国提出解决俄乌冲突的十项和平倡议，[②]阿尔及利亚表态愿意在俄乌谈判中充当中间人，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领导人分别出访俄乌进行斡旋。非盟一开始就顶住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两次拒绝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非盟发表讲话的提议，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与普京总统接触七周后才与泽连斯基进行了 20 分钟的通话。[③]非洲国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压力下坚持战略自主，有意在俄乌冲突中扮演平衡者角色，并借此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非洲国家希望通过积极斡旋尽早实现止战和谈，因为俄乌冲突对非洲能源和粮食安全造成了极大冲击。此外，非洲国家还反对 2022 年 4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打击俄罗斯在非恶意活动法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谴责该法案将非洲“边缘化”。非洲国家一贯反对将俄罗斯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或对俄罗斯经济实施惩罚性措施。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多数非洲国家并未加入对俄制裁阵营，这无疑是俄罗斯“重返非洲”并强化对非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进入 21 世纪，“非洲当家作主”的观念在非洲大陆、地区组织和国家层面均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2013 年，非盟最重要的战略文件之一《2063 年议程》承认了“非洲自主权”，即非洲自主发展的能力的概念。该文件将“以非洲为中心的发展”作为非洲大陆主要发展方向的出发点。俄罗斯和非洲国家均对国际秩序向多中心世界模式过渡抱有期待。毕竟，在形成多个相

① “Why Russia wins some sympathy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Economist*, March 12, 2022, https://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22/03/12/why-russia-wins-some-sympathy-in-africa-and-the-middle-east

② 十项和平倡议的具体内容包括：和平只能通过外交谈判来实现；承接第一点，谈判应尽快开始；必须缓和双方的局势；解决方案应确保根据《联合国宪章》尊重国家和人民的主权原则；应向所有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冲突双方必须确保粮食和化肥的流动；必须向战争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交换战俘和返回儿童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由于敌对行动，应拨出资金用于恢复基础设施建设和援助受害者；需要与非洲国家保持更密切的互动。

③ Tafi Mhaka, “Can the African Union be a neutral arbiter of peace in Ukraine?” May 28,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22/5/28/can-the-african-union-broker-peace-in-ukraine

对均衡化的权力中心的情况下，有可能更好地保障国家的经济独立和加强国家韧性。俄罗斯和非洲都可以成为这样的权力中心，其中，非洲以整个非洲大陆为中心，而俄罗斯则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框架。[①]俄非对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共同期待，为双方加强政治领域对话与合作、加深外交领域的相互策应，奠定了重要基础，开创了广阔空间。

（二）经济领域：双边贸易及投资增长缓慢但贸易结构渐趋优化

据统计，2000—2022 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增长了 4.9 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1.9 倍和“全球北方”的 1.1 倍，2022 年“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升至 58%，而“全球北方”则下降至 42%。[②]在世界经济发展“南升北降”和“东升西降”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对外贸易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呈现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转变的基本态势。长期以来在俄罗斯进出口贸易中扮演主要角色的美国和西方国家，正在被“全球南方”国家取代。

贸易是对外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方面之一。目前来看，俄非双边贸易潜力并未得到充分释放，俄非贸易额不仅远低于中美等大国的对非贸易额，甚至还低于印度和土耳其的对非贸易额，但俄非贸易额增长前景广阔。1995 年，俄非贸易额仅为 9.8 亿美元，到 2018 年增长了近 20%，达到 204 亿美元。其中，俄罗斯对非出口额为 1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③]2019 年以后，受世界经济低迷大环境影响和俄罗斯遭受多种制裁导致经济发展受阻等原因，俄非贸易额回落到 140 亿至 180 亿美元的区间。俄非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俄罗斯对非出口远大于进口，常年贸易顺差高达 120 亿美元左右。首届俄非峰会正是在世界经济低迷和俄非贸易遭遇瓶颈的背景下召开的，当时普京总统承诺五年内将俄非贸易额翻倍，达到 400 亿美元。首届俄非峰会期间，俄罗斯与非洲诸国签署了 50 多项经贸合作协议，总价值约为 125 亿美元。[④]俄

① V. Vuksaovic, “Moscow’s Continent: The Principles of Russia’s Africa Policy Engagemet”, African Perspectives Global Insights, SAAIIA, March 2023, pp.14-16.
② 江瑞平：“‘全球南方’：经济定位与战略取向”，《世界知识》，2023 年第 23 期，第 70 页。
③ 赵丹、王尘子：“从‘撤离’到‘重返’：俄罗斯对非洲的战略选择”，《中国非洲学刊》，2021 年第 4 期，第 53 页。
④ 强晓云：“首届俄非峰会落幕，合作有潜力但更需能力”，《世界知识》，2019 年第 22 期，第 52 页。

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Антон Кобяков）指出，按行业划分，签署文件数量最多的是出口和对外经济活动，涵盖国际合作、高科技、运输和物流、采矿和勘探、投资和银行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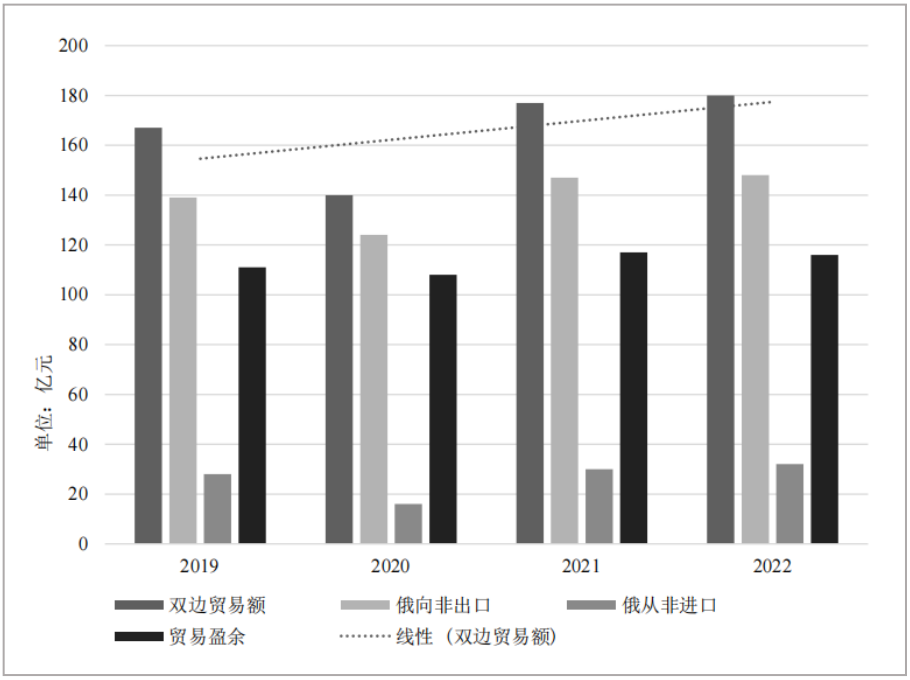

图 1　2019 年至 2022 年俄非贸易额统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 Comtrade、Trademap 数据库数据自制。

目前，俄罗斯在非洲大陆的投资很少，仅占流入非洲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的 1%左右，很难跻身对非投资前十名之列。据统计，2016 年至 2020 年外国对非直接投资前十位，分别是英国、法国、荷兰、美国、中国、意大利、南非、新加坡、瑞士和印度。[①]此外，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从 2013 年的 2.3 万亿美元缩减至 2022 年的 2.2 万亿美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俄罗斯对非投资金额。然而，俄罗斯却有针对性地加大了对非洲能源和资源项目的投资力度。在埃及，俄罗斯已启动耗资 250 亿美元的达巴核电站大型项目和耗

① “Regional Trends Africa,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2”, *WIR 2022*, p.8.

资 70 亿美元的苏伊士运河工业经济区项目。俄罗斯和阿尔及利亚在能源领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俄罗斯还重点投资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能源和贵金属项目，其与该地区的贸易额达到 30 亿美元，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在西非的石油生产投资额达 10 亿美元。[①]俄罗斯与非洲的贸易伙伴相对不均衡，其主要贸易伙伴集中在北非和东非。俄罗斯与同属于金砖国家的南非的经贸关系并不活跃（见图 2），形成对照的是，埃及是俄罗斯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 年两国贸易额占到俄对非贸易总额的近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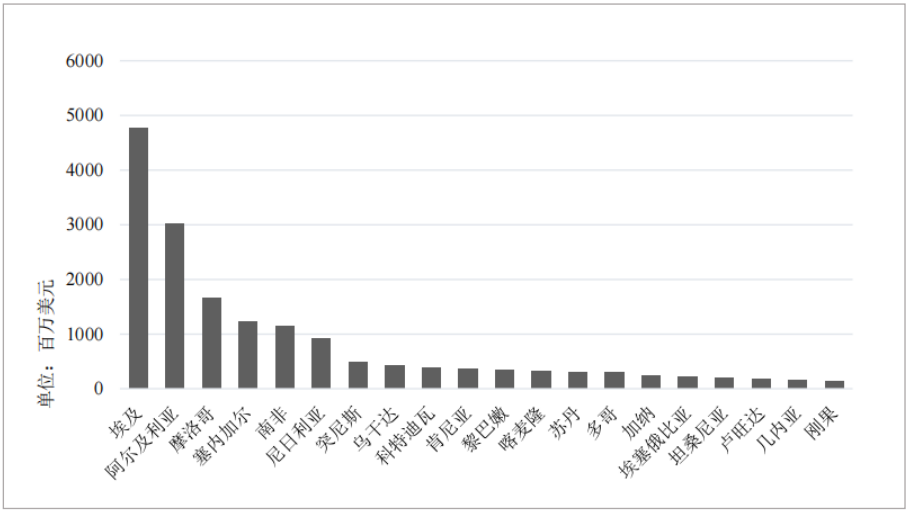

图 2　2021 年俄罗斯与非洲国家双边贸易额统计

数据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海关署公布的数据自制。

从俄罗斯对非出口结构来看（见图 3），非资源类、非能源类高达 80%，几乎达到最佳状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机械、设备和车辆占比近 25%，矿产品占 20%，金属和金属制品占 8.5%，化工产品和橡胶占 5%，木材、纸浆和纸制品占 4%。近年来俄非贸易增长，既得益于贸易种类的多样化和地理范围的扩大化，也得益于非洲商品对俄罗斯供应量的增大。俄罗斯还结合非

① 穆罕默德 • 萨利赫 • 奥马尔，“在非洲市场的扩张：俄罗斯应对制裁和美元霸权的计划”，2023 年 2 月 14 日，https://chinese.aljazeera.net/economy/2023/2/14/

洲地区较为严重的粮食危机，通过发展农工综合体和食品加工对非洲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①]俄罗斯公司在非洲大陆的地质勘探、采矿、能源和石油天然气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同时，俄非正采取措施在高科技领域加强合作。快速增长的商品和服务需求，也为俄罗斯工业产品在非洲市场的销售提供了机遇。俄罗斯需要非洲国家为其现代高科技产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战略原材料，如锰、铬、铝土矿、铀和稀土金属等。近年来，俄方发起成立了“与非洲国家经济合作协会”（AECCA）“与非洲国家经济合作协调委员会”（AFROCOM）两个机构，旨在促进和保护俄罗斯在非洲市场的贸易和经济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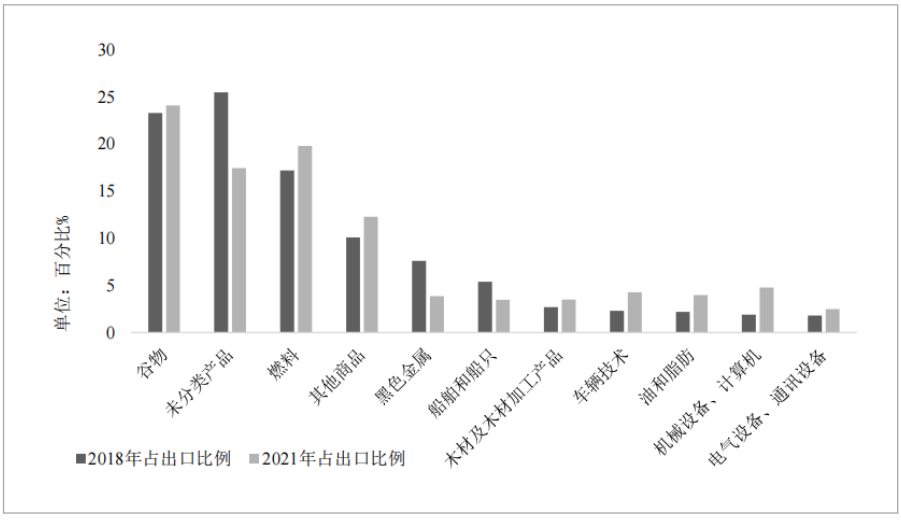

图 3　2018 年和 2021 年俄罗斯对非洲出口产品种类统计

数据来源：«Россия – Африка: долгосрочно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артнёрство», p.20, https://www.trademap.org/Bilateral_TS.aspx

非洲作为人口和增长能力均在蓬勃发展的经济体，也是最新技术产品的潜在强大消费者。获取创新技术，发展信息技术、电信基础设施和知识密集型技术，是非洲各国争取发展的关键。目前，俄罗斯正有针对性地提升和发

①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а О. В.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с Африк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Контуры глоб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олитика. 2021. №2. С.237-238.

展上述领域，非洲有望成为俄罗斯在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领域最新技术的联合实验与开发基地。在“全球南方”成为新型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之际，非洲经济快步向全球经济转型，从“捐赠”经济转向自给自足、自我创造的经济。[①]俄罗斯对非洲的很多商品出口主要是通过全球贸易商的交换贸易来完成的，而非俄罗斯生产商直接与非洲买家合作。如果不建立独立的金融、技术和物流基础设施，不与非洲商家开展有针对性的合作，与非洲国家的贸易额很可能在几年内从目前的 180 亿至 200 亿美元下降到 1/2 甚至是 1/3。俄罗斯十分清楚，与非洲大陆的互动不能仅仅依靠单个项目，重要的是要与泛非中央、非洲大陆和次区域组织加强合作，扩大一次性合作范围，并确保以多边方式为俄非经济合作长期发展不断创造新机会。[②]

（三）安全领域：双边合作持续拓宽并日益形成特有的“俄非模式”

尽管俄非经济合作的规模较小，但双方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关系却始终十分牢固，这包括武器销售、联合军事培训和俄罗斯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在非活动等。[③]军事装备出口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施加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俄罗斯长期保持军备出口全球第二大国的地位，充分利用其军事大国的优势来提升在非影响力。据统计，2018 年至 2022 年，俄罗斯向非洲出口武器占非进口武器总额的 40%，远高于美国（26%）、中国（9.8%）和法国（7.6%）的份额。[④]其中，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分别有 73%与 34%的武器装备进口自俄罗斯。2013 年以来，俄罗斯分别向这两个国家出售了大约 44 亿美元和 22 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包括苏−24 战斗机、苏−30 战斗机、米格−29 战斗机和 S-300 防空导弹系统等。[⑤]此外，马里、苏丹、中非、安哥拉等国也获

① Nathalia Zaiser, “Russia-Africa Summi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ecurity Arrangements”, October 23, 2019,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 ssia-africa-summit/

② O. Barabanov, L. Chkoniya, E. Kharitonova, I. Nyaburi Nyadera, D. Poletaev, R. Tsafack-Nanfosso, N. Zaiser, “Russia and Africa: An Audit of Relations”, Valdai Discussion Club, July 2023, p.7.

③ M. Droin, T. Dolbaia, “Russia Is Still Progressing in Africa. What’s the Limit?”, CSIS, August 2023, p.5.

④ P. D. Wezeman, J. Gadon, S. T. Wezeman,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22”, SIPRI Fact Sheet, March 2023 p.7.

⑤ A R. Grissom, S. Charap, J. Cheravitch, R. Hanson, D. Massicot, C A. Mouton, J R. Reimer, “Russia's Growing Presence in Africa: A Geo-strategic Assessment”, RAND Corporation, 2022, pp.12-13.

得了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供应。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研究报告显示，2018 年至 2022 年，俄罗斯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大的武器供应国，占到该地区武器市场份额的 26%。[①]2019 年 4 月，安哥拉总统卢伦索访问俄罗斯，强调了两国在国防和矿业领域的合作。时任安哥拉国防部长塞凯拉表示，安哥拉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将永远持续下去”。[②]在索契峰会上，卢伦索总统表示，“非洲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俄罗斯人民的努力，归功于原苏联的努力。”[③]

俄罗斯自身的军事实力优势发挥着撬动对非政治、经济合作的杠杆作用。[④]在军事技术和安全合作方面，俄罗斯将自己定位为助力非洲国家捍卫主权、自由选择政治经济社会模式以及不受外部势力干涉的安全提供者和保卫者。俄方密切关注非洲国家的事态发展，协助相关国家制定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战略方针，力争为促进非洲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瑞典国防研究局（FOI）的研究表明，近年来俄罗斯在对非外交中向军事安全手段倾斜的趋势日趋明显。[⑤]2015 年以来，俄罗斯与约 20 个非洲国家签订了军事合作协议，主要集中在非洲地区较为脆弱的国家。俄罗斯还组织非洲军事人员进行联合演训，寻求在非洲大陆建立军事设施。2020 年，关于在红海苏丹港建立俄罗斯海军基地的协议签署。首届俄非峰会期间，双方还签署了 30 多项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俄方的军事援助，有效弥补了遭受美西方国家制裁和武器禁运的非洲国家发展军力的不足。2021 年，在美国禁止向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提供军事援助的情况下，俄罗斯与埃塞俄比亚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同年，俄罗斯与作为西方国家重要安全合作伙伴的尼日利亚签

① “Russia Emerges as Top Weapons Supplier to Sub-Saharan Africa”, ADF, April 21, 2023, https://adf-magazine.com/2023/04/russia-emerges-as-top-weapons-supplier-to-sub-saharan-africa/

② Elena Teslova, “Russia, Angola sign cooperation deals in Moscow, Angola interested in buying Russian S-400 missile defense system”, April 4, 2019, https://www.aa.com.tr/en/africa/russia-angola-sign-cooperation-deals-in-moscow/1442652

③ Власти Анголы хотят, чтобы Россия развивала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странами Африки. 24 октября 2019 г. https://ria.ru/20191024/1560186831.html

④ 卓振伟、武斌：“俄罗斯与非洲的军事合作：混合战争的视角”，《西亚非洲》，2023 年第 2 期，第 119 页。

⑤ E. Bonnier, J. Hedenskog,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Africa: A Survey of U.S. and Russi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Security Relations with Africa”, FOI, December 2020, p.4.

署了高级别的安全合作协议，并向其出售了 12 架米格-35 攻击直升机。尼日利亚驻俄罗斯大使史蒂夫·乌格巴（Steve Ugbah）表示，“鉴于俄罗斯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经验，我们相信，在俄罗斯的帮助下一定能够摧毁博科圣地组织。”[①]2022 年 2 月和 4 月，俄罗斯分别更新了与苏丹和喀麦隆的军事安全合作协议。[②]2019 年 11 月 24—30 日，俄罗斯、中国和南非首次举行三边海上联合演习，加强了俄罗斯与南非的军事合作关系。

通过私营军事安保公司参与非洲事务，是俄罗斯深度介入非洲安全局势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瓦格纳集团。俄罗斯利用雇佣军来实现政策目标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莫兰安全集团、斯拉夫军团等俄罗斯私人安保公司开始为在非洲大陆的俄罗斯商人提供安保服务。不过，俄罗斯系统性使用与政府有联系的私人安保公司始于 2014 年，当时俄罗斯因克里米亚危机遭到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③]在政府层面活动受限的俄罗斯转而重用私人安保公司，通过瓦格纳集团拓展在非业务和维护俄罗斯在非洲的利益。据悉，目前在非执行任务的瓦格纳集团约有 5000 人，其活动主要集中在中非、马里、苏丹和利比亚四个国家，在莫桑比克、南苏丹、马达加斯加、布基纳法索等国家也有合作项目。[④]在马里，军方领导层上台后放弃了寻求联合国和法国的支持，转而依靠瓦格纳集团，使该国的安全局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俄罗斯通过瓦格纳集团在非洲大陆的活动，获得了采矿、石油开采和天然气资源等合同。总体而言，俄罗斯私营安保公司的活动在由军队领导的政府或“世袭并依赖大规模租金开采自然资源”的政府统治的国家中更为成功。[⑤]据统计，瓦格纳、塞瓦安保服务、洛巴耶投资公司等俄罗斯

① “Nigeria looks to sign military cooperation deal with Russia this month”, Reuters, October 11,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ussia-nigeria-mili tary-idUSKBN1WQ20W/

② S. Daly, “Russia’s Influence in Africa, A Security Perspective”, *Atlantic Council*, February 2023, p.9.

③ Federica Saini Fasanotti, “Russia’s Wagner Group in Africa: Influence, Commercial Concessions, Rights Violations and Counterinsurgency Failure”, February 8, 2022, https: //www.brookings.edu/articles/russias-wagner-group-in-af rica-influence-commercial-concessi ons-rights-violations-and-counterinsurgency-failure/

④ William Rampe, “What Is Russia’s Wagner Group Doing in Africa?” May 23, 2023, https://www.cfr.org/in-brief/what-russias-wagner-group-doing-africa

⑤ Miłosz Bartosiewicz, “Controlled chaos: Russia’s Africa policy”, August 23, 2023, h 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23-08-23/controlled-chaos-russias-a frica-policy#_ftn7

安保公司在非洲为多达 31 个国家提供相关服务。[①]俄罗斯对私营安保公司的使用，使自己得以向非洲大陆进行标志性的“叙利亚模式”反叛乱行动，并且为莫斯科提供了在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沿岸国家重新确立大国地位的机会。[②]诸如瓦格纳集团等私营安保公司在苏丹、莫桑比克、中非、利比亚和马里的准军事与政治行动，是俄罗斯参与非洲事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鲜明特征之一。这表明，俄罗斯在非洲的安全政策是由一个集团网络来实施的，这些集团在法律上并不被承认为俄罗斯国家的一部分，但他们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却十分密切。[③]

三、“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的俄非关系发展前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同时，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更加密切。[④]美国和西方国家媒体大肆报道“全球南方”崛起，尽显拉拢之意，妄图利用“全球南方”分化发展中国家，使其充当大国竞争的工具。普京总统在第二届俄非峰会上强调，要“构建真正的多极世界秩序”，并肯定非洲大陆正在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且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呈“指数型增长”。[⑤]虽然受“全球南方”自身发展局限、俄罗斯自身实力不足以及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俄非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取得预期的突破性进展，但长远来看，俄非关系发展前景广阔，双方在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军事、安全、人文交流等众多领域都有长足发展的巨大空间。俄非还将在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致力于发挥“全球南方”团结一致合作解

① C. Weinbaum, M. Shostak, C. Sachs, J. V. Parachini, “Mapping Chinese and Russian Military and Security Exports to Africa”, RAND Corporation, 2022, pp.4.
② S. Gruzd, S. Ramani, C. Clifford, “Russia in Africa: Who is Courting whom?”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Vol.29, No.4, p.402.
③ K. Marten, “Russia’s Use of Semi-State Security Forces: The Case of the Wagner Group”, *Post-Soviet Affairs*, 2019, Vol.35, No.3, pp.181-204, 182, 193.
④ 张屹峰、开鑫：“新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面临新挑战”，《世界知识》，2023 年第 19 期，第 19 页。
⑤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пленарных сессиях второго саммита Россия – Африка, 28 июля 2023 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1826

决全球性挑战的巨大潜力。具体而言，北非地区作为俄罗斯的传统伙伴区，双方关系仍将稳步前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是俄罗斯今后重点耕耘的地区，双边关系发展大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性；俄罗斯在西非地区投入较少，未来可能会加大投入，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关系发展水平仍显滞后；东非及红海沿岸地区是俄罗斯与美西方国家博弈的重点地区，俄罗斯将投入更多资源寻求对北约南翼的战略牵制，以获得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非对称优势。

（一）“全球南方”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制约着俄非关系深入推进

发展是“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和崛起的根本动力。近年来，受逆全球化、俄乌冲突的外溢以及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多种影响，“全球南方”发展的外部环境受到严重冲击，使其发展有所受挫且增长势头放缓。据统计，2014 年以前，相比于“全球北方”，“全球南方”的经济增长率要高出 4.6%，但在 2015 年以后的五年间增长率却下降到了 2.3%，2021 年和 2022 年的经济增长率更是萎缩到 1.4%。[①]“全球南方”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并未成功转化为在相应国际机制中的制度性权力和制度性话语。金砖五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25.8%，但他们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仅为 14.06%、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仅占 14.15%。此外，“全球南方”内部发展不平衡，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较为迅速，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则相对落后。非洲、西亚的一些国家受美元高利率的影响，还出现了债务危机和金融动荡。[②]此外，“全球南方”还存在对外非对称性依赖大、自身抗干扰能力差、力量较为分散且难以整合、诉求广泛多元且难以统一、缺乏维护共同利益的机制化平台等缺陷。[③]加上 2020 年前后开始的系统性危机减缓了权力和资源从世界中心的“北方”向世界边缘的“南方”再分配的步伐，反而加强而非削弱了“全球南方”对“全球北方”的依赖。[④]外部环境危机的

① 江瑞平：“‘全球南方’：经济定位与战略取向”，《世界知识》，2023 年第 23 期，第 71 页。
② 于淼、田开元：“2023 年国际形势发展特征”，《人民论坛》，2023 年第 24 期，第 9 页。
③ 徐秀军、沈称：“‘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73-74 页。
④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Кризис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и глобальный Юг// Доклад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2020. №.59. p.6.

加剧和“全球南方”自身问题的难以消除，严重制约着俄非关系的长远发展。

（二）俄罗斯自身实力的削弱是俄非关系持久发展的潜在隐患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行了史无前例的制裁，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综合实力。虽然俄罗斯凭借自身的战略自主和出台针对性措施加以应对，经济摆脱了断崖式下跌的局面，但其内部和外部环境依然十分严峻。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乌克兰消耗甚至是拖垮俄罗斯的战略目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开宣称，“乌克兰战争大大削弱了俄罗斯的实力、利益和影响力”。[①]澳大利亚智库罗伊研究所发布的亚洲各国权力指数显示，俄罗斯在 2023 年总分下降了 1.4 分，跌幅为 4%。其中，外交影响力失分最多达 4.7 分，其次是国家韧性失分为 3.2 分，经济能力失分为 2.3 分，未来资源和网络防御失分均为 2.1 分，只有军事能力取得了 0.9 分的进步。[②]据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22 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2.1%，2023 年和 2024 年将分别增长 2.2%和 1.1%。[③]毫无疑问，俄乌冲突爆发使本已脆弱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地缘政治局势的高度紧张以及美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去风险化”等政策，使俄罗斯进一步远离世界经济中心，俄罗斯对非经济投入不足的短板今后或愈发明显。俄非问题专家塞缪尔·拉马尼（Samuel Ramani）就尖锐地指出：“虽然俄罗斯拥有大国地位的许多特征，但在非洲的地缘政治等级制度中仅处于第二梯队地位，这源于俄罗斯在非洲宣称的雄心与其实施雄心的能力之间的鸿沟正在不可阻挡地扩大。”[④]对俄罗斯来说，在“全球南方”大力推进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投入的资源能否满足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需要是一个极具考验的问题。这一点在非洲大陆将表现得更加直接和明显，事关未来俄非关系发展的全局。

① “Speech by Secretary Blinken: “Russia’s Strategic Failure and Ukraine’s Secure Future”, U.S. Embassy & Consulates in Russia, June 2, 2023, https://ru.usembassy.gov/secretary-blinken-russias-strategic-failure-and-ukraines-secure-future/

② “Asia Power Index 2023 Edition”, Lowye Institute, https://power.lowyinstitute.org/countries/russia/

③ “World Economic Outlook: Navigating Global Divergences”, IMF, October 2023, p.12.

④ R. Saamuel, *Russia in Africa: Resurgent Great Power or Bellicose Preten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2.

（三）战略竞争在非洲大陆趋于加剧，压缩俄非关系发展空间

非洲大陆作为最具发展潜力和争夺影响力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受到主要大国的重视。美国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接连发布对非战略，明确提出要遏制俄罗斯在非洲大陆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谴责俄罗斯“在非洲制造不稳定且采取破坏措施削弱美国与非洲人民及政府的关系。”[①]除了美法等西方大国在非洲拥有较为强大的影响力外，从 20 世纪末开始，日本就通过“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与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印度、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也开始发力对非外交，竞相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合作。面对传统强国和中等强国在非洲大陆的激烈竞争态势，俄罗斯在经济领域并不占有优势地位，对非军事安全合作和军售也因俄乌冲突的持续延宕而受到了严重影响。私营安保公司瓦格纳集团的分崩离析，使俄罗斯对非投入充满了不确定性。在人文交流领域，俄罗斯因历史上非洲国家曾派遣大批留学生赴苏联深造而积累了良好声誉。未来俄非人文交流与合作能否快速推进，取决于俄罗斯自身发展模式对非洲国家的吸引力以及美西方国家是否放弃“新殖民主义”式的对非洲政策。总之，俄罗斯对非洲优势领域如军事安全合作等因俄乌冲突爆发而饱受冲击，在自身不占优势的领域又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激烈排挤，如何开辟对非合作新领域成为未来俄非关系发展的当务之急和重要方向。

四、结　语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俄罗斯将多极化视为对“全球南方”外交的主要原则，并随着美国霸权的衰弱而更加自信地追求这一目标。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的短暂撤离后，21 世纪初俄罗斯“重返非洲”。普京总统第四任期开始后，更是加大力度推进俄非关系的发展。在双方的共同意愿下，俄非合作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形成了军事安全是基础、经贸合作是助推器的特有合作模式。“全球南方”的异军突起及其日益疏远美国和欧洲的外交政策倾向，也为俄罗斯继续深化对非合作提供了机遇，俄乌冲突爆发

① “U.S. Strategy toward Sub-Saharan Africa”, The White House, August, 2022, p.5.

后非洲国家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其不会孤立俄罗斯。[①]此外，非洲国家对俄罗斯有历史遗留下来的亲近感。俄罗斯学者安德烈·马斯洛夫和德米特里·苏斯洛夫（Дмитрий Суслов）就乐观地指出，因为“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将俄罗斯视为敌人、前殖民者或潜在的霸权威胁”，“俄罗斯在非洲的政策将取得突破性发展。”[②]

在俄罗斯具有优势的军事安全领域，随着瓦格纳集团创始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因飞机失事而意外身亡后，瓦格纳集团在非洲的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据俄罗斯新成立的媒体《非洲倡议》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将成立新的‘非洲军团’，以帮助非洲主权国家对抗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影响和加强俄非之间的平等合作”[③]。新机构将直接听命于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尤努斯-别克·叶夫库罗夫，他曾在 2023 年 9 月多次访问非洲友好国家。不难看出，一段时间内俄非关系的发展重点仍会聚焦于军事安全领域。需要指出的是，在对非关系上，俄罗斯“基于现实主义的合作”与原苏联的“援助模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虽然这种模式在非洲取得成果较慢，但它更有利于建立长期互利的关系。虽然俄罗斯在非洲大陆面临激烈的大国竞争局面，但俄罗斯也将利用自身的特有优势和基于俄非双方共同的战略诉求，通过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双边合作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和非洲联盟进行更深入的对接，从而更好地助推自身和“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未来十年，俄罗斯将通过反叛乱行动、武器销售、技术输出，并与媒体宣传、教育外交、债务减免、人道主义援助等软实力工具等相结合，努力争取成为对非洲国家更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① R. Saamuel, *Russia in Africa: Resurgent Great Power or Bellicose Preten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198.
② Маслов А. А., Суслов Д В.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в Африку: как сделать его российским приоритетом//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22. №.1. С.131-132.
③ Маршруты Африканского корпуса. Зачем Россия расширяет военное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в Африке. 22 ноября 2023 г. https://dzen.ru/a/ZVzcScSfzjvDkyq Z?experiment=948515

【**Abstract**】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lobal South” for Russia has increasingly come to the fore. A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South”, African countries quickly became a focal point for Russia’s foreign strategy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inaugural Russia-Africa Summit in 2019,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Africa deepened, diplomatic support strengthened, and although trade and investment growth were slow, the trade structure improved gradually, with security cooperation also continuously exp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Africa has been heating up and deepening, influenced both by internal factors such as Russia’s meeting its own developmental needs, avoiding external sanctions, and promoting a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broad, and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leading to a reorgan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Africa relations is currently constrained by the inherent flaws of the “Global South”, Russia’s own lack of capacity, and intense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in Africa, making breakthrough results difficult in the short term, in the long run, as the “Global South” continues to overcome its developmental constraints, Russia persists with it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of “looking East and South”, and its newly established “African Legion” strengthens its military investments in Africa, this will lay a new foundation and provide new guarantee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Africa “special relationship model”.

【**Key Words**】“Global South”, Russia’s Strategic Adjustment, “Going East and South”, Russia-Africa Relationship, “Russia-Africa Special Relationship Model”

【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ажность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для России стала всё более очевидной. Будучи важной частью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Юга», африканские страны сразу же оказались в центре внешне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и. После первого

саммита Россия-Африка в 2019 году российско-африкан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было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ировано, взаимная поддержка в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усилилась, торговля и инвестиции росли медленно, но структура торговл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оптимизировалась, 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сширяться. Российско-аф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одолжают теплеть и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вглубь, на что влияют как внутренние факторы, такие как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обеспечить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потреб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уклонение от внешних санкций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её внешней стратегии, так и внешние факторы, такие как ре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из-за усиления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Хотя на нынешне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африка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лияют различные факторы, такие как присущие «глобальному Югу» недостатки, недостаток сил у самой России и жёсткая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в Африке, добиться прорыв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в данном вопросе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сложно. Однако в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оскольку «глобальный Юг» продолжает преодолевать узкие места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я придерживаетс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движения на восток и юг», и её новый «Африканский корпус» продолжает увеличить свои воен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Африку, что закладывает новую основу и гарантии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модели особ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Африко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Глобальный Юг»,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России «по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и Юг», российско-аф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особая модель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Африкой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宋国新**

【内容提要】俄乌冲突已经成为 21 世纪最为严重的全球安全危机，强烈冲击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美国主导的北约持续东扩和乌克兰加速倒向西方，加剧了欧洲地缘政治博弈和安全环境的恶化，最终形成了强度高、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俄乌冲突，导致全球安全治理的需求急剧增加。与此同时，俄乌冲突更加凸显了全球安全治理理念滞后、组织权威性下降和机制运行失常，加上大国权力竞争加剧、世界各国安全利益加速分化、全球安全治理共识削弱，致使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失灵，因而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变得更加迫切。因此，世界各国需要共同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创新、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组织网络、建立更为全面和有深度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确保俄乌冲突可控和维护世界整体和平稳定；通过不断增强全球安全治理共识、实现全球安全治理中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均衡，促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自我优化，以适应俄乌冲突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安全环境。

【关键词】俄乌冲突　乌克兰危机　全球安全治理　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2-0146(23)

全球安全治理是一种在缺少中央权威的情况下，由多种行为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制度规则来共同协商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一种行为。[①]本质上是一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带一路’沿线海外利益安全保护机制的供需困境与创新研究”（项目批准号：23CGJ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 宋国新，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① See E. Krahmann,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2003, Vol.38, No.1, pp.5-6; M. Webber, S. Croft, J. Howorth, et al, “The Governance of European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4, Vol.30, No.1, pp.3-4.

个如何在全球空间中通过多元主体合作来供给全球安全公共产品的问题。[①]受到主权敏感、互信缺失、大国竞争、制度低效等的制约，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仍很不完善，各行为体之间并没有实现平等的双向互动，双方的相互制衡与补充也就打了一个大的折扣。随着全球安全威胁性质的变化、[②]安全危机的急剧扩散化和安全形势的日益复杂化与不确定性增强，加上大国竞争加剧、国家中心主义回归和西方安全治理缺位，以国家为中心和以霸权模式为主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出现了过载和失灵。当前，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安全治理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致使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变得更加紧迫。[③]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安全治理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但是，俄乌冲突与全球安全治理间具有怎样的因果关系以及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如何突破等重要研究议题尚待学界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一、体系过载：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安全治理的需求大增

美国主导北约的持续东扩和乌克兰加速倒向西方，恶化了俄罗斯周边的安全环境，最终造成了俄乌冲突的悲剧。同时，美欧乌与俄罗斯围绕俄乌冲突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舆论战，进一步加剧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分裂与冲突。受此影响，俄乌冲突直接产生或衍生了大量安全问题，导致全球安全治理需求大幅增加及其体系过载。

（一）俄乌冲突爆发的原因及表现

美国主导北约的持续东扩为俄乌冲突埋下了隐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北约集团一直将俄罗斯（苏联）视为异类和主要安全威胁，以此强化排俄安全联盟，致使俄罗斯长期心存不安全感。相应地，俄罗斯多次使用武力来消除相关安全威胁，以确保自身安全利益不受侵犯，又让美欧产生了极度恐惧

① 尹纪武、李月军主编：《全球安全、冲突及其治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第6页。
② 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6页。
③ 肖晞、宋国新：“百年变局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需求与中国作为”，《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4期，第24页。

和危机感。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北约成为俄罗斯的首要安全威胁，俄美、俄欧陷入了安全威胁认知的敌对状态，形成了对立冲突的安全目标和针锋相对的安全维护手段。美国学者索尔·科恩曾警告，北约接纳乌克兰将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错误，不仅会使乌克兰的领土完整面临风险，而且会加重俄罗斯对西方的敌对态度。[①]因为，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②]但是，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并不想接纳俄罗斯，“1999 年至 2022 年先后 5 次东扩，成员国从 16 个增加到 30 个，向东推进 1000 多公里，直抵俄罗斯边境”[③]。这极大压缩了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也将俄罗斯逼入退无可退的墙角。尤其是北约重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既定方针后，地缘政治空间被极度挤压的俄罗斯不安全感骤升，战略忍耐性也因此丧失。可以说，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西方长期以来矛盾尖锐化的总爆发，[④]是“心脏地带”陆权力量与“边缘地带”海权力量两大板块相互挤压和对撞的结果，位于“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结合部的乌克兰因此沦为大国地缘政治争斗的牺牲品。[⑤]

乌克兰倒向西方加速了俄乌冲突的爆发。俄乌冲突是典型的大国影响下的主权国家地缘战略选择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问题。[⑥]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一直面临“向东走”和“向西走”的地缘政治困境。2013 年 11 月，乌克兰政府宣布与欧盟暂停签署联系国协定。在西方的鼓动下，乌克兰紧接着爆发了“广场革命”，国会随即通过表决罢免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总统职务，乌克兰加速倒向西方，反俄政策日趋极端化。[⑦]进入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和

① ［美］索尔·科恩著：“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年，第 255 页。
②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 年，第 39 页。
③ 张博岚：“北约对全球和平与合作构成威胁”，《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26 日第 14 版。
④ 赵隆、刘军、丁纯等：“俄乌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笔谈”，《国际展望》，2022 年第 3 期，第 63 页。
⑤ 杜德斌、易鑫磊、马亚华等：“‘心脏地带’理论与俄乌冲突”，《世界地理研究》，2022 年第 4 期，第 673 页。
⑥ 崔守军、杨宇：“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的地缘政治渊源与地缘战略逻辑”，《地理研究》，2022 年第 8 期，第 2066 页。
⑦ 刘旻玮、李佳鹏：“回溯性求偿与国际战争的诱发”，《国际安全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92 页。

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对欧洲的意义是确定了欧洲人主导的“新凡尔赛体制”东扩的极限和边界，也意味着俄国反击欧洲东扩的历史真正开始了。[①]“八国集团”的中止、俄罗斯和北约理事会停止沟通以及俄罗斯代表权被欧洲委员会暂停，导致“北约组织、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机制被阉割”，[②]为俄乌冲突埋下了伏笔。2021 年 5 月，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分界线再次竖立起来并像战壕一样不断东移。[③]2021 年底，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步伐加快，俄罗斯在多次警告美国和北约停止东扩无效后，俄乌关系骤然紧张。2022 年 2 月中下旬，俄罗斯对乌东部顿巴斯地区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并对乌克兰境内“军事化”和“纳粹化”目标实施军事打击。此举的目的是，防止北约继续东扩、保护乌克兰俄罗斯人安全、确保乌克兰中立化与非军事化、应对西方对俄罗斯主权的威胁。[④]此后，俄乌冲突先后经历了开战初期的俄攻乌守、美西方支持下的乌反攻俄守、俄乌双方进入战略相持、巴以冲突后俄攻乌守四个阶段。随着 2023 年底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导弹和火炮频繁攻击俄罗斯本土，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持续进行大规模空袭，俄乌冲突再次恶化。

俄乌冲突的爆发表明，地缘政治博弈再次回归欧洲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第一，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迅速联合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发动代理人战争，试图大发战争财和拖垮俄罗斯。同时，美国联合西方国家以外交、经济和舆论等手段对俄罗斯发动混合战，大有围剿俄罗斯之势。第二，欧洲起初对俄乌冲突束手无策，随即在安全问题上更加倚靠美国，跟随美国全面制裁俄罗斯。同时，俄乌冲突加剧了俄欧的对立，再次增强了北约的团结，促使欧洲诸国加紧提升自身的防务能力。例如，俄乌冲突对德国安全观形成了强烈冲击，也发挥了倒逼德国加快安全政策调整的作

① 张文木：“乌克兰事件的世界意义及其对中国的警示”，《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3 页。

② Лавров заявил о разрушении Евросоюзом всех механизмо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15 февраля 2021 г. https://www.rbc.ru/politics/15/02/2021/602a5a239a7947b53364901f?ysclid=lihx8z0jtf635116777

③ Европа возводит окопы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Россией, заявил Лавров. 31 мая 2021 г. https://ria.ru/20210531/lavrov-1734893673.html?ysclid=lihxqdcssc674615596

④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4 февраля 2022 г.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43

用。[①]同时，西方内部安全关系的这些巨大变化将对外围安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②]第三，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很多潜在对手谋求分裂整个“俄罗斯世界”。[③]在美西方重压之下，俄罗斯的传统精神与道德价值观再次复兴，强调要尊重俄罗斯历史。[④]因此，俄罗斯更加难以接受美西方对乌克兰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安排和西方化的乌克兰，要求重建历史记忆中的“俄罗斯世界”。第四，美欧与俄罗斯对抗成为欧洲安全的新常态，并试图胁迫其他国家共同制裁、绞杀俄罗斯，在世界制造分裂和对抗。第五，在欧洲，大国核对抗和核战争风险上升。二战后，核武器的出现与随之而来的“恐怖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可能。[⑤]但是，俄乌冲突放大了大国军事冲突和核战争爆发的风险，增加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给世界局势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二）俄乌冲突衍生出大量安全问题

俄乌危机牵动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折射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深度调整，[⑥]世界进入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危机状态，导致全球安全不确定性迅速上升。[⑦]到 2024 年 4 月，俄乌冲突已持续两年有余，虽然主要局限在俄乌两国和欧洲范围，但随着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全面持续“围剿”，冲突本身和制裁、反制裁开始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和敌意与对抗的螺旋上升，必将衍生出大量复合型安全问题。总之，俄乌冲突推动了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复合型安全问题的相互转化，引发

① 李超：“俄乌冲突下的德国安全政策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22 年第 6 期，第 60 页。

② Buzan B,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1991, Vol.67, No.3, pp.431.

③ Путин: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й противник России всегда пытался разделить русский мир. 22 декабря 2022 г. https://ria.ru/20221222/mir-1840658283.html

④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1.12.2015 г. №683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0391/page/1

⑤ 田文林：“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的时代价值”，《当代世界》，2022 年第 5 期，第 27 页。

⑥ 王战、李永全、姜锋等：“俄乌冲突、全球政治经济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25 页。

⑦ 巴殿君、吴昊、廉晓梅等：“‘俄乌冲突与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新变化’笔谈”，《东北亚论坛》，2022 年第 4 期，第 3 页。

了一系列全球危机，增加了对全球安全治理的需求。

1. 舆论战加剧了俄乌冲突和涉事国的对立情绪与行为。随着国际传播技术和媒介的发展，加上全球安全问题本身的舆论敏感性，其安全效应更易被非线性放大，影响着全球安全治理的需求程度。

首先，俄乌双方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舆论战。双方围绕冲突的正义性、最新战况、战损情况、平民伤亡、总统媒介形象和冲突承受力等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相互抹黑指责对方，强调自身所具有的正义性、合法性。两国媒体使用煽动性话语进行冲突动员、量身打造有利于本国的冲突文本和议题，促使本国民众和国际受众产生共情，通过主导冲突话语权来威慑和压制对方。两国舆论战导致俄乌冲突的相关信息爆炸性增长、真假难辨，虽未改变冲突走势，但却加剧了两国民众之间的仇恨和世界各国的认知分裂与冲突，恶化了欧洲乃至世界安全环境。

其次，外场舆论战成为俄乌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社会围绕“挺俄”还是“挺乌”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与争夺。一是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公开声援乌克兰，强烈谴责俄罗斯的大规模入侵行为。另外，西方各类社交媒体对俄战争政策、总统普京及其战争策划与执行者提出强烈的质疑与批评，营造反俄舆论，全面支持乌克兰。受此影响，欧洲反俄、挺乌的民意极速累积爆发并成为各国政治正确，强烈的民意已开始左右欧洲各国的政治决策。二是欧美舆论场对中国舆论场的负面声音进行了放大甚至有所伪造，[①]呼吁中国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抛弃俄罗斯，[②]随后不断造谣中国对俄乌冲突事前知情、对俄进行了军事援助，试图编造“俄中轴心说”和“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将中俄进行战略捆绑，并以此为借口联合整个西方力量打压中俄。三是美日不断渲染俄乌冲突向外溢出风险，在东亚地区制造紧张局势，趁机推动建立“印太版北约”，进而全面围堵和遏制中国。美欧日各方关于俄乌冲突的舆论争夺体现了零和博弈的“损人利己”，西方国家也借此进一步掌控了地缘政治主导权和话语权。随着社交媒体不断强化俄罗

① 沈阳：“俄乌冲突观察：战斗域的单向透明+舆论场的单向遮蔽”，《传媒观察》，2022 年第 4 期，第 1 页。

② 左希迎：“美国外交政策的危机及其根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 年第 3 期，第 42 页。

斯与乌克兰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认知矛盾，放大彼此的敌对情绪，推动和平进程将更加艰难。[①]

2. 俄乌冲突导致大量传统安全问题再次凸显。第一，世界掀起军事化热潮。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和北约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其中既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还包括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培训乌克兰作战人员。[②]另外，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开始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开支、重振军备，日本同样趁机强化军备并试图在东亚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第二，核战争风险增加。面对西方的步步紧逼，俄罗斯官方表明使用核武器的四个条件，加剧了世界核战争风险。另外，俄乌冲突更加刺激了一些国家开始考虑拥核，致使核不扩散体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脆弱。第三，欧洲陷入新的安全困局。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美关系的持续恶化将给国际秩序、地缘政治、欧洲安全等带来更大变数和严重的负面影响。[③]同时，欧洲多数国家加速意识形态化、军事化和大西洋化，使得俄欧陷入了“新冷战”。第四，亚太地区安全局势更加紧张。美国试图将中俄进行“战略捆绑”，同时打造“反俄同盟”和“反华同盟”，把欧洲战争的祸水引向亚太地区。同时，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地区的扩张给中国周边带来诸多挑战，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合作与发展。[④]

3. 俄乌冲突致使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出现。大国博弈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科技、贸易、金融、能源、粮食、贵金属以及产业链等多领域的综合较量。[⑤]俄乌冲突以及西方对俄的混合战（包括金融战、科技战、舆论战、信息战等），加剧了全球化和非军事力量的武器化，形成了粮食安

① 刘军：“社交媒体对俄乌冲突的影响分析”，《人民论坛》，2022 年第 13 期，第 108 页。

② Спикер: конгресс США не рассмотрит пакет с помощью Киеву без мер по границе. https://ria.ru/20240213/ssha-1926982552.html

③ 张建：“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俄美关系及其前景”，《和平与发展》，2022 年第 3 期，第 23 页。

④ 门镜：“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的扩张和对中国的影响”，《俄罗斯研究》，2023 年第 6 期，第 70 页。

⑤ 参见胡子南：“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及中国的策略”，《亚太经济》，2022 年第 4 期，第 18–24 页；S. Umer, S. M. Kamel, T. Sunil, N. Joanna; N. Renata, “Connectedness between geopolitical risk, financial instability indices and precious metals markets: Novel findings from Russia Ukraine conflict perspective”, *Resources Policy*, 2023, Vol.80, pp.1-2.

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战略性原材料安全、战争难民等问题，严重恶化了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形势。同时，俄罗斯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经济的耐受力和民众的容忍度，以及一系列反制裁的措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对冲了西方制裁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相关的反制裁行动很可能会产生“回旋镖效应”，对西方造成不利影响。[①]具体而言，俄乌冲突干扰了全球贸易的正常流动，排俄与不排俄的贸易阵营正在形成，迟滞了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西方对俄能源制裁，扰乱了全球能源市场，加剧了全球能源短缺和价格波动；俄乌都是粮食出口大国，战争导致乌克兰农田荒废和存粮无法向外运输，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战争摧毁了乌克兰大量工业设施，加上对俄的全面制裁，导致零部件和原材料短缺，破坏了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完整。受此影响，多国通胀压力飙升，一些欧洲发达国家和经济基础本就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遭受严重冲击，世界发展与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二、体系失灵：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安全治理陷入困境

俄乌冲突的高强度、大规模、长期化，强烈冲击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此背景下，全球安全治理理念的冲突加剧、国际组织权威性遭到削弱和全球安全治理机制难以正常运行，致使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失灵。加上大国竞争加剧、世界各国安全利益加速分化以及全球安全治理共识被削弱，使得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难以修复。在此情势下，全球安全治理陷入困境。

（一）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遭受强烈冲击

重大国际安全问题的强度、规模和持续时间不仅影响着全球安全治理的需求，还决定着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遭受冲击的程度。因此，俄乌冲突具有强度高、规模大和长期化三大特点，不仅增加了全球安全治理需求，也加速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失灵。

俄乌冲突具有强度高的特点。俄乌冲突是冷战后地缘政治博弈的延续和结果，从科索沃战争、格鲁吉亚战争到俄乌冲突，都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① 刘军梅：“俄乌冲突背景下极限制裁的作用机制与俄罗斯反制的对冲逻辑”，《俄罗斯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62 页。

后欧亚地区秩序调整的一个又一个节点，是以战争方式来解决地区安全秩序的安排，进而塑造新的地区安全架构。[①]首先，俄乌冲突爆发后，双方动用了大批量、多类型的导弹、战机、军舰、坦克、大炮等重武器，造成大量军人和平民伤亡，经济损失更是难以计算。其次，美欧在对俄制裁和对乌经济与军事援助问题上空前团结，一时间西方与俄罗斯陷入全面“脱钩”和对抗困局，致使欧洲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陡增。再次，俄罗斯多次以威胁动用核武器来阻遏美英、北约参战和对乌克兰军援规模，使得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恐惧之中。另外，俄乌冲突给国际核军控和裁军带来了诸多挑战，包括有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无核武器国家境内核设施遭到破坏、更多无核武器国家跨越核门槛、国际核军控和裁军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有核武器国家进一步提升核军备等五种可能发生的情形。[②]短期来看，俄乌冲突并不会导致战后国际秩序的崩塌，但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失序可能常态化，[③]急剧恶化了欧洲的安全环境。

俄乌冲突具有规模大的特点。俄罗斯调动海陆空天网多军种数十万人参战，动用了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多种重量级常规武器，战争波及乌克兰大部分领土，先后有 1500 多万乌克兰人沦为难民，军民死伤还在不断增加。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迅速联合北约成员国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发动代理人战争，试图大发战争财和拖垮俄罗斯。同时，美国联合西方国家以外交、经济和舆论等手段对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使得俄乌冲突迅速波及全球。而欧洲起初对俄乌冲突束手无策，随即在安全问题上更加倚靠美国，跟随美国全面制裁俄罗斯。俄乌冲突加剧了俄欧的对立，再次增强了北约的团结，促使欧洲诸国加紧提升自身的防务能力。另外，欧洲多数国家加速意识形态化、军事化和大西洋化，使得俄欧陷入了“新冷战”。美欧与俄罗斯对抗成为欧洲安全的新常态，并试图胁迫其他国家共同制裁、绞杀

① 王林聪：“从俄乌冲突看全球安全治理困境及出路”，《西亚非洲》，2022 年第 4 期，第 23–24 页。
② 吴莼思：“俄乌冲突对国际核军控和裁军的影响”，《国际展望》，2022 年第 3 期，第 22 页。
③ 赵隆：“化解俄乌冲突需要新的欧洲安全框架”，《当代世界》，2022 年第 3 期，第 63 页。

俄罗斯，在世界制造分裂和对抗。俄乌冲突放大了大国军事冲突和核战争爆发的风险，增加了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给世界局势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美国借俄乌冲突之机，强化美韩、美日、美澳、美日韩、美日澳等双边、多边同盟和伙伴关系，借机在南海、台海、朝鲜半岛等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恶化了中美关系和东亚安全局势。此外，俄乌冲突已经由传统安全问题向非传统安全问题、复合安全问题扩展，大国冲突、集团对抗、金融战、舆论战、恐怖主义袭击、难民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频发，严重恶化了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形势。

俄乌冲突具有长期化的特点。俄乌冲突既是一场欧洲地区的军事冲突，也是东西方冷战对峙的一种延续。面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乌克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开启了长期的领土争夺战。美欧和北约加强了对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提升了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和信心，使俄乌冲突持续至今。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在 2024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我们不能允许俄罗斯继续削弱欧洲安全，需要打破俄罗斯侵略欧洲国家的循环。因此，我们要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的不仅是道德上的正确做法，这符合我们自己的安全利益”。[①]与此同时，俄罗斯在情报收集与战场感知能力方面依然存在明显不足，在沟通和协调以及侦察和目标锁定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数字化体系的落后拖累了俄罗斯常规战的优势。[②]加上俄罗斯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在短时间内取胜，其速战速决的作战目标落空，但其更难接受在乌克兰境内的军事行动失败。因此，即使有西方国家的支持，乌克兰也无法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③]俄乌冲突以及美西方与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开始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和敌意与对抗的螺旋上升，导致俄乌冲突更加复杂和难以调和。同时，俄乌双方、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舆论战愈演愈烈，加剧了俄乌、俄美、俄欧民众间的认知矛盾和敌对情绪。加之乌克兰拒绝与

① GT: Столтенберг послал сигнал, что НАТО продолжит затягивать конфликт на Украине. 12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ria.ru/20240212/stoltenberg-1926912270.html

② См.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сетецентр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 и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на Украин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8 февраля 2023 г. http://topwar.ru/211525-sovremennaja-setecentricheskaja-vojna-i-voennaja-operacija-na-ukraine.html?ysclid=lnbfawolm0127210484

③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Session ‘Beyond the Alliance: Partnering up for European Security’” NATO, February 18,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pinions_212041.htm

俄罗斯谈判，以及乌克兰军事冲突为美国和英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军事工业订单的前景，[①]致使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和解的阻力增加。可见，当前俄乌局势仍不明朗，最终还取决于俄乌军事角力以及美俄、俄欧等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结果，而俄乌冲突也将长期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安全局势的走向。

（二）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失灵的表现

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主要由安全治理理念、安全治理机构和安全治理机制三要素组成，全球安全治理能力主要取决于三要素是否完整和实现最优组合。在俄乌冲突的强烈冲击下，全球安全治理理念的冲突加剧，国际组织权威性遭到削弱，全球安全治理机制难以正常运行，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失灵。

1. 全球安全治理理念的冲突加剧。安全战略思维决定安全战略选择，安全战略选择决定安全战略举措，安全战略举措影响安全态势变化。[②]百年变局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美西方的战略思维变得进攻性十足，冷战思维再次被唤醒，东西方矛盾被放大激化，大国对抗的风险增加。同时，美西方很多国家由倡导共赢理念转向鼓吹零和博弈思维，加速了全球安全治理理念的偏离。北约集团掀起了非理性的“反俄风暴”，对俄制裁无所不用其极。美西方仍然沉醉于对苏冷战“全胜”的情景，只在乎如何拖垮俄罗斯，根本不关心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此外，俄罗斯的安全感急剧下降，与美国陷入了“霍布斯文化”的敌对困局之中，加速了两国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向对立和排斥对方的方向转变。俄罗斯与西方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战略博弈将更加激烈，新旧安全观可能受到集团政治、阵营对抗的剧烈挤压。[③]美俄、俄欧敌对认知的螺旋上升，无疑会加剧全球安全治理理念与方式的冲突。

2. 国际组织的权威性遭到削弱。首先，在俄乌冲突爆发与发展的过程中，联合国的调停能力被极大地弱化了。冷战后，联合国安理会一直是全球安全治理合作的重要平台，大国多次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重大传统和非传统

① Нургалиев: англосаксы разрушают Украину, чтобы фирмы Запада ее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ли. 12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ria.ru/20240212/ukraina-1926776391.html

② 刘强：“当今国际军事安全的重大问题及其深远影响”，《思想理论战线》，2022 年第 2 期，第 88 页。

③ 赵隆：“化解俄乌冲突需要新的欧洲安全框架”，《当代世界》，2022 年第 3 期，第 63 页。

安全问题。但是，联合国未能制止俄乌冲突的爆发，安理会成为美俄欧各方竞争的场域，联合国权威受到严重损害。[①]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没有解决当前乌克兰冲突热点阶段的工具。[②]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反对持续东扩，必然会加剧欧洲地缘政治的冲突和安全局势的紧张，破坏欧洲的战略稳定。从这一角度来看，北约的存在带来了更多的问题。[③]另外，美日等国正在筹建“印太版北约”，加速了北约向全球扩张，使其成为美国争霸的工具，导致亚太乃至全球军事对抗与冲突的风险陡增。其次，欧洲地区安全组织的调停能力减弱。例如，集安组织内部的分歧加大，部分成员国表示不会介入俄乌冲突。同时，俄乌冲突暴露了欧盟在维护欧洲安全上的力量局限，欧洲沦为美俄角力场。再次，国际法院的约束力不足。由于《国际法院规约》和《国际法院规则》未对不执行临时措施的后果予以明确，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保障本案临时措施实施不具有可行性，国际法院不存在执行机制也直接影响执行效果，国际法院的职责定位导致其难以解决引发俄乌冲突的本质争议。[④]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多边机构甚至日益变为大国博弈场。俄乌冲突加剧了多边机构中力量格局与权力分配的失衡，加上美西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高涨，已经难以有效治理突发、高威胁的国际安全问题。

3. 全球安全治理机制难以正常运行。首先，大国协调机制失灵。受俄乌冲突影响，美俄、俄欧、俄日关系交恶，中美、中欧、中日关系紧张，美国在欧洲、亚太地区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和冲突，恶化了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形势。大国协调转向对抗，削弱了全球安全治理效能，难以有效管控日益增多的国际矛盾、冲突和危机。其次，多边合作机制向集团对抗转变。受俄乌冲突影响，欧洲深刻认识到以合作求和平、以规则输出对俄约束和以发展模

① 赵明昊：“俄乌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论析”，《和平与发展》，2022 年第 3 期，第 7 页。

② Полянский: у ООН нет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для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на Украине. 12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ria.ru/20240212/konflikt-1926783198.html

③ 任彦：“北约几乎染指了所有的战争和冲突”，《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25 日第 16 版。

④ 张琪悦：“国际法院针对俄乌冲突‘防止争端加剧’临时措施分析”，《国际展望》，2022 年第 4 期，第 114-131 页。

式扩展促俄转型的安全路径根本走不通。美国借机以“俄罗斯威胁”为由加速调整跨大西洋关系，试图“孤俄控欧”，并联合西方国家极力阻止俄罗斯参与多边合作机制，在全球拉帮结派搞对抗。[①]另外，美国鲁莽地推动“北约东扩”，招致地缘政治威胁，还拒绝承担造成地区不稳定和人道主义灾难的责任。[②]作为国际权势转移的结果，国际多边机制由于未能跟上变革的步伐，正呈现多重危机。[③]总体而言，中美、美俄、俄欧在全球安全治理方式上的较量将会更加复杂激烈，通过大国协调和多边机制合作来解决俄乌冲突仍面临诸多挑战。

（三）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失灵的原因

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修复和优化，主要取决于大国协调、世界各国安全利益融合和安全治理共识等情况，关乎全球安全治理能否实现和有成效。在百年变局大背景下，大国竞争加剧，世界各国安全利益加速分化，全球安全治理共识被削弱，导致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难以修复。

1. 大国权力竞争加剧。俄乌冲突已经成为影响百年变局走向的重要因素，正在深刻改变和重塑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格局与秩序。大国在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④]当一个不稳定的和衰落的大国想维护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并且优势还在自己一方时，它就会突然卷入战争。[⑤]美国为确保其在亚欧大陆的霸权，不惜通过俄乌冲突来削弱和遏制中俄这两个主要挑战者。一方面，美国借机拉紧欧洲，联合西方国家迫使其他

① See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nnouncing Response to Russian Actions in Ukraine”,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2,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22/remarks-by-president-biden-announcing-response-to-russian-actions-in-ukraine/; “Fact She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G7 to Take Further Action to Support Ukraine and Hol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ccountable”, The White House, June 27,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6/27/fact-sheet-the-united-states-and-g7-to-take-further-action-to-support-ukraine-and-hold-the-russian-federation-accountable/

② 倪峰、达巍、冯仲平等：“俄乌冲突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2 年第 3 期，第 43 页。

③ 金玲：“欧盟对外战略转型与中欧关系重塑”，《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 年第 4 期，第 34 页。

④［英］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前言第 XIX 页。

⑤［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84 页。

国家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以极限削弱俄罗斯。另一方面，借机加快北约东扩和建立“印太版北约”，利用北约和欧洲的力量来围堵遏制中国。美国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它企图通过升级乌克兰危机来削弱他国实力，以巩固自身的地缘政治霸权。[①]同时，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组织原本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俄乌冲突却成了北约显示其存在必要性的机会。[②]此外，俄乌冲突加剧了大国军事竞争与对抗，加速世界格局演变和多极化趋势，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秩序根基出现了动摇。美国转向大国权力竞争，加速从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转变为破坏者，俄罗斯、欧洲、印度、日本、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或主动、或被动卷入其中，使得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变得更加艰难。

2. 世界各国安全利益加速分化。战争的长期化实质上就是主要涉事方没有就利益分配达成一致，导致大国很难在全球安全问题上进行治理合作。俄罗斯想通过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来迫使北约停止东扩、维护国家安全，但美西方却试图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强化对乌克兰的控制、打败俄罗斯和维护西方霸权。其中，美国政府官员、军工企业和国会议员则从中各取所需，赚得“盆满钵满”。[③]西方国家不顾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强行让他们选边站队，但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对此都予以拒绝。美国试图将俄乌冲突的祸水东引，以“维护共同的价值观”为借口，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国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挑动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对抗中国，这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中国周边乃至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同时，欧盟因俄乌冲突将俄罗斯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欧洲各国对俄产生空前的敌意，对俄政策多由接触转为孤立和对抗，试图利用冲突、制裁、孤立、分化来拖垮俄罗斯或迫使其发生政权更迭，致使俄欧安全利益冲突长期化。此外，北约紧随美国围殴、削弱俄罗斯的政策，大力军援乌克兰，加强对俄军事威

① 李志伟、张朋辉：《越来越多国际舆论和有识之士指出，美政府应该对俄乌冲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美国当前的做法无助于结束乌克兰危机》，《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12 日第 17 版。

② 赵隆、刘军、丁纯等：“俄乌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笔谈”，《国际展望》，2022 年第 3 期，第 66 页。

③ 李志伟：“美对俄乌冲突拱火浇油背后是自私的利益盘算，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指出——‘美国在拱别人的火，算自己的账’”，《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5 日第 15 版。

慑与对抗，损害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俄乌冲突导致各国安全利益加速分化，削弱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修复能力。

3. 全球安全治理的共识被削弱。美国借俄乌冲突加强了对欧洲的控制，并通过渲染“俄罗斯威胁”来激活欧洲的“恐俄症”。同时，美国展现出俄乌冲突下仍将锚定“印太”地区的战略决心，以“捆绑中俄”策略推升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威胁”的认知。[①]在此情势下，美俄战略互信全无，西方与俄罗斯间的敌我意识空前增强，中美战略互信大幅下降，全球安全治理共识遭到削弱。

第一，维护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共识遭受冲击。各种国际力量以排他性安全、价值观对立为标志的“准阵营化”重组，将导致有关重返“雅尔塔”或回归“维也纳”的秩序重塑辩论更为激烈，大国间有关安全观、秩序观、价值观的认知鸿沟更加凸显。[②]

第二，东西方价值观冲突增多。俄乌冲突为美国有效消除与欧洲利益的偏离与冲突、战略的疏离和认同的弱化提供了契机；放大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与冲突，又促使东西方安全的恶性竞争开始取代南北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三，中小国家面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选边站队的压力。百年变局不断激发大国运用军事力量和手段来重塑有利于自身的地缘政治环境，而俄乌冲突则极大压缩了中小国家在大国互动中可回旋的“灰色空间”，被迫卷入意识形态对抗或价值观结盟的漩涡之中。俄乌冲突使国际社会更加意识到，欧洲尚未建立起全面有效的安全构架，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修复能力大幅减弱，世界安全秩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三、体系变革：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破解

俄乌冲突加速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期，凸显了全球安全治理困境。世界各国应以推动全球安全治理变革为方向，以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和增强全

① 赵明昊：“俄乌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论析”，《和平与发展》，2022 年第 3 期，第 9 页。
② 赵隆、刘军、丁纯等：“俄乌冲突与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笔谈”，《国际展望》，2022 年第 3 期，第 61 页。

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自组织演化能力为着力点，积极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

（一）加快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

俄乌冲突表明，传统安全问题仍然威胁着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宁，全面有效的欧洲安全构架并没有建立起来，[①]解决欧洲安全治理中的分歧是一件长期的事情。[②]与此同时，俄乌冲突使得全球安全治理理念滞后、组织权威性下降以及机制运行失常等问题更加凸显，而这些结构功能的弱化又加剧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过载与失灵。因此，世界各国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1. 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理念创新。首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安全治理目标。世界需要构建一种适应现代安全风险社会的共同认知与价值共契，以增强共同安全利益和责任意识，弥合各方安全治理目标存在的差异，合力应对俄乌冲突及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其次，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安全治理原则。以共商凝聚俄乌冲突各方共识，以共建促进俄乌冲突化解，以共享来实现欧洲乃至全世界和平。在此基础上，重新制定一整套制度规范，确保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有序运行。最后，倡导全球安全倡议，超越西方的冷战思维。全球化时代，重大安全问题的全球性影响日益增强，各国安全密切相关、难以分割。这表明应尊重、保障俄乌冲突各方安全，实现自身和他国的共同安全；厘清俄乌冲突所涉及的历史经纬和所面临的现实情况，通过治理实现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综合安全；通过对话来加强俄美、俄乌、俄欧等行为体间的战略沟通，增强俄乌冲突各方安全战略互信，以安全治理合作来促和平、保安全；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加快结束俄乌冲突，为世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良性互动。

2. 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组织网络。首先，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认真践行多边主义，坚决反对美西方大搞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伪多边主义、集团阵营对抗和制造“新冷战”，反对打着维护“国际规则”的旗帜肆意改变国际秩序。其次，通过对接和完善的方式，实现已有地区安全治理

① 王玏、刘军：“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要义、理论创新与世界意义”，《国际问题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18 页。

② Derek Averre, “The Ukraine Conflict: Russia’s Challenge to European Security Governance”, *Europe-Asia Studies*, 2016, Vol.68, No.4, p.718.

组织的整合和优化，汇聚相关安全治理组织的资源和能力，以最低成本实现安全治理效能的最大化。例如，加强与法德意等欧洲大国的沟通，支持欧洲战略自主和欧安组织在俄乌冲突调停中发挥重要作用。另外，以俄乌冲突为戒，完善上合组织安全治理功能。即“推动本组织发展扩员、发挥本组织积极影响，将为维护亚欧大陆以及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注入正能量、创造新活力。”[①]最后，支持土耳其、巴西、南非等新兴国家的斡旋调停行动，推动建立双边、小多边安全协调机构，争取早日和平解决俄乌冲突。

3. 建立更为全面和有深度的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在全球安全治理组织失调或缺位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应支持俄乌冲突各方建立或优化欧洲安全治理机制，推动安全治理领域的全覆盖和功能的重叠备份，增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承受冲击的能力。首先，支持建立俄乌冲突对话协商机制。汇聚各方力量、支持一切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有益尝试，坚决反对“火上浇油”和“火中取栗”等破坏和谈的行为，推动俄乌双方以政治谈判来代替冲突对抗、逐渐建立安全互信和实现共同安全。“中方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举行直接对话谈判。中方也支持欧方与俄罗斯就欧洲安全问题进行平等对话，秉持安全不可分割理念，最终形成平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②]。其次，建立全球综合安全治理机制。俄乌冲突加剧了大国竞争、地区冲突、难民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也让整个世界和全人类越来越成为安全命运共同体。因此各国需要携手建立全球综合安全治理机制，合力消除俄乌冲突及其衍生的一系列安全问题，促进世界实现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最后，建立俄乌冲突正向舆论引导机制。客观全面理解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严峻性，避免被一些政客、媒体、智库和学者的虚假言论误导，积极缓和俄乌冲突各方的对立情绪和仇恨，营造对话沟通的友好氛围。同时，拆穿美西方借俄乌冲突污蔑、遏制中国的图谋，全面呈现其破坏亚太和平稳定的各种劣迹。

（二）增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自我优化能力

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自我优化能力越强，就越能有效应对俄乌冲突等重大

① 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加强团结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

② “王毅阐述中方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五点立场”，《人民日报》，2022 年 2 月 27 日第 3 版。

安全问题所造成的冲击，反之亦然。因此，世界各国需要携手增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自我优化能力，以便对各种安全问题的孕育、形成和恶化进行全过程治理，以及更好地适应安全环境的变化。

推动国际社会凝聚全球安全治理共识。首先，俄乌冲突各方应包容安全认知的差异，减少欧洲乃至全球安全治理过程中的错误认知和敌意行为，避免引发全球安全治理的过度竞争、对抗和冲突。其次，要有效识别和管理俄乌冲突各方安全认知冲突，摒弃企图按照旧的激烈路线分裂世界的冷战思维，[①]坚决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强调安全合作是应对俄乌冲突、实现欧洲持久和平以及普遍安全的主要途径；加强俄乌冲突涉事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的沟通，以和平和对话的方式处理俄乌冲突，推动欧亚大陆构建安全伙伴关系网络和安全共同体，破解敌意的安全认知思维和由来已久的欧洲安全困境；摒弃意识形态划线，团结起来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凝聚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②]再次，要增进全球安全治理共识。构建全球共有安全文化，培育共同安全价值，增强欧洲乃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意愿；强调俄乌冲突已经成为世界的共同安全威胁，增强相关各方安全共同体意识；强调世界各国是安全治理的受益方也是责任的承担者，提高俄乌冲突各方安全责任共同体意识。

推动全球多中心协同安全治理。从根本上看，俄乌冲突具有霸权与反霸权的性质，也是国际权力转移大背景下的新旧体系之战。[③]结束俄乌冲突，不仅有关各方和欧洲的安全，还将对更广泛的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④]积极推动新兴国家获得更大的全球安全治理话语权，打破等级性的霸权治理秩序，增强国际安全治理的民主性、正义性。同时，鼓励新兴国家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坚力量，积极供给物质型、理念型和制度型安全公共产品，在实

① 尚凯元：“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急需改革”，《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27 日第 14 版。

② “王毅出席第七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22 年 9 月 26 日第 3 版。

③ 田文林：“超越西方传统安全观：全球安全倡议的时代价值”，《当代世界》，2022 年第 5 期，第 28 页。

④ Chester A. Crocker, “Endings and Surprises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Survival*, 2022, Vol.64, No.5, p.183.

践中增强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韧性，以适应俄乌冲突强度不减、规模大和持续时间长的新变化。引导大国加强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共同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欧亚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①]必须保持中俄关系高水平运行；[②]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以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应对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③]支持法德两国从欧洲自身利益出发，为欧洲持久安全着想，坚持战略自主，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④]大国是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攸关方和重要受益者，需要避免非必要的安全冲突与对抗。俄乌冲突复杂难解，必须要警惕集团对抗的形成，以及因此而造成的世界持久动荡不安。鼓励区域安全治理发展，改善欧洲安全环境。加强上合组织、欧盟、欧安组织、东盟、阿盟等区域国际组织的安全治理能力，发挥其在安全保障、危机管理、冲突预防和反恐合作等方面的治理功能，提高欧亚大陆安全治理的一体化水平，构建整体有序的全球安全治理格局。

推动世界各国安全利益的交汇。俄乌冲突各方应包容安全利益存在的差异。重视俄乌冲突各利益攸关方合理的安全关切，坚决反对以各种借口大行全面制裁、支持代理人战争和武力颠覆他国政权的霸凌行径，避免因追求各自安全利益可能导致的冲突扩大化。寻找并汇聚俄乌冲突各方的共同安全利益。欧盟和俄罗斯选择忽视冷战后关键时刻互动中的紧张局势，导致双方象征性的和平共处破裂，[⑤]而整个俄乌冲突都是在核战争的阴影下进行的。[⑥]这

① 李永全：“俄乌冲突主要利益攸关方之博弈及其影响”，《俄罗斯学刊》，2022 年第 4 期，第 19 页。
② 刘军、苟利武：“中俄关系 70 年：历史反思与未来构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 5 期，第 29 页。
③ “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 日第 1 版。
④ “习近平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人民日报》，2022 年 3 月 9 日第 1 版。
⑤ See Nitoiu Cristian, “Towards conflict or cooperatio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EU-Russia relations”, *Journal of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2016, Vol.16, No.3, p.375; Кирилл Логвинов: политика Евросоюза может стать катастрофой для Брюсселя. 12 февраля 2024 г. https://ria.ru/20240212/logvinov-1926802597.html
⑥ Giles D. Arceneaux, “Whether to worry: Nuclear weapons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23, Vol.44, No.4, p.561.

再次提醒欧洲国家要根据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在迄今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同俄方进行深入、全面探讨，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①]美国应摒弃危险的冷战思维，让各方的共同利益替代自己的霸权私利，共同守护世界的长治久安与持续发展；鼓励俄乌双方考虑对方的安全关切，尽早达成停战协议，并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双方领土争端问题。化解俄乌冲突各方安全利益存在的冲突。乌克兰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是美国塑造敌人、挑动俄欧矛盾，借此达到捆绑欧盟的目的。[②]同时，当欧盟试图坚持基于规范的秩序理念时，俄罗斯正在捍卫其感知的安全利益，防止西方主导的秩序蔓延。[③]这些安全利益的冲突表明，若想恢复欧洲和平，需要美俄、俄欧以及俄乌展开持续的政治对话，逐渐化解俄乌冲突背后的欧洲安全困境症结，解决各利益攸关方的安全忧虑。同时，反对美西方滥用国际制裁，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促进欧洲和全球经济复苏。此外，坚决反对美西方试图将亚太地区阵营化、北约化和冷战化的一系列对抗行为，避免亚太地区重蹈欧洲战乱覆辙。

四、结　论

综上所述，俄乌冲突与全球安全治理困境的演进逻辑更加清晰。即俄乌冲突加剧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过载、失灵和变革，形成了全球安全治理需求增加、陷入困境、困境突破三个阶段。具体表现为俄乌冲突加剧了欧洲地缘政治博弈并衍生了大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致使全球安全治理需求增加、体系过载。受此影响，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遭受强烈冲击、频繁失灵和难以恢复，导致全球安全治理陷入困境。因此，俄乌冲突叠加百年变局，加剧了世界安全形势恶化和全球安全治理赤字，凸显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当前，以联合国为核心、大国为主导进行的体系完善和优化，是提升全球安全治理能力的两个主要着力点，直接影响未来世界安全形势走向。

① “王毅分别同法国、意大利外长举行视频会晤”，《人民日报》，2022 年 3 月 11 日第 3 版。

② “乌克兰危机与中国的战略利益”，《文化纵横》，2022 年第 2 期，第 4 页。

③ Raik Kristi, “The Ukraine Crisis as a Conflict over Europe’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Order”, *Geopolitics*, 2019, Vol.24, No.1, p.51.

俄乌冲突的解决将会重塑欧洲甚至世界秩序。俄乌冲突表明，当今世界依旧存在着浓厚的冷战思维、地缘政治博弈重回世界政治舞台中心、国际舆论成为战争的重要影响因素，重大安全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其负面影响将会被不断放大。我们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全球相互依赖时代，以国家为中心、以西方霸权为主导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新形式的安全问题和适应世界新的安全环境。这也意味着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安排在欧洲地区已经难以维系，解决俄乌冲突将会重塑欧洲安全架构和地区秩序。如若俄乌冲突演变成大国直接战争，必将极大地破坏欧洲乃至世界的安全环境，战后秩序安排范围也会从欧洲地区扩展至全世界。

俄乌冲突凸显全球安全治理研究的战略意义。俄乌冲突背景下的全球安全治理研究，关系到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欧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中国战略发展机遇期的塑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作为国际战略议题，全球安全治理日益成为大国、国际组织、各国学界等重点研究的内容。当前，全面、深刻认识全球安全治理的战略价值，必须要持续研究百年变局下世界安全形势变化与人类安危的关系，全面评估全球安全治理的需求与效能，深入探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的可能性与方案。因此，学界应投入更多精力从事全球安全治理研究，助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有效应对更加复杂多变的世界安全形势和更好地维护全人类安全。

【**Abstract**】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become the most severe global security crisis of the 21st century, severely impacting the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The continued eastward expansion of the NATO,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Ukraine's rapid pivot towards the West have intensified geopolitical games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Europe. This has led to a high-intensity, large-scale, and prolonged Russia-Ukraine conflict, causing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has further highlighted the obsolescence of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concepts, the decline in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and the dysfunction of mechanisms. Coupled with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countries, the accelerating divergence of security interests among countries worldwide,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consensus on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the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has become dysfunctional, making reform of the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even more urgent. Therefor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need to collectively promote innovation in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concepts, improve the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organizational network, and establish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mechanisms to ensure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s manageable and to maintain overall world peace and stability. By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 consensus on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achieving a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interests within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we can promote the self-optimization of the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to adapt to the new world security environment caused by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Key Words**】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Ukraine Crisis,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Reform of the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System

【**Аннотация**】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стал самым серьёзным кризисом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XXI веке, серьёзно повлиявшим на систему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Продолжающееся расширение НАТО на восток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США и ускоряющийся сдвиг Украины в сторону Запада усилил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игру и ухудшили обстановк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опе, чт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привело 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высокоинтенсивного, масштабного и долг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итогом стала остра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конфликт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ещё больше выявил отставание концепций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упадок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го авторитета и дис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ую работу механизмов, кроме того,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за власть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усилилась, ускорились темпы роста интересо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азличных стран мира, а консенсус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ослаб,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провалу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поэтому трасформация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стала более актуально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транам всего мира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овместно продвигать инновации в концепциях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ую сеть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и создавать более всеобъемлющий и углублённый механизм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управляем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и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общий мир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о всём мире; путём постоянного укрепления консенсуса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достинуть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го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сил и интересов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и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самооптимизации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для адаптации к новой среде миров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ызванной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м конфликтом.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систем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ю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对国际安全的影响：起源、现状与未来

蔺陆洲*

【内容提要】以瓦格纳集团为代表的私营军事公司作为俄罗斯实施混合战争的主要载体，是影响国际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历史回顾和特征辨识可以发现，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诞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扶持，构建起由行业协会、私营企业、武装团体组成的复杂安全雇佣关系网络。俄罗斯国内环境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私营军事公司快速发展。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欧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十分活跃，参与多类军事安全行动，利用“冲突矿产”构建了“军事安全-资源贸易”的商业模式，呈现出军事实力扩张、经济收益多样、意识形态稳定、组织形式灵活、自主偏好增强的特点，正在从“协会-私营企业-武装团体”的关系网络向“军事-经济”的政治复合实体转变。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活动对国际安全产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影响，不仅刺激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动荡，而且威胁到俄罗斯国家政权自身的稳定。瓦格纳集团的叛乱没有改变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业务特征和发展趋势，对其未来变化需要加以密切关注。

【关键词】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　混合战争　冲突矿产　瓦格纳集团
【中图分类号】D8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4)02-0169(28)

21 世纪以来，安全供应的私有化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急剧扩大。这主要表现为以私营军事公司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正通过情报分析、训练作战、

* 蔺陆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讲师。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后勤保障、维持秩序等多种方式，参与到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与防务活动之中。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私营军事公司，开启并引领了这一潮流。私营军事公司已经成为美国外交不可或缺的部分。[①]以瓦格纳集团为代表的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后苏联空间和西亚非洲地区开展了大量活动，已经成为俄罗斯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力量。西方学者主要研究了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海外军事行动。[②]西方国家发布了针对瓦格纳集团的官方报告并实施了多轮制裁。[③]俄罗斯学者讨论了私营军事公司的法律地位和战略作用。[④]中国学者对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和混合战争也开展了初步的研究。[⑤]但是，现有研究还没有深入分析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组织关系和演变规律，剖析其影响国际安全的作用机理。本文从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起源出发，分析俄罗斯政府的应对策略。在详细梳理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当前活动的基础上总结其特征和演变规律，最终从国际、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分析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对国际安全的结构性影响。

① A. Stanger, *One nation under contract: The outsourcing of American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4.

② 相关研究可参见 K. Marten, “Russia’s use of semi-state security forces: the case of the Wagner Group”. *Post-Soviet Affairs*, 2019, Vol.35, No.3, pp.181-204; C. Rondeaux, *Decoding the Wagner group: Analyzing the role of private military security contractors in Russian proxy warfare*, Washington DC: New America, 2019; E. Pokalova, “The Wagner group in Africa: Russia’s quasi-state agent of influence”,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023, pp.1-23.

③ 相关政府报告与制裁文件可参见 *Treasury Sanctions Russian Proxy Wagner Group as a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220;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February 25, 2023,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OJ:L:2023:059I:TOC

④ 相关研究可参见 Курылев К. П., Мартыненко Е. В., Пархитько Н. П., et al. Феномен част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в военно-сил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XXI в.// Вестни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наука,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2017. Т.12. №.4. С.130-149; Козина А. 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статусе и функциях част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тран АТР в XXI веке. 2018. Т.2. С.295-301; Кокамбо Ю. Д., Скоробогатова О. В., Кузнецова К. Е. Наемничество и частные вое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а// Вестник Аму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2019. №.86. С.44-47.

⑤ 中国学者关于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研究成果可参见王晋、唐继安：“俄罗斯‘混合战争’中的私营安保公司”，《俄罗斯学刊》，2023 年第 3 期，第 64–80 页；卓振伟、武斌：“俄罗斯与非洲的军事合作：混合战争的视角”，《西亚非洲》，2023 年第 2 期，第 118–160 页。

一、“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起源与发展

从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官方的大力扶持是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俄罗斯政府一直采取既扶持又控制的两面手段，在支持私营军事公司发展的同时严加防范，限制其活动与规模，并不断加强控制。

（一）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诞生与演变

俄罗斯的私营军事公司以委托-承包的安全业务构建了由行业协会、武装团体、私营企业等互不隶属的多个实体组成的关系网络。以瓦格纳集团为例，瓦格纳不是一家公司的名字，而是外界对俄罗斯安全雇佣关系网络的代称。实际上，早期俄罗斯并没有任何一家私营军事公司是以“瓦格纳”为名称而注册成立的。[①]直到 2022 年 11 月普里戈任才在圣彼得堡开设了“瓦格纳集团”的办公大楼，并在 12 月以管理咨询公司的名义注册为法人。[②]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业务涉及守护基础设施、保卫重要人物、反叛乱作战、维持公共秩序、打击持不同政见者、信息采集与传播、油气矿产资源开发、能源与大宗商品贸易等多个领域，成为在政治寡头领导下的由多个实体、多种业务和不同行为者组成的伞形组织。

从历史上看，哥萨克是俄罗斯最古老的私人军事公司，在帝俄时期类似于准军事部队，从事军事作战、治安维持和民事管理等活动，为沙皇俄国对外殖民扩张和对内镇压起义立下了汗马功劳。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采取了“去哥萨克化”的政策，哥萨克作为一个军事阶层消失了。[③]随着苏联的解体，在 20 世纪 90 年已经出现了一些未被官方承认的武装团体。这些组织和关系网络可以被视为当代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前身。[④]叶利钦执政时期，这些支持俄罗斯政府的“志愿团体”在国内卷入政治斗争和帮派活动，国际上则在欧亚地区、巴尔干半岛和东欧国家配合俄罗斯政府开展军事安全活

① Keir Giles, Valeriy Akimenko, “Use and utility of Russia’s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Journal of Future Conflict*, 2019, No.1, pp.1-2.
② Andrew S. Bowen, “Russia’s Wagner Private Military Company (PM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23, IF12344, pp.1-2.
③ 杨素梅：“试论 20 世纪俄罗斯哥萨克的复兴运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 年第 5 期，第 63-68 页。
④ T. Goltz, “Letter from Eurasia: the hidden Russian hand”, *Foreign Policy*, 1993, Vol.92, pp.92-116.

动。例如，在 1992 年至 1995 年，数百名具有俄罗斯背景的武装人员活跃在波黑，参与维舍格勒的多项军事行动。[①]这些武装团体的活动部分得到了俄罗斯寡头的雇佣和政府机构的支持。[②]普京执政后，这些武装团体的活动更加活跃，涉及范围更广。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私营军事公司在俄罗斯海外行动中处于愈发关键的地位，对国际安全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从发展时序上看，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演变可以分为初创期、成长期和转型期的三个阶段。

1. 初创期（2005—2013 年）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诞生初期就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组织与运作模式，即以联谊会或行业协会为基础建立合作关系，私营公司承揽业务，武装团体负责具体实施。每当业务出现争议、困难或有新的市场机遇，立即通过注册成立新实体公司的方式，以变换身份并承接新业务。这种模式使得网络中互不隶属的各类实体繁多，外界很难了解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具体的组织和运行情况。例如，西方情报界和学术界错误地认为“埃默科姆排雷公司”是瓦格纳集团早期对外签署合同并承担业务的单位。[③]实际上，该单位是俄罗斯紧急事务部下属的“事业单位”。[④]通过综合相关报道和公开资料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主要有奥廖尔反恐集团、莫兰安全集团和斯拉夫军团等核心的关键实体（见表 1）。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关系网络包括协会、私营公司和武装团体。

第一，关系网络的建立依托于军队、克格勃等强力部门（Siloviki）退役人员组成的联谊会或协会，包括奥廖尔空降兵联谊会、全苏空降兵与特种部队协会、维持和平和预防地方冲突任务退伍军人协会等组织。主要成员来自

① T. D. Arnold, “The geoeconomic dimensions of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panies”, *Military Review*, 2019, Vol.99, No.6, pp.6-18.
② D. Treisman, “Putin’s silovarchs”, 2007, *Orbis*, Vol.51, No.1, pp.141-153.
③ See C. Rondeaux, *Decoding the Wagner group: Analyzing the role of private military security contractors in Russian proxy warfare*, Washington DC: New America, 2019, p.35; H. Ivanovski, “Putin’s Neo-Tsarist Russia: A Balkan and Eastern Mediterranean Pattern of Resurgence”, *Contemporary Macedonian Defence*, 2015, Vol.15, No.11, pp.25-29.
④ “埃默科姆排雷公司”（Emercom Demining Company）应为俄罗斯紧急事务部下属的高风险救援行动领导中心（Federal State Institution “Leader Center for High Risk Rescue Operations”）。

俄罗斯总参情报局即“格勒乌”（GRU）、俄罗斯安全局信号旗（Vympel）和阿尔法（Alpha）特种部队、俄罗斯内务部（MVD）勇士（Vityaz）和罗西奇（ROSICH）特种部队、俄罗斯空降军部队（VDV）等单位，这些人员也是构成私营公司和武装团体的核心人员。

表 1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早期核心实体

类型	名　称	存续时间	注册地	活动范围与主要业务
行业协会	奥廖尔空降兵联谊会	2005 年至今	奥廖尔市	联系政府机构和退伍老兵
	全苏空降兵与特种兵协会	2005 年至今	莫斯科	联系政府机构和退伍老兵
私营公司	奥廖尔反恐集团	2005—2016 年	奥廖尔市	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伊拉克、叙利亚：排雷、油气基础设施保护
	老虎安全	2005—2006 年	莫斯科	伊拉克：人员保护、油气设施保护
	费拉克集团	2007—2016 年	英属维尔京群岛	伊拉克、阿富汗、伊拉克、斯里兰卡：人员保护、治安维持、基础设施保护
	莫兰安全集团	2011 年至今	伯利兹、莫斯科、圣彼得堡	尼日利亚、伊拉克：油轮、港口、钻井平台反海盗、油田保护、情报信息
	东正教联合集团	2011—2019 年	莫斯科	乌克兰、叙利亚、塔吉克斯坦、纳卡：治安维持、基础设施保护
	斯拉夫军团	2013—2014 年	中国香港、圣彼得堡	叙利亚：油田设施保护
武装团体	要塞	2005 年至今	莫斯科	各类军事作战行动
	爱国者	2005 年至今	莫斯科	各类军事作战行动
	平缔造者	2005 年至今	莫斯科	网络情报获取与信息支持、认知战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私营公司负责承接业务、发放工资、采购装备、物流运输等工作，包括爱国者公司（Vityaz-Patriot）、财富战士公司（Soldier of Fortune）、伏努科沃航空公司（Vnukovo Airlines）、罗斯集团（RusCorp）以及在塞浦路斯注册的泽普咨询服务公司（Zeitplus Consultancy Services, Ltd）等私营公司实体。①

① 公司隶属关系及相关数据来源于 OpenCorporates 数据库（https://opencorporates.com/）和 Rusprofile 数据库（https://www.rusprofile.ru/）。

第三，具体军事安全业务由武装团体和准军事单位实施，包括注册在莫斯科的要塞行动战术任务中心（Redoubt Center for Operational-Tactical Tasks，即 Redoubt，Antiterror-Redut 或 Center R）、爱国者（Patriot Group）、老虎（Tiger Top Rent Security）、和平缔造者（Mirotvorets）等团队。早期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业务资金主要来源于俄罗斯的强力部门或者国有企业，例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俄罗斯国家航运公司（Sovcomflot）等能源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提供油气田守卫、运输设施保护与远洋货轮护送等业务。同时，这些私营公司也作为西方国家军事承包商的分包商承接业务，如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为西方国家提供安全服务等。直到 2013 年，斯拉夫军团在叙利亚守卫代尔祖尔油田期间，与美军发生冲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该事件被媒体公开报道，致使斯拉夫军团负责人被捕。[①]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也进行了重大调整。

2. 成长期（2014—2021 年）

斯拉夫军团覆灭后，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迅速调整组织结构并拓展新业务，随后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积极介入欧亚国家的国内安全事务，特别是在 2014 年协助俄军夺取了克里米亚、在顿巴斯组织亲俄民兵开展军事斗争。除在伊拉克、叙利亚等西亚国家继续开展军事活动外，还在非洲开创了全新的“冲突矿产”业务。[②]由“协会-企业-武装团体”构成的安全雇佣关系网络不断扩展和丰富（见表 2）。

在行业协会方面，更多具有政府背景的国际组织加入安全雇佣关系网络，包括俄罗斯叙利亚商会、俄罗斯巴西商会和国际安全官员联盟（Officers Union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等机构。[③]在企业方面，除负责承揽业务的康科德管理咨询公司（Concord Management and Consulting）、负责支付工资的欧元城市有限公司（Evro Polis Ltd.）和负责运输的鞑靼之翼航空（Cham

① Веселов Ю. А. История и роль ЧВК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2021. №.3. С.19.
② J. Czerep, “Russia’s Wagner Group Expanding Influence in Africa”, *Bulletin PISM*, 2021, Vol.1871, No.181, pp.1-2.
③ Бовдунов А Л. СОМБ и МИНУСКА в ЦАР: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реалистской и либеральной парадигм миротворчества// Вестник РУДН. Се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23. Т.23. №.3. С.480-496.

Wings Airlines）等私营企业外，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的K公司（Service K LLC）、木材出口贸易的红树林公司（Wood International Group）、矿产出口贸易的福莱姆公司（Ferrum Mining LLC）等企业也加入了该网络。[①]在武装团体方面，与其联系的军事组织不断增加且规模不断扩大，包括鲁西奇集团（Rusich Group，即破坏性突击侦察组，也称为DShRG）、斯巴达营（Sparta Battalion）、蝙蝠侠战斗群（Batman）、幽灵旅（Prizrak）、国际旅（International Brigade）等，这些武装团体已达到营级战术群（BTG）的规模，在后期参加了顿巴斯地区一些最激烈的战斗。[②]

表2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新增核心实体

类型	名称	存续时间	注册地	活动范围与主要业务
行业协会	俄罗斯-叙利亚商业理事会	2004年至今	莫斯科	联系政府机构和建立业务渠道
	国际安全官员联盟	2017年至今	班吉（中非）	联系政府机构和建立业务渠道
私营公司	福莱姆矿业公司	2017年至今	圣彼得堡	石油、矿石开采与出口贸易
	红树林公司	2019年至今	班吉（中非）	木材的采伐与出口贸易
武装团体	鲁西奇集团	2014年至今	卢甘斯克	各类军事作战行动
	斯巴达营	2014年至今	顿涅茨克	各类军事作战行动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3. 转型期（2022年至今）

俄乌冲突是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发展的转折点，激烈的战事使得安全雇佣关系网络产生了质变，关系网络开始向政治实体发展。在军事上，以瓦格纳集团为代表的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参与了乌克兰东部前线的高强度作战，承担了部分关键地域的突击与防御任务，在部分战役中取得了比俄罗斯正规武装力量更加亮眼的战果，成为俄罗斯军事力量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经济上，私营军事公司在西亚非洲地区利用“冲突矿产”构建了一个大宗原材

① R. Bäcker, J. Rak, “Why did Putin go too far? The rationality of Vladimir Putin’s decision to begin a war with Ukraine”, *Society Register*, 2022, Vol.6, No.3, pp.57-71.
② A. M. Dyner, “The Role of 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 *Bulletin PISM*, 2018, Vol.1135, No.64, pp.1-2.

料开采和运输的国际贸易与金融网络，成为俄罗斯打破西方经济封锁的重要力量。在政治上，法律地位得到了俄罗斯官方的承认，从秘密运行转为公开活动，瓦格纳集团注册了实体法人公司并在圣彼得堡设立了总部，在极右翼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成为俄罗斯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瓦格纳集团与俄罗斯国防部矛盾的公开化，普里戈任在 2023 年 6 月发动的武装叛乱严重动摇了俄罗斯政权的统治基础。[①]当前，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逐渐从“协会-企业-武装团体”的关系网络向“军事-经济”的复合型政治实体转型。

（二）俄罗斯政府的扶持与控制

俄罗斯政府在对待私营军事公司方面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大力扶持和引导，提供资金、训练、武器和各类军事设施；另一方面也进行防范和控制，严格限制其规模和实力。

1. 支持与引导

俄罗斯政府支持私营军事公司发展，并引导其发展方向和业务领域。

第一，资源支持。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商业合同主要是为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安全服务，在行动中能够从俄罗斯政府和军队获得情报信息、武器装备和火力支援。例如，莫兰德集团主要收入来源是为俄罗斯航运公司油轮护航的业务，瓦格纳集团在叙利亚的油田守卫合同则来源于俄罗斯油气公司。[②]斯拉夫军团在叙利亚的活动直接使用了俄军的基地和设施。[③]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瓦格纳集团直接从俄罗斯政府获得了财政拨款，从俄军获得了包括装甲车、坦克在内的重武器和炮兵、空天军的火力支援。

第二，指挥引导。俄罗斯政府通过非正式领导关系指挥私营军事公司。例如，普里戈任作为瓦格纳集团的实际掌控人，其餐饮公司多次承办普京与外国政要的宴席，他本人则被美联社称为“普京的厨子”，与普京的私人关系密切。[④]俄罗斯政府在国际争端中还直接出面为私营军事公司开展斡旋。

① Ильин Ю. И. Военный мятеж в рамк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ава (на примере ЧВК «Вагнер») // Юрид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2023. №.9. С.245-249.
② C. Spearin, “Russia’s Military and Security Privatization”,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Quarterly: Parameters*, 2018, Vol.48, No.2, p.44.
③ T. Wójtowicz, I. Barsznica, K. Drąg, “The influence of Russian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the war in Syria”, *War Studies University Scientific Quaterly*, 2018, Vol.111, No.2, pp.85-99.
④ 于书伟、周伟：“瓦格纳的幕后控制者：普里戈津”，《军事文摘》，2023 年第 5 期，第 76 页。

例如 2012 年莫兰安全集团雇员因非法持有武器在尼日利亚拉各斯港被当地警方逮捕，俄罗斯大使馆出面协调和营救。①

2. 防范与控制

俄罗斯政府限制私营军事公司的规模，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渗透和控制。

第一，限制规模。俄罗斯政府没有承认私营军事公司的法律地位。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13 条第 5 款、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208 条均禁止组建和资助雇佣军，要求取缔所有俄罗斯联邦法律中未规定的武装组织。②政府可以根据情况需要利用法律手段取缔私营军事公司。同时，俄罗斯政府严格控制私营军事公司的规模，例如，被认为实力最强的瓦格纳集团长期维持在 2000 人左右。③俄乌冲突爆发后，即便扩充了由罪犯组成的“惩戒营”部队，其人员规模也控制在 5 万人以内，重武器和高技术装备有限。

第二，整编控制。俄罗斯政府依靠强力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私营军事公司合同的方式，保持着安全雇佣关系中甲方的强势地位，根据需要将私营军事公司的武装力量纳入国家武装部队的指挥体系。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防部逐步推动将普里戈任的瓦格纳集团、车臣拉姆赞·卡德罗夫的“艾哈迈德”部队、俄罗斯铜业公司阿尔图什金的“乌拉尔突击营”、俄气公司背景的“火炬”、“洪流”和“堡垒”等 30 多支其他志愿部队有步骤地转变为正规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一部分，由俄军总参谋部统一指挥，减少在作战指挥、后勤装备和纪律维持中产生的争端。④在这一过程中，争夺对瓦格纳集团部队的控制权，是 2023 年 6 月普里戈任发动武装叛乱的直接原因。

（三）俄罗斯政府的诉求与动因

俄罗斯政府希望利用私营军事公司有效应对各类安全威胁，高效实现对外战略目标，创造新的经济收益，扩大国际影响力。

① K. Marten, “Russia’s use of semi-state security forces: the case of the Wagner Group”. *Post-Soviet Affairs*, 2019, Vol.35, No.3, p.190.

② Сухоруков А. А. Роль правов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част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в достижении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укрепления оборон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2018. №.1. С.61-64.

③ Фоменков А. А., Курганников В. В. Частные вое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их сущность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Вестник Нижегород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управления. 2019. №.3. С.13-19.

④ J. Ratelle, “The North Caucasus, the Future of Russia, and Foreign Fighters in Ukraine”,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2023, No.295, pp.6-9.

1. 应对安全威胁

有效应对安全风险是私营军事公司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从全球来看，冷战后随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叛乱、有组织犯罪、跨境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增长，政府需要新型安全服务以应对各类风险，这使得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与使用国家武装力量相比，私营军事公司更加灵活、更有能力、更具性价比。作为非政府机构，其行动和伤亡不需要进行公开报道，政府无需承担政治后果。俄罗斯提出的“混合战争”军事学说将使用私人军事公司和武装团体作为重要的隐蔽作战方式，可以用最低限度的军事打击来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①]这种“非官方”和“自发自愿”的模式被俄罗斯政府，尤其是被情报安全部门认为是有效工具，志愿人员的军事行动能够创造有利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态势，而且在受到西方国家和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压力时还可撇清责任。

2. 高效实现目标

私营军事公司能够更加高效地实现俄罗斯政府的战略目标。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依靠私营军事公司实施国家战略比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更具有性价比。首先，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的主要军事遗产，拥有充足的武器和技术储备，对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使用这些苏制装备几乎没有额外的成本。其次，军事人力资源丰富。俄罗斯经济发展缓慢，就业机会有限，从而压低了受教育人口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地区的年轻人愿意冒险参加私营军事公司，而且日常工资和支付伤亡抚恤金的成本较低。以瓦格纳集团为例，其雇员的月平均工资为 24 万卢布，而俄罗斯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足 4 万卢布。[②]私营军事公司能够依靠高工资吸引大量具备较高战斗素养的退伍军人。再次，私营公司通过市场化采购、商业租赁等形式开展军事行动，参与和实施混合战争的成本比使用正规部队更低。例如，2021 年瓦格纳集团协助中非共和国军政府防守首都的作战，一年仅需要 2

① 郭金峰：“俄罗斯对‘混合战争’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俄罗斯学刊》，2022 年第 6 期，第 79 页。

② S. Sukhankin, “Continuing war by other means: The case of Wagner, Russia’s premier private military company in the Middle East”,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2018, p.303.

亿美元。[①]相比较而言，美军 1995 年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防御任务花费了 20 亿美元，俄罗斯 2019 年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花费超过 30 亿美元。因此将军事安全任务外包，由私营军事公司实施俄罗斯国家战略的费用更低。

3. 创造经济收益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西亚非洲地区利用“冲突矿产”形成的商业模式能够创造经济收益。“冲突矿产”是指来自冲突或高风险地区的矿产资源，例如非洲刚果（金）出产的锡、钽、钨、金 4 种矿产（简称 3TG），就是在武装冲突和侵犯人权的情况下进行开采的。[②]全球各类武装团体，例如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缅甸北部民族武装、拉美左翼游击队等，均能够通过走私、毒品、军火贸易、人口贩卖、电信诈骗等方式获得经济收益。对于武装团体而言，地下经济及其产生的财富是实施政治议程的工具；而对于犯罪组织来说，黑市财富本身就是目的。[③]近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和工业化水平持续衰退，除了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工业和粮食、木材等原材料生产之外，其他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在对外关系中，俄罗斯既缺乏像西方国家一样实施经济援助的资金，也不具备类似中国援建大型基础设施的能力。因此，依靠私营军事公司嵌入“冲突矿产”，已经成为俄罗斯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较为成功的模式。而基于“冲突矿产”的收益，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不仅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运营和发展，还能够扩大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

二、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活动与特征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全球活动，在欧亚、西亚、非洲等地区提供军事安全服务，开展“冲突矿产”贸易，这些活动使得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具备了“军事–经济”复合体的特征。

① M. Amoah,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Foreign Legions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Mali and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lternatives*, 2023, Vol.48, No.2, p.138.
② 汤文豪、吴树明、曹庭语等：“冲突矿产的管制政策研究”，《国土资源情报》，2016 年第 9 期，第 74 页。
③ R. Naylor, “The insurgent economy: Black market operations of guerrilla organizations”, *Transnational Financial Crime*,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359-398.

（一）在欧亚地区的活动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通过提供军队训练、秩序维护、情报侦查、清除反对派、反恐行动、军事打击等安全服务，广泛活跃在东欧、高加索以及中亚各国。

1. 东欧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活跃在摩尔多瓦、塞尔维亚等国。在摩尔多瓦，俄罗斯在 1992 年利用德涅斯特里亚哥萨克联盟等由志愿者组成的武装团体，由驻当地的原苏军第 14 近卫集团军提供武器，支持“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德左）的独立活动。[①]早期武装团体的资金来自教会，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基于这一历史渊源，在摩尔多瓦也开展包括训练“德左”军事安全部队在内的各类活动。在巴尔干地区，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积极参与了在巴尔干地区的军事行动，包括排雷、能源基础设施保护、训练塞尔维亚军队与警察、维持科索沃周边治安等多种活动。[②]私营军事公司成为俄罗斯在波黑和塞尔维亚施加影响的重要力量。

2. 高加索和中亚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开展保护能源设施和维持治安秩序的业务。私营军事公司在达吉斯坦、车臣、印古什、阿布哈兹等地广泛参与了反恐活动，包括治安维持和安全部队训练；在南奥塞梯、纳卡地区参与了情报活动；在 2022 年 1 月哈萨克斯坦的动乱中配合俄军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部队开展秩序维持行动。私营军事公司成为俄罗斯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对抗域外大国干预的重要力量。[③]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积极开展招募活动，使这些地区成为俄罗斯军事人力资源的重要来源地。[④]

① S. Roper, “Regionalism in Moldova: The Case of Transnistria and Gagauzia”, *Regional & Federal Studies*, 2001, Vol.11, No.3, pp.101-122.
② S. Sukhankin, “From ‘Volunteers’ to Quasi-PMCs: Retracing the Footprints of Russian Irregulars in the Yugoslav Wars and Post-Soviet Conflicts”, *War by Other Means*, 2019, pp.1-18.
③ Кривопалов А. 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Контуры глоб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2020. Т.13. №.6. С.103-121.
④ F. Bryjka, “The Involvement of Irregular Armed Groups in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Bulletin PISM*, 2022, Vol.1976, No.59, p.2.

3. 乌克兰

早在 2014 年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就组织了约 2000 名退伍军人以民兵名义进入克里米亚，协助俄军实现了对克里米亚的控制。之后，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活动，成为俄罗斯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对当地的乌克兰武装力量实施了毁灭性打击。随着 2022 年俄乌冲突爆发，在俄军进展不利之际，俄罗斯官方碍于国内压力不愿意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私营军事公司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所依靠的重要力量。[①]俄国防部在 2023 年 1 月 13 日承认瓦格纳集团在攻占索列达尔战斗中的重要作用。[②]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先后参与了利曼（乌克兰）防御战、亚速钢铁厂争夺战、巴赫穆特战役、顿巴斯战役、赫尔松战役等一系列艰苦的重要战斗，并且取得了较好的作战效果，成为影响冲突走向的一支关键力量。

（二）在西亚非洲的活动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西亚非洲开展了广泛的活动，不仅包括获得政府资金开展军事安全行动，还协助俄罗斯的政治盟友保持政权稳定并获取自然资源，建立了“军事安全–资源贸易”的商业模式。

1. 西亚北非

第一，在叙利亚，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是维持阿萨德政权生存和保持俄罗斯影响力的重要力量。自 2011 年叙利亚政府、反对派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之间的冲突爆发，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就参与到了叙利亚内战中。其部署了不少于 500 人的战斗力量，除了负责保卫俄罗斯公司运营的油气设施，也承担政府军的训练和支援任务。在俄罗斯 2015 年正式向叙利亚派遣武装部队后，私营军事公司更加活跃，人员增加到 3000 人以上，并参与了打击反对派和极端组织的战斗。[③]在 2023 年 6 月瓦格纳叛乱发生后，俄罗斯

① Мисеюк В. П. Участие част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нфликтах и проблемы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х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Аллея науки. 2022. Т.1. №.3. С.622-630.

② 袁勋、彭智丰：“神秘的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世界知识》，2023 年第 4 期，第 64 页。

③ R. De Melo,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Wagner group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Conflict, and Warfare*, 2023, Vol.6, No.1, pp.53-57.

军方和叙利亚政府切断了对瓦格纳集团在叙利亚部队的补给，部署在叙利亚当地的瓦格纳部队成员与俄罗斯国防部重新签署合同，由俄罗斯在叙利亚驻军直接指挥，转变为合同制的俄罗斯武装力量成员。

第二，在苏丹，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将苏丹打造成对非洲投射影响力的重要基地。2018 年，派出了至少 100 名军事教官，对金戈威德民兵为代表的准军事部队开展训练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快速支援部队（RSF）。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利用该部队控制苏丹边境地区的金矿，同时将机场作为基地建立国际运输航线，利用国际贸易网络进行走私。[①]此外，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还组织苏丹武装部队参与也门内战，支持沙特等海湾国家，这些行动为苏丹政府和俄罗斯私营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收入。2019 年苏丹军事政变推翻巴希尔政府后，布尔汉和达加洛都需要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在私营军事公司影响下的苏丹成为俄罗斯“通往非洲的钥匙”。[②]

第三，在利比亚，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参与军事行动和油气出口。自 2016 年进入利比亚以后，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支持军阀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对抗民族团结政府，部署规模达 2000 人，配备了坦克、装甲车、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等重型装备，2019 年 4 月还参与了对首都的黎波里的进攻。在 2020 年实现停火后，继续为哈夫塔尔的国民军提供军事训练，同时负责守卫东部油田。[③]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利比亚的经济收益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获取阿联酋的资金支持；二是通过控制苏尔特的码头直接获得石油出口的部分收益。[④]

2. 撒哈拉以南非洲

第一，在萨赫勒地区，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对马里、布基纳法索、毛里

① E. Pokalova, “The Wagner group in Africa: Russia’s quasi-state agent of influence”,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023, p.13.
② J. Siegle, “Russia and Africa: Expanding Influence and Instability”, *Russia’s Global Reach: A Security and Statecraft Assessment*, Garmisch-Partenkirchen: George C. Marshall European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21, p.87.
③ T. Neethling, “Russian Para-Military Operations in Africa: The Wagner Group as a De Facto Foreign Policy Instrument”, *Scientia Militari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Military Studies*, 2023, Vol.51, No.1, pp.1-23.
④ S. Ramani, “Russia’s post-2011 resurgence in Libya: A four-pronged hybrid intervention”, *Hybrid threat activity in the MENA region: 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 seeking status and expanding influence, Hybrid CoE Trend Report 5*, 2022, p.11.

塔尼亚和尼日尔等国家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在马里，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自 2019 年起就派遣了不少于 400 人的军事教官进入当地，在马里政府和军队内拓展俄罗斯的影响力。由于法国主导的反恐行动陷入困境，马里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并加深了同军队的矛盾。2022 年政变后，马里军政府驱逐了法国驻马里的大使，在内政外交上都更加依赖俄罗斯的支持。[①]目前，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马里部署了不少于 3000 人的作战部队，控制了马里主要的钻石矿，每年获取不少于 30 亿美元的收益。[②]在布基纳法索，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自 2019 年起开始提供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部署了不少于 1000 人的部队和重型武器。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利用军队和政府在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问题上的矛盾，支持了 2022 年的政变。[③]作为利益交换，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获得了布基纳法索的多个金矿。[④]在尼日尔，该国铀矿产量占全球总供应量的 7%，对国际核能市场和核武器生产具有重要意义。[⑤]法国以往在尼日尔的军事行动均与获取铀矿有密切联系。[⑥]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 2023 年 7 月支持尼日尔军队发动政变，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和法国在当地的影响力。

第二，在中非共和国，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将中非作为在整个非洲活动的战略支点，从 2017 年起就为当地的钻石、黄金等矿区提供安全保障服务，派遣了约 2000 人规模的部队，装备坦克、多管火箭炮和战斗机等重型武器，打击以艾哈迈杜·阿里领导的“爱国者变革联盟”为代表的叛军。同时，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从中非政府获取不少于 18.7 万公顷森林和矿区的伐木和

①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Н. А., Малютин Д. 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и Мал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ерроризму// Теории и пробле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2023. Т.12. №.8А. С.50-61.

② S. Elischer, “Populist civil society, the Wagner Group, and post-coup politics in Mali”, *West African Papers*, 2022, No.36, p.26.

③ Филиппов В. Р. Буркина Фасо: путч 2022 года//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2022. №.7. С.40-47.

④ L. Issaev, A. Shishkina, Y. Liokumovich, “Perceptions of Russia’s ‘return’ to Africa: Views from West Afric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Vol.29, p.425.

⑤ P. Volberding, J. Warner, “The uniqueness of uranium: The Problematics of Statecraft in Niger”,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2018, Vol.5, No.3, p.294.

⑥ Филиппов В Р. Африканский капкан для Эммануэля Макрона// Известия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9. Т.106. №.2. С.80-86.

采矿权，与阿联酋建立了黄金交易渠道，能够产生重要的资金收入。[①]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活动极大地削弱了法国在中非的影响力。[②]

第三，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还在刚果、安哥拉、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等国家开展了活动。虽然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 2018 年为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马夏尔·拉乔纳里马曼皮亚尼纳提供政治顾问和安全保障服务，但是在 2018 年拉乔纳里马曼皮亚尼纳总统连任失败后，被迫退出了马达加斯加。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还在 2019 年 8 月与莫桑比克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开展清除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军事行动，但是作战失败，在 2020 年 3 月退出了莫桑比克。

除了西亚非洲之外，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活动范围还在不断扩展。费拉克斯集团（Feraks group）在斯里兰卡、要塞（Center R）在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开展过活动。在 2019 年委内瑞拉政局紧张之际，瓦格纳集团进入该国为总统马杜罗提供安全保障服务。

（三）业务与特征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拥有复杂的关系网络，业务涵盖军事作战、治安维持、矿产开采、国际贸易等活动，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私营军事公司的“军事–经济”政治复合实体特征。

1. 业务活动

从军事安全和经济收益两个维度综合分析，可以获得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较为全面的图景。[③]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业务可归纳为三类：支援性行动，例如军事训练和军事顾问；防御性行动，例如基础设施和关键人员的保护；进攻性行动，例如治安维持、反叛乱作战和军事打击。[④]在经济收入方面主

① K. Marten, “Russia’s back in Africa: is the cold war return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9, Vol.42, No.4, p.155.

② Филиппов В. Р. Центральноафрикан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Кремля и Елисейского дворца// Локус: люди, общество, культуры, смыслы. 2019. №.1. С.124-143.

③ Поплевина А. И., Лошкарев А. В. Мировое и российск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частных во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Наук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культура. 2016. Т.15. №.12. С.56-61.

④ 参考美军 2017 年版 JP3-0《联合作战条令》，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涉及其中的 12 种军事行动：反恐行动、国防支援禁毒行动、禁区隔离行动、人道主义援助、民事支援、国家援助和反叛乱支援、非作战人员撤离行动、和平行动、海运保护、恢复行动、展示武力行动、打击和扫荡。

要有三种来源：一是俄罗斯政府和国有企业或外国政府提供的雇佣资金；二是开采和出售当地油气、黄金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入；三是控制机场、码头等重要交通枢纽设施开展国际贸易所获得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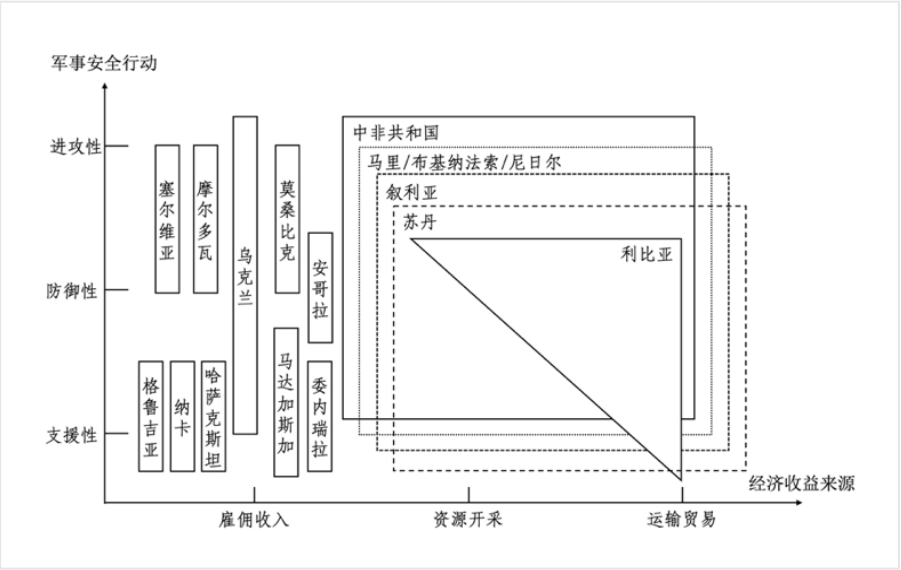

图 1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活动地区、业务类型与收入来源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全球的活动呈现出明显的两类模式：在后苏联空间主要依靠俄罗斯政府的合同和资金开展军事安全活动；在西亚非洲地区则以“军事安全-资源贸易”的新模式开展活动，即利用军事优势控制当地的自然资源，将获取的自然资源进行出口获得经济收益。新模式实现了业务闭环，能够在俄罗斯官方不额外投入的情况下，维持私营军事公司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成为未来的重点发展方向。

2. 特征辨识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具有“军事-经济”复合体的特征。

第一，军事实力扩大。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装备上不仅能够使用轻武器作战，而且配备装甲车、坦克、火炮和战斗机等重型武器，具有很强的作战能力；在人员方面，其核心成员均为参与过阿富汗战争、车臣战争的老兵，

能够为武装团体提供经验丰富的军官和战斗骨干；在形式上，能够得到俄军的情报和火力支援，具有较强的协同能力，既开展小规模战斗，又参与大规模的高强度作战；在战术上，无需在意国家正规军所顾忌的国际影响，可以充分发挥火力优势，敢于使用更粗暴的作战手段。例如，瓦格纳集团和中非政府军于 2022 年 1 月 16 日在布里亚（Bria）采取焦土战方式，摧毁大量平民的房屋和财产，造成了严重的伤亡。瓦格纳集团和马里军队在 2022 年 3 月 27 日的穆拉镇（Moura）同武装分子交火，其扫荡行动也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①]因此，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能够轻松击败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军与叛乱组织，具有很强的威慑力，在俄乌冲突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经济收益多样。政府佣金虽然是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冲突矿产”、国际贸易等其他来源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在俄乌冲突中，瓦格纳集团的薪资完全由国家财政保障，资金来自国防部、联邦安全局、内务部等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仅在 2022 年 5 月至 2023 年 5 月，俄罗斯政府就向瓦格纳集团支付了 862.62 亿卢布用于发放工资和奖金。[②]同时，瓦格纳集团通过向苏丹快速支援部队提供武器和训练，取得了苏丹 90%的黄金收入。[③]作为企业，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不断拓展盈利渠道，实现收入的多元化。

第三，意识形态稳定。不同于传统的雇佣军和西方国家的军事承包商，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追逐经济收益的同时拥有明显的意识形态。首先，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认为自己是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守护者，[④]对国家的认同和爱国主义是凝聚团体的根本要素。其次，大多数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例如，瓦格纳集团的名称就来源于其军事领袖德米特里·乌特金（Dmitriy Utkin）所欣赏的德国民族主义作曲家理

① O. Eguegu, “Russia’s private military diplomacy in Africa: High risk, low reward, limited impact”,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Vol.29, No.4, pp.450-452.
② B. Sreelakshmi, “Russia paid over $1 bn to Wagner group last year: Vladimir Putin”, *Hindustan Times*, June 27, 2023, https://www.hindustantimes.com/world-news/russia-wagner-group-vladimir-putin-mercenary-prigozhin-101687871034865.html
③ K. Marten, “Whither Wagner? The Consequences of Prigozhin’s Mutiny and Demise”, *Survival*, 2023, Vol.65, No.5, pp.45-64.
④ T. Adams,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Mercenar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Small Wars and Insurgencies*, 2002, Vol.13, No.2, p.54.

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他将其音乐视为集团行动的精神内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和大多数纳粹骨干都把瓦格纳的音乐用来鼓舞部队的精神。[①]这些意识形态使得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具备发展成为俄罗斯国内政治力量的思想基础。

第四，组织形式灵活。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不断调整其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对持续变化的国际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组织形式方面，利用“协会-私营公司-武装团体”的架构，在遭受制裁和打击后，马上转变业务内容或将业务转移至新的运营实体；同时根据市场拓展的需要，面向新业务建立组织机构，一方面维持核心团队的稳定，另一方面使得外界无法准确掌握其动向，增强了隐蔽和生存的能力。

第五，自主偏好增强。随着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全球扩张，后苏联空间和西亚非洲的两类业务呈现出竞争态势。与俄乌冲突前线的高强度作战相比，私营军事公司的成员更加倾向于在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冲突矿产”的高收益行动，进而产生脱离俄罗斯政府控制的倾向。由于军事经济实力的增强，私营军事公司具备了参与俄罗斯国内政治博弈的能力，对政治地位的诉求更加强烈。

三、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作用与影响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不同层面对国际安全产生了结构性影响，混合战争刺激了全球层面的大国竞争，基于“冲突矿产”的“军事安全-资源贸易”模式加剧了地区的动荡，而且影响了自身的政治稳定。

（一）刺激大国竞争

私营军事公司作为俄罗斯实施混合战争的主体，具备军事和经济两种开展大国竞争的手段。

1. 军事干预

在冷战结束以后，由于俄罗斯自身实力的不断下降，在大国竞争中能够使用的军事资源非常有限。利用苏联遗产，通过军火贸易与援助、武器技术

① 袁勋、彭智丰：“神秘的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第 64 页。

出口、军事培训和维持和平行动等方式开展国际安全合作已显得力不从心。在长期技术研究和装备研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武器系统的性能逐渐落后，维持俄罗斯军队海外存在和活动的成本不断上升，其国际安全合作面临吸引力下降的挑战。

私营军事公司为俄罗斯提供了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军事干涉手段。从效果上看，私营军事公司作为俄罗斯在现代混合战争中灵活实施“间接行动战略”的代理人，有效地支持了国家目标的实现。[①]其组织的小规模部队能够有效掌控欧亚、西亚、北非等地区支点国家和关键节点，保持其军事存在。因此，私营军事公司与当地的代理人形成了战略杠杆，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俄罗斯的政治盟友提供了军事安全，扩大了俄罗斯的军事影响力。从成本上看，私营军事公司能够持续提供高性价比的安全服务。俄罗斯拥有丰富的武器储备和高素质军事人才，在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困难的情况下，可以维持低成本运营，同时通过在西亚非洲当地招募雇员，利用“黑俄罗斯人”进一步压低成本。

俄罗斯认为私营军事公司为解决国际军事冲突作出了重大贡献。[②]特别是在马里、尼日尔等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国家，俄罗斯利用私营军事公司削弱了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该地区的传统影响力，是实施公共外交的重要工具。[③]由私营军事公司实施的混合战争是维持俄罗斯大国地位、保持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但是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活动增加了爆发国际冲突的风险，与中国的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追求之间产生了张力。

2. 资源贸易

由于俄罗斯近年来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在大国博弈中能够使用的经济外交手段非常有限，主要依靠油气出口支撑其能源外交。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受到严厉的经济制裁，传统国际贸易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能源矿产是

① Пономарев В. Частные вое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агенты стратегии непрямых действий// АНИ: экономик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2019. Т.27. №.2. С.27-30.
② Зубова М. В. О проблемах и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созд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част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МВД России. 2022. Т.4. С.99-104.
③ Скрыльников А. В. Роль чвк в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и публич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Гоу впо «ДОННУ». 2023. Т.2. С.298.

俄罗斯与非洲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①]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西亚非洲建立了“战争经济”，利用“冲突矿产”和国际运输网络开展金融贸易，将在当地开采的石油、黄金、钻石、木材、铜、铁、钨、锡等自然资源进行出口获得收益，不仅为私营军事公司创造了经济收益，也为俄罗斯突破西方的经济制裁提供了渠道。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利用多种手段开展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一是部分实体公司经营酒精、咖啡等日常消费品、农产品，利用正常的国际商业贸易行为掩护其活动；二是在欧亚、西亚、北非国家注册了大量的当地公司，利用这些离岸实体和空壳公司制造关联交易、虚假交易，配合正常商业活动开展大宗商品的国际贸易；三是控制关键区域和重点国家的港口和机场，用交通枢纽组织国际运输，保障贸易的顺利进行。借助此类方式，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建立了西方经济封锁下的国际大宗商品贸易网络。这些黑市交易掩盖了商品和资金的来源与受益人，能够为俄罗斯赚取外汇并购买到禁运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协助实现贸易平衡，缓解卢布无法支付和禁止使用美元交易的问题。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关系网络是经济制裁下俄罗斯进入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重要手段，但是加剧了大国之间的经济摩擦，破坏了现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

（二）加剧地区动荡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虽然能够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一定的秩序，但是基于“冲突矿产”的军事安全不能为当地带来持久和平，更不可能使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1. 安全稳定

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发展基础薄弱和动力不足、西方国家军事干预与政治控制、以及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活动的多重威胁，仅靠自身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稳定。由于俄罗斯很少对合作提出附加的政治条件，而且还能够利用其政治大国的地位在国际关系中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提供声援，使得面临安全发展挑战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愿意同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开展合作。西亚非

① Морозенская Е.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со странами Африки// Научные труды Воль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России. 2023. Т.241. №.3. С.184-193.

洲作为历史上英法等国的殖民地，西方国家在该地区内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俄罗斯作为后来者，由于自身实力有限，在政治上愿意提供更为有利的合作条件。而且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能够以较高的性价比提供军事安全服务，其团级规模部队在非洲一个月仅需 1000 万美元，在国际安全市场具有极强的竞争力。

但是，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不可能真正为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稳定。第一，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能力不足，能够部署的作战部队规模较小，其军事存在的目的不是取代当地国家的武装力量或政权，而是进行局部地区的反叛乱作战。这些小规模高效能的作战部队，其装备和人员主要面向短期海外远征行动而设计，只能坚守大城市、交通线和主要矿区，偶尔通过实施焦土战术对盘踞乡村的“圣战”武装分子和叛乱部队进行治安战，并不具备控制全国局势的能力。第二，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维持“冲突矿产”需要地区局势动荡。观察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西亚非洲活动的案例可以发现，区域治理失序、经济发展停滞和社会构建失败是俄罗斯军事公司“军事安全-资源贸易”模式得以建立的基础。地区局势的动荡是军事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不可能建立真正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

2. 经济发展

第三世界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自然资源的出口能够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重要资金。然而，后苏联空间和西亚非洲的大量资源国，却未受益于能源、矿业的繁荣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反而在出口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产生了经济结构单一、制造业衰退、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发展困难等问题，陷入“资源诅咒”的困境之中。[①]这种单纯依靠资源出口发展经济的方式，不仅逆向地侵蚀了原本低效的制度，而且使得控制资源出口的当地势力不断壮大，现有的不合理秩序更趋于强化，最终导致拥有丰富资源的第三世界国家长期被“锁定”在贫困和停滞的状态。不合理的秩序安排不仅摧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造成了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产生了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进入这些地区的机会。

① 赵雪：“‘资源诅咒’的效应、传导机制与应对策略”，《经济研究导刊》，2023 年第 13 期，第 1 页。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往往活跃于治理能力脆弱但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开展活动，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目标不是帮助当地发展，而是获取能源矿产，尤其是争夺国际需求量大、价值高的资源。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要求第三世界国家通过自然资源的特许开采权或经营权支付军事安全行动的费用，借此实现对这些区域的有效控制，进而竭尽所能地榨取当地的资源收益。这种不考虑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开发，使得后苏联空间和西亚非洲的资源国家更加陷入“资源诅咒”的恶性循环之中。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依靠向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出售资源维持稳定的方式，不可能实现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而有可能促成更加严重的新危机，加剧地区局势的动荡。

（三）威胁国家稳定

私营军事公司对俄罗斯国家政权的稳定也产生了反噬性威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国家制度建设停滞不前、政权合法性认知扭曲、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困境。[①]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壮大，不仅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增加了改革的困难。对权力结构的改变造成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在深层次上影响了对外战略思想，最终扭曲俄罗斯的国家行为。

1. 权力结构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改变了国家权力结构并削减了政府权威。政治权威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其存在依赖于政治权力。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合法地垄断所有暴力，特别是军事作战的力量。政治衰败理论认为，政治体制如果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功能，将面临权威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重大挑战，最终将导致社会失序、制度失灵及政局动荡。[②]俄罗斯政府支持私营军事公司的发展，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得了低成本、高效率的安全服务，应对治理体系衰退、行政能力降低和政治动员不足的挑战。但是，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存在和发展，改变了政府完全合法垄断暴力的情况，成为官方正式暴力机构之外的新权威，促使私营军事公司从“协会-私营企业-武装团体”的关

① 张君义：“新冠疫情冲击下俄罗斯体制转型困局”，《欧亚人文研究（中俄文）》，2021 年第 1 期，第 35 页。

② 周凯：“从亨廷顿到福山：西方政治衰败理论的发展及评价”，《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2 期，第 5 页。

系网络向“军事-经济”的政治复合实体转变。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具有双重结构：一个是正式且公开的、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在明确的法律范围内运作；另一个是非正式且不透明的权力精英，这些“政治寡头”受到总统的庇护与控制。私营军事公司处于不完全合法的地位，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权宜之计”实际上分散了俄罗斯政府的权力并摧毁了官方机构的权威，不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都将进一步瓦解俄罗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俄罗斯政治权力体系架构最突出的特点是强总统制下不均衡的权力分布格局。[①]“超级总统制”的集权使得体制内缺少权力制衡机制，而维持集权政治的有效运行则需要实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保护决策者的超然地位。体制内外均存在政治平衡的力量，利用体制外力量实现政治平衡是集权制度的常见手段。俄罗斯政府高层希望利用体制外的私营军事公司，实现对体制内力量的牵制和平衡，进一步巩固统治地位。但是，瓦格纳集团的叛乱证明：随着规模的快速扩大和实力增长，私营军事公司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自主性，能够脱离政府的控制。[②]体制外的政治平衡力量在失控后将对政权产生反噬效应，摧毁国家的稳定。

2. 战略思想

普京执政以来，保守主义逐渐发展为主流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当前俄罗斯内外政策的核心理念。[③]从国内政治来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改革长期受挫。为了维护政府的合法性，俄罗斯政府调动民族主义，通过借助民粹主义的力量，快捷、低成本地获得大众支持。因此，国内的大众舆论和政治环境支持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继续发展。从国际竞争来看，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打压封锁，使得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军事安全领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俄罗斯国内环境和国际局势的恶化形成了互为因果、彼此强化的循环，使得私营军事公司短时间内不会消失，反而可

① 郝赫：“简析俄罗斯政治权力体系架构的特点及其挑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 年第 6 期，第 17 页。
② N. Gould-Davies, “The Wagner Revolt: Implications for Russia, Lessons for the West”, *Survival*, 2023, Vol.65, pp.25-30.
③ 韩璐：“保守主义强化：俄罗斯对外政策态势”，《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 3 期，第 62 页。

能继续发展成为俄罗斯内政外交中的重要力量。

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具有增强国家对外战略保守性的政治思想。不同于西方国家私营军事公司主要追求经济收益的功利主义，俄罗斯的私营军事公司具有稳定且强大的极端民族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强国主义思想，高度认同民族和国家。保守主义的对外战略思想使得俄罗斯外交具有很强的进攻性，偏向同西方国家开展大国竞争。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改变国内权力结构的同时，其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国家的行为偏好，很可能使得俄罗斯缺少对国家利益的正确判断和审慎评估，在外交中维护强硬路线，丧失对外战略的弹性，不得不坚持使用混合战争手段。在西方国家的持续封锁对抗下，俄罗斯将更加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继续利用私营军事公司加强对西亚非洲地区的渗透，通过武装部队部署、政权更迭等方式同西方国家在这些地区开展竞争，重点控制“冲突矿产”攫取经济收益，利用“军事安全-资源贸易”模式拓展俄罗斯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影响力。

四、结　论

私营军事公司是俄罗斯政治体制的产物，也是普京执政后形成的新社会关系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反映。作为俄罗斯实施混合战争的主体，私营军事公司在后苏联空间和西亚非洲开展了大量活动，深度参与了俄罗斯的多项重大海外军事行动，特别是基于“冲突矿产”构建了“军事安全-资源贸易”的干预模式，扩大了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也影响着俄罗斯的对外战略和行动偏好。从组织关系上看，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不是一个单纯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民营企业，而是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由行业协会、私营企业、武装团体等众多实体组成的复杂安全雇佣关系网络。从演变规律上看，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随着实力的增强，呈现出从“协会-私营企业-武装团体”的关系网络向“军事-经济”的政治复合实体转变的发展趋势。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的这些特征，使得其在影响国际安全的作用机理上，具有多层次多领域持续投射影响力的特点，在国际、地区和国家的不同层面对国际安全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在国际层面刺激了大国竞争，使得地缘政治博弈白热化；在地区层

面加剧了第三世界的动荡，地区局势更加紧张；在国家层面改变了俄罗斯的权力结构，威胁着政权的稳定。安全私有化在缓解安全公共产品供应赤字的同时，可能带来新的治理困难及治理赤字，特别是可能侵蚀主权国家对暴力使用的合法垄断地位，进而危及主权国家的合法性。[①]俄罗斯的经验证明，国家一旦启动安全供应的私有化的进程就很难逆转其发展态势，私营军事公司灵活多变的形态和不断拓展的业务是国家管理的重大挑战，应对失当则会严重打击国家的威信，对全球治理产生灾难性影响。

瓦格纳集团的叛乱和普里戈任的死亡虽然引发了政治危机，但是塑造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并未发生变化，没有影响私营军事公司的特征，从关系网络向政治实体转变的趋势没有改变。事实上，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人事、组织和业务的巨大调整。每次经历重大事件后，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都会进行一轮适应性更迭，以更加匹配环境的新面貌出现。未来，俄罗斯私营军事公司将继续对国际安全发挥结构性影响，需要持续跟踪并给予高度关注。

① 张春：“安全私有化的当代发展及其国际政治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 年第 6 期，第 4 页。

【**Abstract**】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represented by the Wagner Group, serve as the main vehicles for Russia's implementation of hybrid warfare and are a significant force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istorical review and characteristic identification reveal that the emergence of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was heavily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creating a complex network of security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consisting of industry association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armed groups. Changes in Russia's domestic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have facilita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se companies.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are highly active in regions such as Eurasia, West Asia, and Africa,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military and security operations. They have established a "military security-resource trade" business model utilizing "conflict minerals", showcasing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expansion, diversified economic gains, ideological stability, flexible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increased preference for autonomy. They are transitioning from a network of "associations-private enterprises-armed groups" to a "military-economic" political composite entity. The activities of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have had a significant structural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ot only stimulating great power games and exacerbating regional instability but also threate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Russian state regime itself. The Wagner Group's mutiny has not altered the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Their future changes require close attention.

【**Key Words**】Russian Private Military Companies, Hybrid Warfare, Conflict Minerals, Wagner Group

【**Аннотация**】Частные вое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в лице «Группы Вагнера», как основного фактора реализации гибридных войн для России, являются важной силой, влияющей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и анализ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рожд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их част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получило мощную официальн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и

создало сложную сеть труд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остоящую из отраслевых ассоциаций, частны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и вооруженных групп. Измен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привели к быстрому развитию част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в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частные вое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очень активны в Евразии, Западной Азии, Африке и других регионах, участвуя во многих типах военных операций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ни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конфликтные полезные ископаемые» для построения бизнес-модели «во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 торговля ресурсами», что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расширением военной мощи,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доходов,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ю, гибки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ми формами и повышенной автономией. Эти частные вое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трансформируются из сети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объединения – частные предприятия – вооруженные группы» в «во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их част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оказал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не только стимулируя конкуренцию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и усугубляя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но и угрожая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сам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Бунт «Группы Вагнера» не изменил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частных военных компаний, и на её будущ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ратить пристальное внимание.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ие частные вое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гибридная война, конфликтные олезные ископаемые, Группа Вагнера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俄罗斯研究》来稿须知与注释示例

《俄罗斯研究》多年来形成了以扎实的俄罗斯欧亚国别与区域研究为依托，有效服务中国外交政策的办刊特色。旨在刊发各领域、各学科中外学者在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尤其欢迎融经验性、理论性、时效性于一体的、有中国思想和中国关怀的研究俄罗斯及欧亚问题的论文，为推动国内外学界沟通，尤其是国内学界、青年学者的发展提供平台。常设议题主要包括俄罗斯及欧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对外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大国关系研究等。本刊议题不囿于上述方面，诚挚欢迎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向本刊提供新的议题引领。

一、来稿须知

1. 请使用信箱投稿或在线投稿系统：

投稿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在线投稿系统：http://ru.ecnu.edu.cn；

电话：021-62233816；传真：021-62238113。

2. 来稿字数 1.5 万-2 万字，需有 300-500 字的内容提要，3-5 个关键词。

3.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稿件一经采用，会向作者支付稿酬，邮寄样刊。

4.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二、注释示例

1. 中文文献

（1）著作：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 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6 页。

（2）期刊文章：杨洁勉：“疫情下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变化趋势分析”，《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2. 英文文献

（1）著作：R.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0.

（2）期刊文章：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3, No.4, pp.7-8.

3. 俄文文献

（1）著作：Замятин Д.Н. Культура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Моделирован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образов. М.: Знак, 2006. С.86.

（2）期刊文章：Лукьянов Ф. Укра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России//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8. Том 16. №.2-3. С.175.

完整版本请参阅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网站 https://rus.ecnu.edu.cn/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俄羅斯研究（双月刊）

ELUOSI YANJIU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24年第2期（总第246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刘　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　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网址：http://ru.ecnu.edu.cn/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ISSN 1009-721X
9 771009 721241 04

公开发行

定价：30.00元